



2012
第四期

闻 道

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研究生 主办

靡石有初，錚錚有終。
冯绍雷

思接千載，視通萬里

與“聞道”學子共勉

林禮云
2011年3月10日

封面题词：冯绍雷

《闻道》编辑部

主编：李沛

副主编：孙超 李荟 程艳阳 刘佳琪

编辑：陈安龙 陈洁琼 崔攀 纪媛楠 李秋悦
李婷 柳文 马新伟 秦珊珊 王志航
吴途勇 武亚宁 许子兰 杨茗 叶小娇
尹亮 曾乔圆 张元 章航翔 周生升
朱乘璋 朱永福

封面设计：何晴倩 秦珊珊

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
理科大楼A座四楼

邮编：200062

电子邮箱：ggwendao@gmail.com

闻道

华东师范大学
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研究生 主办
2012年01月
(季刊)



注：未获本刊事先许可，任何
单位或个人不得转载本刊内容

主编的话

迎着冬日的瑞雪，伴着新年的钟声，在悄然来临的春天的脚步声中，在渐行渐远的西风呼啸声里，《闻道》第四期刊物在经过众位编辑的辛勤酝酿后终于出刊！这一新鲜出炉的刊物，犹如是蕴藏着各种琼浆的宝窖。在冬日这个历数收获的季节，让我们一一细数这些醇醪。

请您细看，里面有陈年佳酿，散发着久久回味的怡人清香。周尚文教授给我们讲述了华师一个甲子的光辉历程，告诉了我们深厚的华师精神。作为研究国际共运的前辈，他还向我们讲述了国际共运视角下的国际关系。

请您细看，里面有着高雅的清香美酒，带着浓厚的书香飘来，给我们的思想新的冲击。在本期的学术栏目中，您将看到，吕晓莉老师和孙超同学带给我们的学术文章；您将看到，韩冬涛博士对于商业精神在欧洲民族国家形成中所起影响的论述；您将看到，由孟维瞻同学翻译的“国民意识形态与国际关系理论”这一带来新思考的文章；您将看到，编辑部吴途勇同学给予我们对 Demarchy 这一概念新解读的书评；您还将看到，国关院资料室的丰富藏书。

请您细看，里面有着各色各样的新酒，给您清新的醇香和别致的感受。围绕着“欧债危机”这一焦点，同学发表了不同的看法；对于发生的社会热点，同学依旧关注，关于“小悦悦”事件，小编有话说；对于“微视点”这一新出的栏目，带来的是一种耳目一新的心灵体验；当然，还有同学的各抒己见，引领您细细品评这坛美酒。我们也不会忘记提醒您细看国关院的新闻，了解我们身边发生的变化。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值此冬日，正是细细品酒的佳期，让我们乘着这季节一起走进这一期的刊物！当然，我们也不忘感谢每一个“酿酒人”：有的披星戴月赶写稿件，为保证稿件的如期完成；有的呕心沥血校对排版，为使刊物的质量更进一筹；有的更是群策群力，筹划着刊物的每一个细节！……在刊印之际，让我们把最鲜美的甘酿献给每一位“酿酒人”！

2012年1月



华东师范大学

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研究生

目录

主编的话	1
学人访谈	1
访谈华东师范大学周尚文教授.....	1
国关论道	7
“台独”的起源与变迁思考.....	7
商业精神对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影响.....	15
国民意识形态与国际关系理论——“俄罗斯意识”的三种体现.....	25
品茗闻道	39
Demarchy：替代选举政治的制度？	39
他山之石	44
文苑拾菁.....	44
百花齐放	47
开篇的话.....	47
本期透视热点：“小悦悦”事件.....	48
你所在的地方，就是你的中国.....	48
谁来捍卫中国的底线.....	49
莫让善良付秋风.....	50
新闻话题.....	52
“不仅仅是改校名”——中国军校大改革.....	52
温习“对不起”	52
言说空间.....	52
李泽厚再说“西体中用”	52



华东师范大学

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研究生

戴锦华谈电影《钢的琴》	53
先生之风.....	54
周其仁：旁听生纪念张培刚.....	54
落叶归根.....	55
校车事件反思.....	56
时事焦点	58
欧债危机.....	58
院系来音	66
国关院 2011 年 11 月—12 月集体活动大事记	66
国关院男女篮参加第四届 ENBA 篮球赛	66
国关院参加第四届“宏辞论道”研究生辩论赛.....	69
2011 级研究生冬季晨跑活动	70
2011 级团支部开展秋季健身友谊赛	70
国关院 2011 年 11 月—12 月学术活动大事记	72
“闻道书社”读书会系列活动	72
“复性书社共同体”系列读书活动	72
博士研究生专题讨论会系列活动	73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会议召开	73
德国汉堡大学 Michael Brzoska 教授学术讲座	74
日本东洋学园大学教授朱建荣讲座	75
Stefan Hedlund 访问俄中心	75
“瓦尔代”国际辩论部中俄分组会成功举办	76
“冷战终结，苏联解体及其对国际关系影响再认知”国际研讨会召开	77
我院研一学生参加叶小文书记“中国文化与文化中国”的报告	78
白俄罗斯驻华大使率团访问我院	78
俄中心举办“教育部重点文科基地重大项目开题报告会”	79
美国里德学院政治学系助理教授张昕博士学术报告会	80
征稿启事	82

访谈华东师范大学周尚文教授

【编者按】 在轻松欢愉的融融氛围中没有拘束地与一位长者交谈，体会人生变迁的传奇。聆听一位师者的教诲，如高山流水，在娓娓道来的殷殷话语中，感受醍醐灌顶的启迪。从一位老华师人的口中，我们体认到的是不平凡的变迁。一所大学一甲子的辉煌岁月，为其添砖加瓦的恰恰是一个个站在平凡的三尺讲台讲授不平凡岁月的园丁！我们有幸走近其中一位为华师辛勤奉献几十年的园丁。那么，就让我们在分享这些字句之时，走进这位长者、师者、华师人和园丁的思想和心灵！

【访谈人物简介】 周尚文，1935年12月生，上海市松江人。1957年入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求学，196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先后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1993年评聘为博士生导师。曾任教研主任、副系主任等职，现兼任上海市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世界史学会理事，上海市邓小平理论研究会副秘书长，华东师大人文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长期从事政治理论课教学和研究工作，主要专业研究方向为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运。



主要著述有：主编《国际共运史事件人物录》，57万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获上海市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主编《中国共产党创建史》，29万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苏联兴亡史》，60万字，三人合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获上海市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教育部全国高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成果三等奖。《社会主义150年》，20万字，二人合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获上海市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主要论文有《论马克思的历史洞察力》、《关于“一国两制”的几点理论思考》等，有6篇论文获奖。

《闻道》：周老师，您好！今年是华师60周年校庆，也就意味着华师走过了一个甲子的光辉历程。我们研究生中有很多学生的本科不在华师就读，来了这边之后，对华师的体会肯定没有您这些在华师学习、工作几十年的老华师人感受大。作为老华师人，您能不能结合您的切身的感受来谈一谈华师大走过的历程中，对您影响最深的华师变迁的几件事情。

周尚文教授：华师大进入60周年，我是57年进校的，也差不多60年，大部分时间都在给华师大做贡献。所以50多年的春华秋实，华师大变化也挺大，50多年也好，60年也好，有很多曲折，也有坎坷。

华师大的校园是很漂亮的，一进来就对这个校园有很好的印象和感情。这个大家都是知道的，这里绿化好，环境好。但是，作为一个大学，它离不开整个社会的发展。而我们整个

社会发展道路也有很多曲折和坎坷，我们学校的发展同样也是这样，经历了苦难也有辉煌，每年都有很多学生进来和出去，为国家输送建设人才。但是，我们刚刚进校的（19）59年，第一次反右刚刚结束，又一次反右开始，那时我们才刚刚二十岁出头，但是在我们的班级还是打了两个右派，一进校门就碰到严峻的政治气氛，对于青年学生来说思想压力也是有点大。随后我们政教系的学生从1958年开始就一起上山去了，和农民在一起，用苏联的话就是和农民再交流，接受农民再教育，那时候是劳动最美。因为知识分子在学校里不接触实际，需要时间改造，劳动锻炼。有的去三个月，有的一去就是一年。学习上耽误了很多，体力负担也非常繁重。对于青年学生来说当时也是一腔热血，应该说受到了一定的锻炼。但也看出一些左的东西，国家花那么钱培养大学生，老师学生却不上课了全部去劳动。固然我们需要知道劳动的含义，与劳动人民一起，既有值得锻炼的一面，也有走的路线不对的地方。我们毕业了以后又碰到“四清”运动，又到农村去了。最后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干脆就不上课了，不招生了。这样十多年下来，应该说是我们中国教育的一个弯路，当然这也不纯粹是一个教育部门的问题，是整个国家的大趋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带来了科学的春天，也带来了我们学科发展的春天。对于我们而言，毕业的时候二十五六岁，文革时大概30岁，30岁到40岁之间应该说精力很旺盛，这段时间就白白的耽误了。但是不管怎样，春天总归是到来了。所以真正学科的发展，人才的培养，学校整体的进步更多的是从这以后。文革以后的情况我就不多讲了，校史记载得比较多。

我们政教系现在的发展我都不知道规模有多大了。先是经济系、然后是社会系，政治也分出了几个系。我想主要讲一下国际关系这个学科。整体上说，我们政教系是按照苏联的模式引进来的，马哲、马政经，再加上一个马列主义基础，中国又加了一个中共党史专业。苏共二十大以后马列基础不开了，就改成国际共运。我毕业以后就留在这个教研室，唯有我们的教研室与国际关系有联系。但是，文革以前我们国家对外封闭，前期只是对苏联、东欧开放，而中苏关系的蜜月时期也是很短的。所以世界上的大事，老师学生也不是不关心，而是都比较陌生，没什么发言权，没什么话语好说，视野比较狭窄。到了60年代因为中苏关系恶化，系领导就有一些考虑，想设一门国际问题的课，我们这个教研室当然当仁不让，这样，就请外面的专家来讲课。虽然有唯一一位搞国际关系的老师——石啸冲教授，但是他不是共产党员，事实上就没有在系里上课。这也说明当时对国际关系研究不重视，我们只能听中央的口径，反修反帝。从个人角度来讲，那个时候一个老师或学生有海外关系的话，不是一个好事情，是很严重的疑点。所以那个时候不敢谈美国怎么样，台湾更不太敢谈，要么就批判美帝，苏联也不能讲好话，只能讲中国好，说一些小朋友、中朋友好，包括阿尔巴尼亚这些国家，仅此而已。所以当时本来想开这门课，也物色了一两个老师，结果不了了之，因为这种学科太敏感。当然，客观上老师和学生外语水平普遍低下，学生想学，但不能像现在一样当作一门功课。他们一会得下乡，一会得到工厂里去。外语水平很低，而且觉得学了外语也没多少用处。“文革”以后为什么成立苏共所呢？因为当时客观环境的变化，对外开放，而因为英语教学开始了，有一批外语系的俄语教师教学任务变少。政教系的老师就负责去找课题、研究方向，写书，外语系的老师着重于翻译。那个时候和苏联关系很差，主要翻译一些苏联的反面材料。这项工作是从“文革”后期就开始了，就是苏东所。那个时候施平党委书记亲自挂帅当所长也是这个原因。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个问题还比较敏感，涉及到外事的

一些问题，研究苏联碰到一些很敏感很棘手的问题，比如说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对斯大林的错误该不该批判，批判到什么程度，我们发表的讲话啊，毛泽东的评判啊，是不是准确呢，是不是科学呢，要不要允许学者反思，进行独立思考，这些往往就成了问题。所以，他说他来当所长，有一点好处，便于老师解放思想，便于开展研究。因此，我们这儿就成为国内关于这方面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至少也是一个重要的据点。北方是人大北大，南方就是我们华师大。这也是国际共运史学会唯一一位南方的副会长就是我们这里的姜奇的原因所在。八十年代对国际共运还是非常重视的，冯绍雷老师、范军老师、潘世伟宣传部副部长，都是那个时候从这个专业毕业的。殷一璀，就是后来的上海市副书记，也曾是这里的在职研究生。相对来说，政教系的传统学科留下来的就是国际共运和中共党史，在国内地位还是比较高的，当时我们也是进了中年了，所以那时副教授比较多（改革开放一开始只有副教授没有正教授），80年代初系里只有三个副教授，就是我，姜琦、张一鸣。1982年开始培养硕士生，就在77、78届中培养第一批研究生。我们这个学科从根本上来讲还不是个根本学科，以前有点忌讳，不受重视，发展也不顺利，所以1982年才开始招了第一届硕士生。到了90年代，1992、1993年有了博士生，博士点是以国际共运的名义设立的。那个时候，国际关系专业是国际共运专业中延伸出来的一个专业，因为跟国际问题相通；90年代前者发展起来，后者逐步萎缩。因为苏联解体了，人的思想也变了。

这样一直到90年代末就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中心。因为就国内来说，我们这儿还是以研究苏俄为主要优势。2006年把文科重点基地以俄罗斯研究中心的名义申请下来，全国100个文科基地。2004年成立国关院，开始是隶属于政法学院，现在独树一帜、平起平坐了。我也一直在这兼职。因此如果国关院要写院史的话，要追溯到这样一个脉络：先有苏东所，再有俄罗斯研究中心，再有国关院。这样一个格局今天看来是有利于学科发展的，对于人才培养、对外交流都有很大好处。伴随着全校的发展，在对外交往上国关院当然首屈一指。记得1950年代的时候，周总理决定三个学校研究国际政治——北大、人大再加上复旦。有些师范学校、外语学校不大去接触国际问题，条件也不允许，主客观条件都有限制。现在国家形势也变了，不允许的也研究了，研究上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障碍。你讲俄罗斯好话也好，坏话也好，都没关系，美国也是一样，没什么大的禁区。

我们华东师大是一所师范大学，这六十年来是一所蛮本分的师范大学。所以从整体的发展，从学校的性质来说，对于那么几个学科发展而言，华东师范大学的名字多少有点限制，所以“985”迟迟申请不下来。上世纪本来我们蛮靠前的，16所重点大学之一，而“985”出来之后，没有华东师大的名字，后来好不容易才争取到，所以发展也不是那么平坦。毕竟是个地方上的重点院校，和北大清华复旦不大好比。不管怎么样，师大人，师大的老师和学生还是很努力的，在重点大学中还是有一定地位的。这不是一两个校领导的功劳，是全体师生的功劳。

《闻道》：周老师，您谈到了师大能成为“985”高校不是一两个校领导的功劳，而是全体师生共同努力的结果。那么，从您的角度来看，师大六十年传承下来的最重要的精神是什么？作为新的师大人，我们应该具备怎样的精神？

周尚文教授：师大人一个比较好的优点就是比较淳朴，做事情非常认真。因为是师范学校，所谓“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在有形与无形之中感染老师和学生。所以华师大出去的

学生，挺受社会好评。这是优点的一面：比较认真、比较扎实。缺点就是缺少创造力。这一缺陷在 90 年代以后逐渐有所改变。原来好的一面师大人还是继承了，另一面师大人有所改观。这一点从我们文科来说更加显著一点，理科当然也有所发展，不过总体上比不过一些工科学校，所以一开始院士很少，但是就文科而言师大在全国还是比较靠前。这一点我们也深有体会，就拿我们国际共运这一学科来说，如果不是 80 年代初就走在全国前面，人家也不会认同我们这里是南方的一个首要据点。为什么呢？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解放思想之类的一些精神、很多问题是这里提出来的，得到整个学科界的认同的，譬如说南斯拉夫问题。南斯拉夫和中国好好坏坏，后来一直被认为是“修正主义”。苏联把南斯拉夫开除出情报局，中国共产党也一直是认同的，所以一直当作反面教材。“文革”以后如何对待国际上的这些冤假错案，就是我们这个教研室最早提出来的。把南斯拉夫开除出情报局是一个国际的错案。这样无疑就要对斯大林、对托洛斯基、对苏联一些人物也要平反昭雪。当然，也不叫平反昭雪，叫重新评价。再如托洛斯基问题。当时北京的气氛还比较严格，不敢碰，还是把托洛斯基当作一个极端的反革命人物。以前中国也有“托派”，陈独秀也一度是“托派”。这个“托派”在中国就一度等于反革命派，是“托派”分子就得坐牢。我曾经访问过一个“托派”，就是当时党中央宣传部的一个负责人，《布尔什维克》杂志的主编。为什么要去访问他呢，因为我们翻译了一本书——《托洛斯基自传》。三十年代有过一些翻译，后来就禁止了，我们搞国际共运需要了解历史真相，那个时候中央编译局的同志手里有这本书，其他同志没有的。但是他们不敢翻译，因为这是个地雷，你一翻译人家就要问你是不是有什么政治目的。所以就把资料交给我们了，英文本，叫我们翻译，内部出版。我在主持这件事情，所以我专门去访问了一下那个叫郑超林的“托派”分子。那时他刚从监狱里放出来。他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你们找错了方向，你们不能到图书馆，应该去公安局去找。”当时这些都是反革命的材料，图书馆不敢收藏。那个时候的政治气氛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这里谈的，是改革开放初期两大问题，受到国内重视。一个是对托洛斯基的重新评价，不能像过去一说“托派”就是反革命、野心家，这些都是斯大林强加给他的；另外一个就是南斯拉夫问题，把他开除国际共运是一个错案，这个对恢复两国的关系，通过学术研究推动了这方面的思想进步。对国内的刘少奇这一批人逐渐平反了，对国外的人我们没必要平反，但是重新评价还是有必要的，也是应该的。所以我们学科还是做了一些贡献。我们始终把苏联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作为主要研究方向。这样延续下来，我们国关院即使不是最重点的，也是重点之一。

《问道》：周老师，您刚才一直在谈苏俄问题的研究和我们华师大的一些研究历程，我们都知道您是国内研究国际共运的一个领军人物。请问，从国际共运这样一个视野下怎样看待国际关系？

周尚文教授：国际共运本身也是经历了很多坎坷，长期以来既遵循了马列主义的一些好的传统，也曲解了一些好的传统。因此，我们这个学科在建立之初，还是以苏联那个马列主义为蓝本的，马列主义基础又是以联共布党史为基础的，这样一来就难免带有一些斯大林的烙印。斯大林的烙印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左的教条主义，就是僵化、践踏民主，搞个人崇拜。解放以后我们一大段时间以苏联为师，接受了好多这样的东西，也禁锢了我们自己的思想。因为我们这个体制在相当程度上还是从苏联搬来的，甚至于思维方式。后来即使和苏联

闹翻了，在这方面也没有及时地清算。结果苏联清算了，我们还是在犯错误。有的时候历史的确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研究国际共运，在“文革”以后很热门，对照我们自己，对照苏联，我们研究那么多冤假错案，我们搞改革开放，我们要突破这个僵化的体制。80年代中期政治体制改革也提出来了，也就是想解决类似苏联那种僵化的体制。苏联和我们恩恩怨怨很多，对我们的影响，正面的、负面的，都不少，还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个对象。美国也很重要，但毕竟和我们的基本制度和意识形态不一样。所以我们一谈到苏联，会有很多感情，又有很多怨恨，这是一种复杂的感情。像我们一些留学生解放初去苏联，感情是非常深厚的，但是后来一下子国家关系坏了，什么都中断了。如果国际共运能够顺利发展的话也应该能够冲破斯大林这种模式，走上一条马克思主义本国化的道路。因为各个国家的国情不一样，时代也变了，不能把马克思怎么说的列宁怎么说的教条地搬过来，来治国理政，如果这一点能够做的好的话，那么国际共运还能发展得顺一点。靠什么呢？就要靠改革。而改革又是一个很艰苦的事业，很复杂。我们党有一些好的传统——实事求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等等。渐进式地进行改革，先经济改革，然后政治改革。现在改革还在推进，中国面貌也有很大变化。但是，苏联、东欧不是这么回事。他们的党要改也难。他们是发源地，赫鲁晓夫以后的领导也没那么多威望，理论的修养也不够。改革不但是个实践，还是个理论，需要理论支撑，而且要冲破一些旧的理论。这一方面我们中国的确还是不同，所以我们说“邓小平理论”比较完整地体现了改革是什么。

从国际共运和国际关系的内涵来说，我们这儿有点本末倒置，是国际共运发展到国际关系，而实际上应该是国际关系包含国际共运。这是历史形成的。如今我们倒过来也有好的地方，但是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国际共运在边缘化。好多学校早就没有国际共运专业了，我们学校也名存实亡了。以前我带的博士生都是国际共运的，因为没有国际关系的博士点，现在批下来了以后，报国际共运的研究生就少了。我总觉得不管怎样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就还得有一部分人研究国际共运，研究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进程、它的前景。现在我们发现西方国家有意识形态的差别，不承认马克思主义，西方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讲的一套马克思主义和我们不相同。我们搞市场经济，“西马”不大认同。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市场是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所以好多问题也在看到底是不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就在于我们国家能不能把这个事情搞好，就是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结合好，是不是能够在政治民主、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跨出比较实质性的步伐。最近我看了一篇文章，作者是北大孔凡君教授，他算是我们的学生辈。他就说过去我们的社会主义阵营，苏联、罗马尼亚都是兄弟，90年代以后中国国内几乎没什么人在研究，中国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一个全方位开放的大国，当然不一定要把主要力量放在研究这些国家上，但是也不能够没有一点力量投入，否则，恐怕对学术发展来说有失偏颇，毕竟还有几十个国家有共产党。这些共产党的生存状态到底怎么样，也需要有人研究。我想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讲，国际关系应该包括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这一块。

例如，对苏联解体这一20世纪最大历史事件之一，那么大的一个国家，1900多万党员，一下子就垮了，没什么天灾人祸和外来世界的干涉，共产党就这么脆弱？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苏联解体已20周年，国内学界和政界对于苏联解体的原因仍争论不休。有一些思想比较僵化的左派，对斯大林全盘肯定，到现在还认为苏联出了两个叛徒，一个赫鲁晓夫，一个

戈尔巴乔夫。单凭两个人就能搞垮这么大一个国家么？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两个人就是了不起的人物了。这一事件的产生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应该追溯到1930年代以来，苏联虽名为社会主义国家，其实际建立的政治、经济体制是不符合现代国家发展规律的，不符合社会主义的规律的，是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相背的，也是和本国的国情相违背的。连斯大林这些错误的东西都不让批判，结果越来越左，越来越僵化。戈尔巴乔夫也想搞改革开放，结果没搞成功，没搞下去，学民主社会主义的北欧那一套，结果也行不通。到了最后她自己也沦落成了孤家寡人。不能说是他背叛了社会主义，他是很忠诚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者，后来驾驭不了了，一发不可收拾，也晚了。他不得不在“8·19”之后辞掉了苏共总书记职务，一夜之间苏联共产党消失了。这种历史现象很稀有、很奇怪、很悲凉。共产党发展这么多年，最后党员不支持自己的党，老百姓对党也失望。

这些反过来说对我们中国也是借鉴，对这一点我们党有所认识。有所认识是指认识到掌握政权不容易，长期掌握政权更不容易。但是光有这样的认识还不行，怎样保证党生机勃勃，调节国内的各种矛盾，推进各种改革，恐怕还有很多难题，有很多新的矛盾：国家的前途命运交给谁手里？是不是还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否还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当然照搬马克思主义是走不通的，但是抛弃马克思主义好像还找不到替代的思想作为精神武器，这是一个矛盾。所以中国的事情只能靠自己做好。现在的局面是寄希望于我们共产党进一步推进改革，来领导好我们事业前进，既要坚持一些东西，也要改革。就要靠你们年轻人，你们也说师大文化、师大精神，这些好的东西要坚持，但是又要看到过去历史上有好多问题。我们国家的发展，各个方面，不去学习西方的不行，这是肯定的，但是完全照抄照搬也不行，没用的。你们这一代，年纪轻的一代身上恐怕能做到。既要看到国家进步的一面，也要看到存在问题的一面；既要向西方开放、学习但又不能完全西化；既要坚持好的东西也要抵制老的坏的东西回潮。（结束）

（责任编辑：李洋、陈安龙、李沛）

“台独”的起源与变迁思考

吕晓莉 孙超*

【内容提要】 “台独”有其历史，也有其现实。作为一个复杂的行为系统，“台独”绝不是一种仅仅存在于叫嚣独立建国的台独分子和牟取不当的政治利益的政客的工具，而是一种思潮和行为双向互动的系统。因此，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和现实的角度，从纵向理解台独；又要从社会的角度，政治的角度和文化的角度横向理解台独。

【关键词】 台独 历史 现实 建构

“台独”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给出阐释，却没有达成一致的说法。通常学者对“台独”概念的认识分为两种：一种是一种实体性的行为，是一种运动，是一种政治斗争与政治暴力；一种是一种思潮，是一种文化上的行为。对于前一种，很多学者追本溯源，查询台独的起源和发展演变，指出这是一种目的；¹对于后一种，很多学者则分析其是一种实现政治利益观念工具和舆论工具，成为一种手段。²对于这个概念，学者们从目的和手段两个角度给出其定义，可见其复杂性。

为什么对于这么一个小小的概念会产生如此众多的说法？“台独”的起源究竟关乎什么。对此，笔者认为，是人们对台独不同的理解才会造成对台独起源的不同认识。具体来看，所谓“台独”，即“台湾独立”，就是要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变成一个独立的国家。³作为一种行动，“台独”产生于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的部分台湾人士召开的“草山会议”。⁴有学者将“台独”的起源放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之后，即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台湾民众兴盛的独立意识。⁵也有台湾人士认为，“台湾”在1895年台湾民主国成立就存在了。⁶其理由是当时在清政府割让台湾之后，台湾成了“台湾民主国”。更有甚者将“台独”的行

* 吕晓莉，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生导师；孙超，华东师范大学2010级硕士研究生。

1 对于前一种思想，明显见于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所编的关于台独研究的五本著作。它们是国内研究“台独”比较全面的著作集。这些书分别为孙云：《台独理论与思潮》，厦门：九州出版社，2007年12月；张凤山：《台独的历史演变》，厦门：九州出版社2008年4月；杨立宪：《台独组织与人物》，厦门：九州出版社，2008年1月；彭维学：《台独的社会基础》，厦门：九州出版社，2008年4月第1；周忠菲：《台独的国际背景》，厦门：九州出版社，2009年11月。

2 对于后一种认识，多见于许多学者对民进党的得票分析和国民两党的政治斗争分析中可见。具有代表性的有将“台独”视为领导人谋求台湾发展的“肢解中国的重要手段”，见吴明：“台湾问题与中国前途（上）——兼评李登辉‘台湾的主张’”，《两岸关系》，2000年第6期，第31—35页；有将台独视为反共拒和，求全自保手段，见赖文凤：《陈水扁两岸关系主张研究》，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导师林仁川教授，2002年；有将台独主张视为本土政治精英进行政治斗争之需在选举政治下的迎合部分选民的曲折手段，见何达霭：“省籍矛盾—族群矛盾—台独——略论‘台湾’省籍矛盾及其发展”，《学理论》，2009年第11期，第17—19页。

3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中国台湾问题外事人员读本》，厦门：九州出版社，2006年11月版，第119页。

4 在这一会议中，在台湾的日军死硬派不甘心失败，勾结台湾的御用士绅于台北草山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台湾独立事宜”，并草拟了活动计划，拒绝中国接收台湾，分裂中国。

5 廖明容：“‘台独’的由来”，《知识长廊》，2005年第12期。

6 具体分析见张凤山：《台独的历史演变》，第一章。

动提前到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其子郑经所成立的“汉人政权”。¹极端主义者甚至将“台独”放在了四百年前。²

在海峡两岸，也正是对“台独”不同的解读才会造成不同的认识误差，影响两岸关系。大陆学者一致认同“台独”是日本投降之后台湾光复后才产生的认识与行为；台湾学者则理解自由多元，有的是出于对台湾本土意识的认同，从1895年起就认为有“台独”的存在；有的是完全的台独分子，认为台湾逐渐形成独特的民族，台独也早在400年前就已经存在；有的是出于厌恶国民党的统治，将台独放在“二·二八”事变之后台湾人民的实现民主自由之手段。正是台湾学者和政客处于不同目的的“台独起源论”，才使得台湾民众接收到的是模糊的“台独”区分，对“台独”认识浅薄，甚至将台独视为台湾本土意识的象征，并没有考虑到台独本身的危险性。在笔者看来，“台独”是个复杂的系统。这种系统不仅涉及到了时间上的理解，更涉及到了逻辑上的理解。在当代人看来，台独不仅充满了历史内涵，更具有现代色彩。它具有终极目的性和手段性双重特征。

上文提及的“台独”，“台湾独立建国”，即台湾独立，分离出去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这种概念虽然表达出了台独的行为内涵，却未表达清楚台独的思想内涵和台独的历史内涵，而正是这两种模糊不清的认识才会让台独分子有机可趁，随意切割历史，愚弄大众。虽然“台独”的定义很明确，即“台湾独立分离出去建国”；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台独”的事实，即台湾本身独立，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传播“台独”的思想和为实现“台独”所做的一系列的行为。“台独”本身的解释力停留在一种即将到来却并未到来的分析层次，用“未的层次”分析“已的层次”。这就对准确理解“台独”制造了障碍。

“台独”有其历史，也有其现实。作为一个复杂的行为系统，“台独”绝不是一种仅仅存在于叫嚣独立建国的台独分子和牟取不当的政治利益的政客的工具，而是一种思潮和行为双向互动的系统。这种系统存在着一种特征，台独的意识建构出台独的行为，而台独的行为反过来又强化了台独意识。正是这种从意识到行为都存在的“台独”，才使得一种从理论到现实上反对台独的要求变得特别急迫。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和现实的角度，从纵向理解台独；又要从社会的角度，政治的角度和文化的角度纵向理解台独。只有这样才能树立起一种立体的认识，看到台独的真正起源。

一、台湾意识、中国意识与台独

在当代台湾，台独分子求得生存的重要战略之一就是利用台湾民众的“身份认同危机”，而“台湾意识”是这些台独分子的重要工具之一。台湾意识事实上并不复杂，它也并非是一个政治概念。它仅仅指的是经历多次历史和社会变迁的台湾民众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地方意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台湾人的特点”。但是，台湾意识中包含有积极的成分，也存在狭隘的地方。³台湾意识的形成与台湾的历史密不可分。关于台湾意识的形成，主流学者一致

1 参见台湾国民中学教科书《认识台湾（历史篇）》中称：1662年郑氏“建立台湾历史上第一个汉人政权”，“一般文献有的称之为延平王国”。对此，中国大陆学者邓孔昭通过大量历史资料的检索，证明所谓“延平王国”乃某些人出于政治目的的刻意杜撰；在“一般文献”中，对于郑氏政权有各种称法，就是没有“延平王国”一说；郑氏政权自始至终保持着明朝属臣的身份，从未有任何的“专擅”和“僭越”。

2 这里的极端主义者指的是史明，一个极端台独主义者。参见施正峰：《台湾民族主义》，台湾：台湾前卫出版社，1994年12月，第209页。

3 孙云：《台独理论与思潮》，第132页。

认为它是从 17 世纪开始的缓慢的历史过程。¹台湾意识的开始于大陆移民的不断增加，成形于以汉族为主导的社会在台湾的建立。由于移民的涌入，特别是福建和广东移民的涌入，台湾本土逐渐形成了以客家人和闽南人为主体的文化传统，并且不同的方言人群聚居形成一种特别的台湾独有的语言认同，加上台湾特有的岛民意识，共同构成了台湾的本土意识。²

台湾意识从横向上看，其实就是岛民心态。作为中国大陆东南端的第一大岛，台湾与大陆的福建省遥相呼应。其最近处仅仅 130 公里，最宽处不足 200 公里，虽然它与福建省在海底连为一体。但也应该看到的是，台湾这种地理位置极易被中央边缘化。正是由于路途遥远、海路难行、内部矛盾等客观因素，我国的中央政权对台湾实行行政管理的管辖相对较晚。³从三国以来，直到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台湾在这一千多年里是个缺乏管理的岛屿。这种地理位置容易使得台湾人产生对大陆的疏离感和自卑心态，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同和帮助。也正是这种疏于管辖使得台湾本土的居民的思维比较活跃，参与意识比较高，认同的变换意识较强，灵活性较大等特征。

由于不同的历史背景，台湾意识不断在历史发展的纵向上添加了很多新的内容。从移民时代所带来的敢于打拼，敢于向海外求得发展的意志和精神之外，还有面对西方殖民者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与强烈的爱乡意识。这些台湾民众在经历过几个世纪的沧桑，见证了沦为殖民地后台湾的惨状，因此又衍生出爱国意识，悲情意识和“疏离感”，认为台湾沦为此景原因在于大陆对本岛居民的命运的不顾。这种意识随着晚期清政府的腐朽不堪和民国政府的贪婪无能而进一步的强化，以至于形成今天的相对大陆的“自认优秀”的心态。按照高民政先生归纳，台湾意识存在着三大特点和两面性。三大特点是：爱国性，反抗性，这是它的正面。而抱怨性，排他性，和分离性则是它的负面。⁴可见台湾意识不仅是有其时代的烙印，更有情感上的痕迹。它存在明显的正面和负面的矛盾性。

关于中国意识，有人将之与台湾意识对立起来。⁵其实，中国意识的理解并不是那么极端。台湾主体是汉族，那么无论上从血缘上，文化上还是语言上，都是中华民族的范畴。文化上的血肉联系与汉民族的生活风俗永久的烙刻在台湾民众的心理层面，由于这一层面过分普通，加上日本在殖民时代的皇民化教育和国民党时代灌输的“反抗大陆”的思想意识，使得很多人对中国意识产生一种认识上的错觉，认为“中国意识”即是“大陆意识”。如果有中国情结，随之就是统一的和回归大陆的内涵，这种看法虽然有道理，但过分强调不但没有起到正向宣传的效果，反而带来的是“冷漠和疏离感”。中国意识成为台湾政治斗争中的一种话语，成为一种政治主张。在台湾人看来，他们所理解的中国意识在国民党的统治时代可以概括为三条：1，台湾人是中国人；2，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3，中华民国的法统地位不

1 这句话也就是意味着在 17 世纪之前，台湾民众没有台湾本土意识。具体分析见：李纯青：《研究台湾问题》，华艺出版社，1992 年；孙云：《台独理论与思潮》，第 132 页。中国国家领导人贾庆林也认为台湾意识形成于近代，见《统战月报》，2009 年第 8 期，上半月刊，第 44 页。

2 台湾的人口结构也反映出了台湾意识的来源。在 1990 年进行的台湾人口结构调查的过程中，闽南人的后裔和客家人的后裔一共占到了台湾本土人口的 85.4%，参见《台湾研究》，1996 年第 1 期第 9 页的台湾人口结构表。

3 王雅静：《从两岸对中国认同的意识差异析文化台独》，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李军山，2008 年 5 月，第 25 页。

4 同上。

5 参见胡公展：“关于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的讨论”，《两岸关系纵横论》，北京：学林出版社，2005 年 12 月版，第 223 页。

可动摇。¹而正是这种“中国意识”使得中国结在台湾民众中成为一种政治象征，而非文化和地理象征，充斥一种意识形态和专制的色彩。这才会被台独分子利用，发起以“台湾意识”对抗“中国意识”的争斗，在两败俱伤之时，赢得“台独意识”的支持。

台独不同于台湾意识、更不同于中国意识。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台独”特指一种思想，把台湾分割出去，使之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政治主张和思想倾向。²台独是把台湾跟大陆彻底割裂的一种企图，而不是自然形成认同情感的“台湾意识”。³部分欧美学者认为现代人们对台独认同实质上就是认同“台湾民族主义”，他们认为这一种认同形成于近40年前，也就是中国的民族国家构建的重要时期。因此，他们很多人认为“台独实质上就是区别于大陆的他人意识。”⁴它存在于民众之中，是个复杂的混合体，它融合了很多台湾意识的成分，并结合台湾历史创伤带来的记忆，包括了对政府的不满等，是一种庞大的认同载体。

关于台独与中国意识的区别，其实很简单，就是“去中国化”。但是“去中国化”是个很大的泛化概念。它包含了各种不同的利益导向的目的。这种意识中有很多混杂的内涵：有离开大陆独自发展的“台湾经济中心主义”；有脱离中国政治意识形态，反对红色中国的“台湾政治民主中心主义”；有“不统不独”的现状论者；有惧怕大陆，通过深刻的悲情历史记忆认为台湾回归大陆必将成为牺牲品的“悲观论者”；也有害怕回归大陆后进行权力重组和政治重构的国民党人士；更有一些希望求得并谋取政治经济资本的利益集团和政客等，不一而足。可见台独意识并不是极个别现象，而是成为一种典型的社会认同意识。

二、台独：历史的伤疤·现实的错位

台独从其产生，发展到壮大都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其可能性与必要性的。台独产生就有其地理位置、历史基础和思想意识方面等“自然因素”。正如吉登斯所说，“行动者不能自由的选择如何创造社会，而是受限于他们无法选择的历史位置的约束”，台湾民众不能选择自己想要的历史，他们做出的很多的选择完全是属于“无奈之举”。⁵悲情意识再度在台湾弥漫，沦为殖民地的台湾在大陆陷入政治和侵略战争之中唯有自我挣扎。台湾人想通过自我的爱国反抗获得大陆的支持，但无奈的是一个殖民地的标签始终压抑的大陆和台湾的亲密关系。吴浊流的小说《亚细亚的孤儿》所展现出来正是无奈的“台湾意识”。

台湾被光复的时候也是蒋介石代表大陆收复台湾的时期。虽然台湾在此刻顺利回归祖国，但是这段时期发生的事情令两岸官民感觉并不愉快。经受过残酷的封建压迫的台湾民众，并受到一组的奴役统治，国民党政权来到台湾之后，不断没有给予台湾人民应有的尊重和帮助之意，反而对其实行专制独裁统治。正是由于这种长期屈辱，被压迫的境遇，台湾民众强烈希望自己能够当家作主，寻求“出头天”。⁶

谈到历史记忆，不能不提到台湾民众的“台湾心态”。虽然上文已经提及台湾人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形成了“迁民意识”和“悲情意识”，“爱乡意识”和“保卫感”，但是也正是这些意识使得台湾人的思考方式与大陆不同，产生了“一种疏离感”。这种疏离感由于日本

1 同上注释六。

2 李道湘，“文化台独”的理论及其批判，《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3年第12期，第29—34页。

3 胡公展，《两岸关系纵横论》，北京：学林出版社，2005年12月版，第215页。

4 Pei-chi Chung, “The Cultural Other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Taiwanese and South Korean Media”,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2000, Vol.62, p.99.

5 [澳] 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杨善华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4月，第53页。

6 彭维学：《台独的社会基础》，第15页。

的 50 年的殖民统治而大大强化了，并发展为后来的“出头天心态”，即摆脱受异族伤害和外省人排挤的区域性的群体意识、“小国寡民”心态。如“台湾可以独立自主，不必受制于人”，有“自卑感”和“自大感”；对中国大陆的“亲切感”和“疏离感”，既“自认为是唐山人”，又认为“祖国不要我们了，我怎么能再自称为中国人”；对日本的复杂心态等。¹

这种历史记忆在中国大陆光复台湾之后并随着国民党接受台湾的不合理的治理措施而大大强化了。日据时代，在《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岛内的居民大部分被编入日本户籍，这使得台湾与大陆的关系变为国际接触而非国内沟通的关系，并可在与大陆沟通中获得之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等特权，享受日人待遇。²这种条件吸引了很多从事违法行业的中国人，以及从未到过台湾的大陆人，他们纷纷选择自愿加入日本国籍，逃避中国法律罪责，在中国东南亚沿海为非作歹，被称之为“台湾呆狗”。³这种行为和意识深深影响到了进行光复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台湾光复后，大陆人对台湾人存在着一种不信任，甚至歧视的态度。而这些厌恶的观念最终影响了国民党大局对台的治理政策。南京国民政府在光复台湾后制定多项政治经济措施。在政治上实行行政长官公署制，形成了台湾政治的一元化格局。虽然沿袭了日本“台湾总督府”高度集权的特征，但是这却使得台湾一切政治、经济体制皆异于国内各地，俨然化外之境，⁴很多敏感的台湾同胞，都认为这是一种变相的台湾总督制……是一种与其他各省的同胞有殊的不平等的待遇，从而产生了对南京国民政府不信任的心理。⁵在经济上，国民党当局采取了台湾货币特殊化，推行经济统制政策，实行专卖制度、贸易统制。主要工矿企业公营、粮食管制等措施，不仅引起了台湾民众的反感，也造成了光复初期吏治腐败，物资匮乏，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局面。民怨沸腾，失业问题十分严重，台湾已经处于濒临爆发变乱的边缘。正如一个记者所说，“今日台湾危机四伏，岌岌可危，是随时可能发生骚动或暴乱的。”⁶

在国民党败逃台湾之后，台湾民众的政治认同从迷乱中走向稳定，重新回归到对一个中国的认同。“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成为众人皆知的常识。但是这种良性发展并没有稳定很长时间，在蒋氏父子的威权统治结束后，台湾开启了民主化时代。虽然政治实现了民主化，但是政治多元化所带来的弊端不可避免让那些“台独思想”复位。同时，高雄事件的发生，让台湾民众对政治状况有了另一种层面的认识。这些认识最终回流成了民进党的成立和李登辉与陈水扁的“台独意识”的政治实践。这一时期人们的认同更多受制于政治、而非文化。以前那种异族统治时代回归故土的家园感的台湾民众再一次饱尝另一种层面的认同危机。这种认同危机不是外来施压的结果，而是李登辉、陈水扁之流带有极强的政治色彩的认同变革。它不仅使得极端的“本土化”意识复活，更是为蓬勃发展的两岸关系制造障碍，阻碍台湾人真正幸福。这一时期的最大特点就是“稳定的认同感”为主，极少数具有台独意识的台独分子通过权力运作让“认同感”复活，实现其本人与其所在的政治团体的不同的政治目的。

1 关于这些分析的详细讨论，见于厦门大学陈孔立教授《台湾学导论》中进行的系统的分析与总结。所引用的材料见于彭维学：《台独的社会基础》，第 16 页。

2 向珊：“日籍台民与台独意识”，《华商》，第 117 页。

3 同上。

4 何海滨：《台湾六十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 1 月，第 27 页。

5 唐贤龙：“台湾事变的原因”，载邓孔昭编：《二·二八起义资料集（上）》，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1981 年。转引自何海滨：《台湾六十年》，第 27 页。

6 见“随时可以发生暴动的台湾局面”，上海《观察》杂志社，1947 年 2 月 2 日。

由于共同的目标，许多人走到了一起，包括统一派与台独派。而“台独派”被称之为“党外主流派”。¹高雄事件的发生也标志着这些“党外主流派”台独思想的复位。这是对国民党时期中国认同的反对。为什么党外主流派会形成如此台独思想——住民自决论思想？究其原因，主要有三：

第一，僵化凝固的上层政治体制所表达的政治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容易被误解为政治意识形态。这一点正是台湾威权政治的致命弱点。由于中美关系正常化和台湾被逐出联合国，以及中美断交，主流党外人士在对一个中国——中华民国的法统认识表示极端不满的情况下产生“台独”意识。正如施明德在高雄事件中所谈及，“我们曾经在文件上表示过，30年来台湾事实上已经独立，在5月份我们发起重新加入联合国，以中华民国的名义而非台湾名义，在法律上用中华民国，在私下通称台湾，界限非常清楚，台湾独立也就是中华民国独立”。²正是从大陆过来的上层的政治没有吸收更多的台湾籍人士与党外人士的参与，才使得这些不合理的政治郁积无处发泄，结果形成了扭曲的“国家地位台湾化”的理解。

第二，台湾意识的消极部分——疏离感和悲情意识随着台湾的外交颓势和本土中产阶级要求更多的政治权力而加剧。台湾民众并没有饱尝光复后的好处，反而在两种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下的对抗中生存。这种对抗心理的立足点是政权法统的对抗，由于对大陆缺乏了解和认识，有见国民党政府忽视本土人士的利益与权利。台湾主流党外人士的悲情感再一次产生，这次的产生既有冷战带来的与大陆隔绝的痛苦，也有要求国民党政府还政于民的渴望。但是，他们将省籍权力与国家级权力对等起来，形成认知偏差，才会有所谓的“住民自决论”。1978年12月，台湾党外人士发表《国是声明》，指出“在国际强权的纵横捭阖之下，我们的命运已经面临被出卖的危机，所以我们不得不率直的声明：我们反对任何强权支配其他国家的命运，我们坚决主张台湾的命运由1700万人民来决定。”³

第三，美国的大力支持。台独从理论到实践，归根结底是历史的产物。而海外势力和美国的支持，是党外人士发展政治势力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1979年1月，美国制定《与台湾关系法》，将台湾的安全作为美国的国内法阐述的主题，严重干预的中国内政。

正是由于中华民国的法统地位，国民党才能名正言顺的享有与中国大陆对等的地位。但是，这一认识也随之台湾本土的多次社会运动也趋于瓦解。蒋经国所面对的是一个逐渐成熟的要求高度政治参与的台湾民众。台湾意识随着经济的发生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变得尤为强烈。因此，上层的政治体制即国家层次的政治体制与下层的政治体制即台湾地方层次的政治体制不兼容性越来越突出。国民党要面对的是一种本土化的选择。

这种本土化的选择是在台湾的国民党不得不做出的选择，是为了保有政权的一种绝对要求。而民进党恰恰相反。作为在高雄事件后，受惠于美国的政治支持和台湾各地政治运动的民主进步党，它的产生虽然是台湾民众本土意识提高的结果，但充其量也是地方党派。也就是说，民进党的层层仅仅是台湾本土的地方政治组织。但是这个政治组织要求获得政权，理所当然要得到民众的支持。但是，他们把台湾民众的政治支持混淆为全体民众的政治支持，把台湾的独立认同为仅仅台湾本土人民决定的结果，这是完全背离一个地方政党所能做出的选择。

1 张凤山：《台独的历史演变》，第87页。

2 《中国时报》，台湾，1980年3月21日。

3 陈峰强：《陈水扁与台湾民进党》，北京：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第71页。

这种奇怪现象，反映出的正是“小”中华民国的疆域与台湾省的矛盾，“大”国家理念与“小台湾理念”的矛盾。中华民国虽然地图和行政区划是整个中国，但是其实际管辖仅在台湾省和福建省的一部分；而国民党却有强烈的国家主权，以维持中华民国的法统地位，却要不得不进行上层政治体制的变革，采取台湾省化的方式以适应当前的生存境况。民进党作为台湾省的地方政党，却可以以一个很大隐形“全国性”框架下竞争国家主权的归属；民进党这个地方政党却能够替换中华民国这个国家层面的大型政党。这些奇怪错位再加上台湾的地方疏离感和台湾本土的“亚细亚孤儿”意识就更加复杂化了。

三、建构中的台独

台独不仅仅是随着历史记忆的发展深深烙印在台湾民众的心理之中。台独在当代也呈现出越来越激烈的态势。究其原因，是这种思潮被部分人士宣传强化建构的结果，而正是这种建构使得本不应该上升到政治斗争层次的意识问题变成了一种选择。这种从不允许做出选择到能够做出选择也是部分人士多层次建构的结果。

1. 政党建构：作为联结政府与民众纽带的政党，这里特别指的是民进党，在台独建构战略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作为一个明确以建立“台湾共和国”为目标的党，民进党是个不折不扣的台独党。民进党将“台湾主权归属未定论”作为其建构台独意识的理论，通过刻意贬低《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在国际法上的约束力，漠视台湾在二战之后已经回归中国的历史，并曲解美日等西方国家一个中国的立场，实现本土的“台湾归属未定论”的论证，利用台湾意识一些消极的倾向制造中国意识与台湾意识的对抗，将工具性层次的“住民自决论”通过台湾的社会转型不断渗透到台湾民众之中，实现台独的意识形态的建构。民进党对台独意识的建构正体现出台湾社会转型期间政治多元化的特点，而党内也将台独视为“颠扑不破”的真理，是凝聚民进党至高无上的品牌，“台独党纲是民进党至高无上的神主牌，放弃台独立场，民进党即如失魂之徒，全党势必分崩离析、意识涣散。”¹

2. 内部因素建构：而这种建构最为关键的是重新建构一种只有本族群才享有的文化。台湾文化本土化，去中国化则是台独建构的主要目标。2000年，民进党陈水扁上台后就提出了“台湾文化”，用“华人文化”取代“中国文化”，要“让立足台湾的本土文化与华人文化，世界文化自然接轨”，台独意识在民进党执政之后开始。在学术界，台湾史，原住民史、“二·二八”事件的研究，鼓吹台湾意识已经“超脱了强调血统的中国人论”。这种台独认同建构即最为著名就是民进党著名的“去中国化运动”。这种运动在台湾外事机构中显示的更为明显。2000年11月，民进党上台才半年，台湾“外交部”就命令各驻外机构，停止使用“国徽”；2002年，不用“中华民国”字样，改名为“台湾代表处”，2003年9月，在护照上加注“台湾”。从2005年，陈水扁当局抛出所谓的“台湾正名”问题，更成为“去中国化”的标志性的动作、2002年，陈水扁在元旦贺词中第一次出正式提出要对中华民国宪法进行修订，“要在2008年之前，交给台湾人民一部合时、合身、合用的新宪法”，并组织入联公投，要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²

3. 外部因素建构：作为一个很长时期没有与祖国大陆交流的台湾民众，由于冷战遗留下来的阴影，对大陆产生了疏离感和不亲密感。同时，随着台湾被纳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

1 鞠海涛：“民进党意识形态及其理论基础”，《台湾研究集刊》，2002年第4期，第22—30页。

2 “‘去中国化’：陈水扁当局大搞‘驻外机构’正名”，《台声》，2007年第3期，第23页。

家战略利益体系内，台湾与美国联系非常密切，特别是在卡特时期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的出台，更加剧了台湾与美国的利益交往；同时由于日据时代遗留下来的影响，台湾与日本联系非同寻常。因此，台湾的认同建构在外部来看取决于三个因素：大陆、日本与美国。虽然，台独受到各方利益的制衡，尤其是遭到大陆的强烈反对而在国际上并没有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其渐进性和不断要求的呼声为台独制造了巨大的坚持信念，并通过军事购买美国武器和日本商品加强三地的经济联系，在功利主义的指导下很可能会取得政治上的收益。大陆、台湾、美国与日本在台湾独立与否处于博弈之中，但是有理由相信台独分子一直试图将大陆与美日对立的二元观念作为其宣传和发展的的重要手段。正是强调大陆本身的红色制度、经济体制和政治文化，台独分子获取了已经处在社会转型期更趋近于欧美地区的台湾民众的理解和支持，这种对立情结更加重了台湾民众对大陆的梳理和对台湾突破“大陆”政治封锁而独立发展的渴望。正是这些因素无疑中加剧了台独的危险。

因此，对台独的认同本身并不强烈的台胞受到民进党为代表的政客们的利用，自然会从无意引发有意识，从低级赞同转变为高级赞同，从思量再三转变到支持号召。这种催化的发展也是台湾政治转型时代的特殊产物。因此，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台独的产生是建构出来的结果。从上文的分析出可以很明显看出，台独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它结合着人们的历史意识，并在转型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变迁中被民进党等台湾本土部分人士所利用，成为一种既带有目的性又带有工具性的双重结构。正是这种双重结构才造成了现在两岸统一认同的难度。

四、结语

台独并不同于历史自然发展形成的台湾意识和中国意识，它具有很多自我否定的基础。这种基础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

1. 台湾政权的国家化，但是疆域却省籍化。中华民国的法统地位要求其所代表的政权统治整个中国大陆。按照现实来看，事实上中华民国的治理范围仅仅只在台湾本土，这种强烈的反差无疑不为台独提供了一个内在基础。

2. 台湾政治制度的双重性。上层政治制度异于下层的政治制度。威权体制和基层民众的自治制度并行。这种相互对抗的制度共存于一个岛中，对台湾民众的政治参与产生深刻的影响。从地方选举出来的政治精英没有固定的渠道进入高层参与政治生活，而占据高位的国民党精英很少关心和提拔来自基层的政治精英。这种威权体制的长期发展加剧了所谓的“省籍矛盾”，促进了台湾意识的消极转型，为台独的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

3. 外在因素的影响。这里所说的外在因素分为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正如上文已经多次提及，纵向的外在因素来自于对台湾本省的历史记忆的回顾，和在长期受到殖民统治和威权政治下的“亚细亚孤儿”情结，以及狭隘的岛民意识。而横向因素则是中国大陆、美国、日本对台湾的影响。当然这里有着遏制的因素，也有着促进的因素。历史、文化、国际关系与政治交错复杂，衍生出台独意识这个畸形儿。

虽然台独分子一直在建构台独，并通过台独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手段服务，但海峡两岸历史悠久，地缘进，文缘深，语缘同，商缘广。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的事实是永远改变不了的，中华文化经过几千年来积淀形成文化认同和血缘认同也是不能抹杀的。如今两岸之间交流和发展正在逐步深化，随着两岸之间的理解逐步加深，中国统一的大业虽途远但光明。

商业精神对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影响*

韩冬涛**

【内容提要】商业精神本身的含义是指商品交换活动中人的意志和利益的体现，是商业的理念、宗旨、目标、价值观和总体精神风貌的综合反映。但是本文中所用的商业精神具有一定的历史特性。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首次提出了“资本主义精神”这一概念。他的“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于新教伦理，并历经漫长的积淀，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间点上而成形的。为了更好的体现出“资本主义精神”历史的积淀性，本文采用了商业精神这一概念，即追求财富、自由、平等的开拓性精神。这种开拓性精神伴随着古希腊、古罗马以及中世纪商业的发展不断积淀，最终随着资产阶级的出现和形成逐步转化为资本主义精神，在这个转化的过程中商业精神对于国家行为体的影响是以往的研究中所被人忽视的。本文希望借鉴马克斯·韦伯的研究方法在制度、技术等物质性方面以外，探寻精神动力对于国家行为体乃至对国际格局的影响。

【关键词】商业精神、民族国家、重商主义、经济自由主义

欧洲中世纪前的商业发展与商业精神

欧洲商业文化历史悠久，甚至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古代希腊地处地中海的东部。它的地理范围以希腊半岛为中心，包括爱琴海、小亚细亚西部沿海、爱奥尼亚群岛以及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的殖民地。它的自然地理条件是多山环海，地势崎岖不平，仅有的小块平原被难越的关山所隔。土地多不适合种植粮食作物，而适合种植葡萄和橄榄。海岸曲折，岛屿密布，多良港，航海条件极好。特有的地理条件决定了希腊人只有通过商业贸易才能维持生存和发展，而对于希腊来说，这种贸易只能是海外贸易。正是在不断的贸易过程中造就了他们富于开拓性的商业精神。

公元前2000年，出现在克里特岛的克诺索斯王宫是欧洲第一个实际组成的国家。克里特人去塞浦路斯采购铜，用来与来自西班牙和大不列颠的锡制成合金，从埃及运来小麦、金、象牙和莎草纸。宫中有国王的大殿、接待室和起居室，占王宫一大半面积的是众多的仓库和手工业作坊，这一情形也比较符合从事贸易民族的特征。¹大规模的海上贸易使克里特岛成为了各地商路的汇合点。公元前8世纪起，希腊进入城邦时代。希腊城邦经济上，商品经济发达，工业和农业都有面向市场的特点；政治上，普遍实行共和制，虽有王权，但是日渐衰微，城邦公民拥有比较充分的政治权力。正是由于发达的商品经济，希腊产生了一个有少数经商致富的平民组成的工商业者阶层。希腊人除了建立自己的城邦，还进行了大规模的海外殖民活动，建立了许多新的殖民城市。历史上称为“大殖民”。除了解决人口增长的问题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一些工商业者为扩大经营范围，到海外开拓新的商品市场和原

* 本文的修改稿曾于《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11期刊发。

** 韩冬涛，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2010级博士生。

1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文明到21世纪》（第七版）上册，董淑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68页。

料产地。¹在殖民时期，形成了“国际性”分工。在公元前 700 年左右，世界历史上首次出现了货币制度—吕底亚，爱奥尼亚的各希腊城邦使之成为了国际交流货币。“货币经济动摇了城市社会的社会状况，使货币资本比土地资本变得更为重要”。²大规模的殖民运动使希腊同地中海周边的西亚、北非、中欧和西欧地区连接起来，构成了一个海洋与大陆交错，东方与西方联结的前所未有的地中海贸易圈。在这一过程中壮大和增强了希腊工商业者的力量。雄厚的经济实力使工商业者阶层开始关心政治权力，影响城邦政策。公元前 6 世纪初，雅典的工商业者阶层不满贵族独掌政治权力的现状，要求推翻贵族统治，实行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改革。公元前 594 年，梭伦的改革应运而生。改革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包括限制粮食出口，扩大橄榄油输出；实行货币改革，以利商业贸易；奖励外地工匠依据雅典，提倡公民学习手工业技术。³梭伦的改革不仅改变了贵族专权的局面，而且把雅典导向了民主政治和发展商品经济的道路，奠定了雅典的繁荣。400 年之后，伯罗奔尼撒战争使希腊的繁荣付之一炬，代之以马其顿的崛起。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制止印度边境的整个波斯帝国，其目的在于消除其威胁，并为希腊的商业贸易打开东方的市场。亚历山大大帝命人打开盛满波斯财宝的金库，把掠夺的金银铸成货币，投入流通，这样便促进了生产和贸易。公元前 3 世纪中期至公元前 2 世纪中期的 100 年里，罗马人开疆拓土，扬威万里，使地中海成为了罗马的“内湖”，欧洲进入帝国时期。在公元前后，出现了一个持续大约两世纪的贸易大发展时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包括整个地中海以及欧洲中部和西北部大部分地区在内的罗马帝国的统治得到了加强，出现了所谓的“罗马之下的和平”时期。在这一时期里过去一直阻碍贸易的土匪和海盗行径已经绝迹，关税壁垒和各种杂费也几乎全被削减，形成了一个安定的统一市场。然而，12 世纪最后的 30 年中，出现长时期内外交困的混乱局面，与罗马和平时期形成对照。政治上的混乱导致了贸易的衰落，过度的支出引起了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货币变得毫无价值，商品交易又回到了物物交换的原始阶段，工业逐步转移到农村和庄园，帝国经济又退回到自给自足的状态下，加之经济技术落后，生产力低下，国家收入逐步减少。⁴在日耳曼民族的不断进攻中，帝国大厦渐渐倾塌，476 年，西罗马帝国覆灭，随之消失的还有欧洲的统一。

一、 中世纪商业发展的没落与商业复兴

（一）中世纪前期的欧洲经济

公元 6 世纪起，伴随着日尔曼王国的建立，欧洲进入了中世纪。7 世纪，东方阿拉伯帝国崛起夺取了地中海的东、西、南三面，造成了地中海的封闭。由于地中海曾经是商业的大动脉，航运停顿以后，商业活动迅速衰落。8 世纪末期以后，土地成为生活的唯一来源，是构成财富的唯一条件。所有各阶级的人从皇帝到最卑贱的农奴，均直接或间接的依赖土地的产物为生。动产在经济生活中不再起任何作用。整个社会生活都建筑在土地或对土地的占有上。9 世纪时西欧进入封建社会，开始流行一种适应封建制度的新型农业经济组织形式—封建庄园。庄园分为领主自营地和农奴份地两大部分，农奴依附于封建领主，为领主耕地，向

1 马世力，《世界史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 7 月第一版，141 页。

2 [法] 德尼兹·加亚尔，贝尔代特·德尚，丁·阿尔德伯特，《欧洲史》，蔡鸿滨等译，海南出版社，2001 年 10 月第一版，63 页。

3 马世力，《世界史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 7 月第一版，148 页。

4 对于西罗马的衰落，众说纷纭。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认为西罗马的贸易、农业、工业均落后于东罗马，西部的经济落后于东部是造成西罗马早于东罗马陷落的主要原因。作者赞同这一观点。

领主交税，而封建领主向农奴提供劳动工具，保护其人身安全。庄园内还设有手工作坊，制作庄园内所需的生活和生产器具，庄园的生产满足了自给自足。中世纪皇权衰落，教权至上，正是教会显赫的地位使之成为另一个大地产的持有者。教会不仅用土地束缚人民，更从精神上剥夺人们对于财富的追求。教会的世界观认为“土地是上帝赐给世人，使之能够在人间生活而期望永恒的得救。劳动的目的不是增加财富而是保持一个出生时的地位，直到从尘世转入永生。追求财富必然陷入贪婪的罪恶。贫困起源于上帝，是上帝的意旨所决定的”¹。9世纪起教会禁止俗人放款取息，而把放款取息权交给教会法庭来裁夺。并宣扬一般的交易与货币交易一样，也是不名誉的。经商活动从伦理道德上受到了歧视。因此，在这一时期欧洲大陆“找不出专门的商人。没有商人的存在，或者说，除了犹太人以外没有商人”。²但是欧洲的商业文化和商业精神并没有消失，位于欧洲边缘的亚平宁半岛使代代相传的商业精神得以继续延续。

（二）中世纪后期的商业复兴

10世纪以后，西欧的商业活动增多，商品交换日益普及，发展不断扩大，开始步入商业复兴。“新型的大城市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阵地”。

³这一时期的城市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意大利的各城市，如威尼斯、比萨、热那亚，以地中海转口贸易为主；另一类是与欧洲市场相联系的工业中心，如布鲁日、根特、卢卡、伦巴第，以生产手工业制成品为主。但是两类城市有根本性的不同，意大利的各城市趁日尔曼皇帝长期空缺的机会取得了实际的主权，由贵族担任执政官，实现了城市自治；而欧洲大陆的城市始终是严格意义上的“市民的城市”，也就是说是在围墙里边，由于管理乡村不同的法律来治理的城市，城市的管理权仍在封建王公或者封建领主的手中。开拓性的商业精神在意大利自治城市的商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阿拉伯帝国的崛起另欧洲丧失了对地中海的控制，欧洲与东方的贸易被割断，但是封建主阶级对东方的香料和奢侈品有着巨大的需求，这使意大利自治城市的商人们看到了商机，他们与身为异教徒的阿拉伯人建立了商业联系，在地中海的奢侈品转口贸易中获取了巨额利润。但是他们并不满足，期望获得更多的财富。在基督教普世精神的感召下，基督徒开始了收回圣地的十字军东征。威尼斯商人把握了机会，在第四次东征中，成功地将小封建主的野心引向了君士坦丁堡，他们尾随在十字军之后，沿途设立商栈，最终夺取了拜占庭帝国的商业战略阵地。正是这些“利益熏心、不择手段”的意大利商人促进了欧洲的商业发展，使商业精神得以传承。由于十字军东征和意大利商人的作用，基督徒又开始掌握了地中海的统治权，海运商业得以复兴，并迅速的向欧洲大陆深入。农业因市场需要农产品受到刺激，受交换经济的影响而变成交换经济的一部分，内陆的工业城市也同时受到刺激迅速发展。城市重新变得重要起来，10世纪下半叶改变的征兆已经显露，流浪的商人寻求城市的保护并且定居，他们的集合也引起了工匠们的集合，促进了城市商业经济的发展。新兴城市中商人和工匠的生活不再决定于他们与土地的关系，原来受地主雇佣，由大地主保障其生活的庄园代理人所断断续续经营的工商业，变成了独立的行业。随

1 [比] 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乐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第一版，11页。

2 [比] 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乐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第一版，9页。

3 西欧城市从兴起一直到14世纪，发展水平还是相当低，当时5000人以上就是大城市了，其数量仅占城市总数的5%，2000至5000人的中等城市约占20%，2000人以下的城市则占75%。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西欧大部分的城市停留在半乡村状态，农业是城市经济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着商人数目的稳步上升，商人营业的重要性与利润也日益地增加。“这些大商人或者说新富们，自然成为市民阶级的领袖，因为市民阶级本身就是商业复兴的产物”。¹但是教会作为当时最强大的土地所有者和最高精神领袖，其对商业的态度不只是消极，而是积极的仇视，商人的行为和开拓性的商业精神与教会的世界观格格不入，缺乏合法性。但是欧洲商业发展的洪流已不可阻挡，为商业正名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伴随着封建王国向民族国家的转变悄然兴起。

二、 商业精神的“合法化”

（一）商业精神的理性发展

商业以赚钱为目的和动机，赚到钱的多少是衡量一个人能力的主要标他们劳动的目的和动机与基督教会所提倡的完全相悖。同时，商人经营要同许多地方的人打交道，他们需要的是能够为他们的商业带来机会和发展的知识。为此，他们在顶着恶名获得了财富，并建立了定居的商业据点城镇时，迫切需要在知识和教育上打破教会的垄断，并适应商业发展的需要，使知识和精神世俗化。11世纪末，在工商业比较发达的意大利首先出现了最早的世俗大学萨勒诺大学和博洛尼亚大学，到12世纪，又相继现了法国的巴黎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13世纪后，捷克的布拉格大学、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等等也建立起来。这些世俗大学的组织和管理完全按当时商业模式来建立，实行自治，大学主要设置文科、神学、医科和法科等课程，办学思想主要服务于理性和非个人的目标，培养学生发展自己的思考能力，特别是培养某些更有才能的学生今后从事某一专科的能力，教与学的主要方式是争论。世俗大学为培养新一代商人，满足工商业的实际需要而建立的，它开启了一个开放的理性的时代，促使人们从神学的教义和原则中摆脱出来，转向现实世界，关注和重视人们实际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引导人们重新审视和思考对过去一些事物的看法。商业和世俗教育的发展使人们开始用理性的眼光重新的审视生活，这种理性的蔓延首先表现在14世纪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中。文艺复兴运动以商业发展为基础首先在意大利开始，在意大利庞大的商人家族不仅控制了贸易和各种制造业，而且还控制了政治事务。正是这些商人家族成为文艺复兴的时期的艺术家和作家的主要资助者。因此，商业家族的需要、私利和偏好影响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复兴，文艺复兴精神的基本特征是“人和世界的重新发现；享受生活的新意识；禁欲主义和象征主义让位于感官享受和自然主义，现实主义替代理想主义；追求知识方面的实验方式替代传统主义和蒙昧主义”。²这些特征正是商人哲学的体现。可见，文艺复兴是对商人意识和商业精神的理性加工和总结。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商业精神得以广泛深入地在市民社会中扎根；通过文艺复兴运动，人们经历了一场商业精神的大洗礼，从而接纳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价值观。但是文艺复兴并未从根本上为商业活动找到“合法性”的理论根据，当时统治欧洲的教会对于商业的压制依然是商业发展的巨大阻碍，商人们所需要的“合法性”在宗教改革中得到实现。

（二）商业精神获得“合法性”

理性主义的火焰蔓延至基督教教义的研究中，一些宗教改革者开始用理性的思维方式重新研究教义。教会的腐败和教权的衰落使宗教改革呼之欲出。1517年10月31日马丁·

1 [比]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乐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第一版。

2 转引自赵立行，《西欧文化变迁中的商业精神》，《学术研究》，2001年第10期，107页。

路德提出了《九十五条论纲》，标志着宗教改革的开始，在宗教改革的过程中产生了新教，其中以加尔文教派的教义与商业精神最为契合。加尔文派提出“天定命运说”，上帝并不想救助所有信徒，而是有选择地拯救一部分人，这部分人便是上帝的选民，其它人则只能成为上帝的弃民。而且，上帝并不是考察了信徒一生在世的行为以后再作判定，一部分人与天使预先被赋予了永恒的生命，另一部分人则预先注定了永恒的死亡，而且，上帝施与或拒绝仁慈，完全随其所愿，一切都归于上帝伟大的正义。然而信徒并不知道谁注定获救，只要确定上帝已经做出选择就应该满足了，下一步就是依赖真实的信仰对上帝表示绝对的信任。世界的存在只不过是为了服务于上帝的荣耀，被上帝召选的信徒的唯一任务就是竭尽全力的服从于上帝的圣戒，从而使上帝的荣耀大大地增加。这样，所有的人都可能是上帝的选民，人人都站在平等的位置上。当然，商人同贵族、农民、工匠一样有可能是上帝的选民。对于世人而言，上帝的荣耀是抽象的，但人们为增加上帝的荣耀所进行的劳动却是具体的，同时劳动所创造的财富也是可见的、可度量的。财富的不断增加，便意味着上帝荣耀的不断增加，在事业经营上不断成功，获得财富，便表示他已得到上帝的恩遇，并同时增加了上帝的荣耀。商人们为赚钱、积累财富找到了理论依据，他们放下了沉重的思想包袱，不再理会教会对于经商的歧视，反而将赚钱看成是自我能力和自我价值的充分体现。产生于宗教改革的新教伦理不仅从精神上使商人摆脱了“贪婪”的束缚，更加从理论上赋予了商业活动以“合法性”。在此必须指出，不是商人选择了新教，而是新教的教义契合了商业精神。

三、 理论化的商业精神对国家行为体的影响

（一）商人与新兴民族君主国君主的联合

中世纪，处于封建制的欧洲其权力结构是分散性的，包括教权、王权和封建领地。在这个权力结构中，“领地是真实的实体，一切权力脱离了领地就变得空洞无物。但是领地只具有个人属性，没有民族性和国家性”。¹因此，在欧洲没有国家的概念，整个欧洲是一个天主教的大世界，上帝享有人民的忠诚，教会掌管着人民的精神世界，教皇卜尼法斯八世更是在1302年颁布的《一圣通谕》中明确表示精神权力高于世俗权力的主张。10世纪起，王权同教权和封建领主的斗争就一直持续不断，总的来说王权居于下风。但是中世纪末期，这种情况开始发生改变。欧洲的商业复兴开启了理性时代，文艺复兴将理性之风传遍了欧洲，人们跳出神权的禁锢，用理性的眼光审视教会。这一时期的思想家马基雅维利、博丹、格劳秀斯对中世纪占主导地位的神权国家观念进行批判，提出了君权观念。教会的腐败在16世纪初成为众矢之的，宗教改革中马丁·路德宣扬“信仰即得救”，主张驱逐天主教会，建立德意志教会。在1523年3月发表的《论世俗权力的论文》中宣称世俗权力的存在是上帝的意愿，是人们的需要，因此人们必须服从王公，即使这些王公是不公正之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打破了基督教会对于欧洲精神统治的基础，教权逐步衰落下去，使一种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国家主义出现。国家主义是一种建设强大国家和强调国家利益至上的地意识。政治上的加强王权和经济上的重商主义是国家主义意识思潮的重要表现。加强王权的过程主要是国王与封建贵族的斗争。封建贵族作为封建领主掌握了大量的土地，禁锢着领地内农奴的人身自由，并且在领地内有经济权、政治权和司法权。在政治上，领地的存在分散了王权，甚至可以对抗王权；在经济上领地的分散性不利于统一市场的形成，农奴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不利

1 刘德斌，《国际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3月第一版，33页。

于手工业的工人需求，阻碍了商业经济的发展。共同的“敌人”给了君主和商人联合的理由。君主从商人那里得到必要的财政支援，也能得到能干、恭顺的官员，为了不断扩大的国家官僚机构配备工作人员。作为回报，君主帮助市民结束频繁的封建战争，废除五花八门的地方封建政权，因为这些政权各自都有自己的关税、法律、衡量制和货币。君主与商人的结合最早可以追溯到 12 世纪初。商业复兴使城市重新变得重要起来，商人和手工业者集中于城市，为了对抗封建领主对于城市的盘剥，城市向国王申请自治特许状，要求城市自治。法国卡佩王朝的路易六世为了加强王权不仅保护王室领地内的工商业，发展贸易，积攒财富，而且支持各地的城市运动，开王权与城市携手联盟的先河。其子路易七世也大力支持城市反抗领主的斗争，曾先后给 20 余座城市颁发自治特许状。其孙腓力二世利用战争、继承和联姻使王室土地增加了近 3 倍，并且是王权和城市的联盟更为发展、巩固，在他的封臣簿上列有 39 个自治城市的名称。通过不断的斗争，王权逐步加强，民族君主国出现了。在君主与商人联合的过程中，商业精神漫漫渗入国家管理层面，开始引导国家政策。

（二）重商主义对国家行为体的影响

商人们普遍认为，货币、金银等贵金属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形态。只有能真正实现为货币的东西，才可以算为财富。因此，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将货币与财富相等同，认为财富就是货币，货币就是财富。在这种社会财富观的支配下，他们把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都看作是为了获取金银货币。从 14 世纪开始，“商业从日常生活的边缘性活动发展成为日常生活的核心内容”。¹其社会财富观在社会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从而使货币成为了社会财富的一般形态。民族君主国面对欧洲各国相互之间的征伐，急需扩充实力，富国强兵，而商人的商业精神和社会财富观正适合了君主的需要。当商业精神和商人的社会财富观应用到国家层面时，便形成了一个理论体系——重商主义。“重商主义流行于 16—18 世纪的欧洲，它反映了但是商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是对国家经济政策的论证”。²重商主义萌芽于 14 世纪意大利各商业城市，分为早期重商主义和晚期重商主义两个阶段。

1、早期重商主义

早期重商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只有能实现并且真正实现为货币的东西才是财富，因此，财富就是货币，货币就是财富；于是把国家的经济政策和一切经济活动统统归结为攫取金银”。³主张严禁金银出口，在对外贸易上奉行绝对的“少买多卖”原则，使“金银流入而不流出”，积累国家财富。因此早期重商主义被称为“重金主义”或者“货币差额论”。15 世纪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欧洲对货币尤其是贵金属的需求急剧增加。1493—1520 年间，欧洲共产银 4.5 万公斤，年产量只有 1600 公斤。因此向外扩张寻求贵金属成为首要的目的；此外，对香料尤其是食用香料的追求也是目的之一。传说中富庶的东方成为他们理想的彼岸。但是，15 世纪中叶以来由于欧亚局势的变化，传统的商路障碍重重，欧洲人只好另外开辟新航路。于是葡萄牙向南、西班牙向西南，揭开了地理大发现的序幕。在新航路的开辟过程中，葡萄牙到达了非欧海岸和印度，西班牙发现了美洲大陆，并建立了一系列的殖

1 [美]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文明到 21 世纪》（第七版）上册，董淑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 1 月第一版，281 页。

2 姜德昌等，《人类精神文明发展史（卷 3）：资本主义和工业时代的精神文明》，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 年 1 月第一版，45 页。

3 唐晋，《大国崛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 12 月第一版，150 页。

民地。当葡萄牙从亚洲带回的香料和西班牙从美洲带回的金银涌入欧洲时，财富的光芒使各国的君主血脉喷张，紧随其后对外扩张，也开始了欧洲各国的商业竞争。这一时期荷兰在欧洲的崛起具有代表性。尼德兰原是西班牙的属地，是欧洲资本主义萌芽发生较早的地区，工商业发达，在其发展过程中因反对西班牙独占海外贸易排挤尼德兰而发生革命推翻了西班牙的专制统治，建立了欧洲第一个商业资本主义国家——荷兰共和国。独立后的荷兰在16世纪末开始了其海外扩张。1602年，荷兰建立了荷属东印度公司，这是一个合股公司。合股公司这个“新的经济组织是进行经济动员和经济渗透最有效的工具，任何想用少量的钱做投机的人，都可以不冒自己整个前途之险而如愿以偿”¹。对于个人来说不需要关心公司的经营和市场的情况，只需对所买进的公司股票负责即可。荷属东印度公司采用股份制向全社会募集资金，甚至小到十几个荷兰盾，1609年建立的阿姆斯特丹银行广泛的收集社会闲散资金投入海上贸易。股份制和金融业的发展把广大居民的利益和海外贸易直接结合起来。荷属东印度公司建立的过程就是荷兰商人、冒险家同政府联合进行扩张的过程。荷兰政府作为东印度公司的后台是其强有力的后盾，并且东印度公司的掌控者在共和国政府和议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东印度公司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很大。虽然英属东印度公司比荷属东印度公司早建立两年，但是由于资本过小，并且从封建的斯图亚特王朝那里得不到任何支持，竞争不过荷属东印度公司。正是荷兰全国上下各阶层乃至政府的都卷入到海上贸易的大潮中，荷兰这样的小国成为了盛极一时的“海上马车夫”。早期重商主义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就是英国。“16世纪40年代以来，英国海盗业兴盛，以抢劫西班牙的非洲西海岸为目标。这种行为尽管没有得到本国政府的公开批准，但却得到了女王和政府实际上的首肯和支持。海盗组织的资金和经费有一部分来自英国的贵族、资本家和女王”。²当时最著名的海盗头子德雷克甚至被授予爵士头衔，他也放弃了从前对西班牙的航线的攻击，为了英国的利益着想改为夺取和占领战略性港口来扼杀西班牙的商业体系。正是长时期的航海劫掠活动培养了日后英国皇家海军的精英，为英国成为海上霸主奠定了基础。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和自身实力的增强，英国也投入到扩展海外贸易拓展殖民地的活动中，在北美和南亚开拓了大片的殖民地。在资产阶级革命后，特别是吞并苏格兰和爱尔兰之后，英国的政治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开始把矛头指向海上的主要竞争对手荷兰。1651年英国提出《航海条例》，旨在奖励和保护本国的航运业和海外贸易，目的是打击荷兰的海上优势。经过三次英荷战争，荷兰的海上霸权衰落了，代之以英国的海上霸权。光荣革命后英国开始推行积极地对外政策，开始了同法国的争夺的历史。在海外殖民地扩张活动中采取攻势，并且通过一系列的欧洲大陆王位继承战争夺去了大片法国殖民地。“英国和荷兰的商人在政治事务中扮演了特别重要的角色，两个国家都采取了鼓励海洋贸易的策略，发展成为海上商业帝国。宪政体制让企业家可以在最小程度的政府干预下追求经济利润。……事实上，英国和荷兰在很多方面代表了商人与统治者的联盟，他们也共同受益于此。商人把从贸易，特别是海外贸易中赚取的金钱，用来支持国家；与此相适应，统治者也遵循保障商人的政策，为他们的经济利益保驾护航”。³法国路易十四在位

1 [美]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修订版）》，吴象婴、梁赤民、董书慧、王昶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第二版，395页。

2 李化成，《世界历史中的博弈生存》，光明日报出版社，2005年9月第一版，44页。

3 [美] 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魏凤莲、张颖、白广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679页。

期间,任用柯尔伯实行早期重商主义,柯尔伯曾对路易十四夸口:重商主义能够使路易十四拥有全世纪。柯尔伯的经济政策确实使路易十四的法国成为了欧洲大陆最强盛的国家,但是连年的战争,宫廷的挥霍,以及其政策先天性的缺陷使法国的财政在路易十四辞世时濒临崩溃。柯尔伯的重商政策实际上是“重商抑农”,忽略了农业对于整个国家经济的基础性作用,工商业的发展是以牺牲农业达成的,而且行会对工业的控制及重税政策也制约了工业的繁荣,错误的宗教迫害致使重商主义最为看重的人力与财力的大量流失。西班牙和荷兰同样由于过于重视“货币平衡论”的作用而导致衰落。整个16世纪,西班牙的国王、贵族和商业资本家都十分重视防止金银的输出。西班牙在16世纪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封建生产方式仍占统治地位,封建贵族在这一时期还没有丧失他们的主要特权,重商主义采取了符合贵族利益的方针,国家对工业的发展一点也不感兴趣,对商业也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西班牙历代国王都把禁止金银输出作为一项严格的政府规定。把金银保存在国内不仅没有增加财富,反而抬高了物价,更不利于原本就落后于欧洲其他国家的西班牙工业的发展。在荷兰,当权的商人只关心与自己有关的海上贸易与转运业务,国内的工业发展比如造船业等也主要是服从于短期的商业利益,这就造成了荷兰国内工业基础的薄弱。国内缺乏足够雄厚的工业基础,造成国内经济的脆弱,无法抵御英国的《航海条例》的影响。

2、晚期重商主义

与这些实行早期重商主义国家的衰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英国对于重商主义理论的发展,从而进入晚期重商主义的良性发展。晚期重商主义主张在保证有更多的金银运回本国的前提下,强调重商主义发展手工业,强调以生产为基础进行商业扩张,因此晚期重商主义被称为“重工主义”或者“贸易差额论”。英国晚期重商主义的杰出代表是托马斯·孟,其代表作《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被马克思称为重商主义的圣经。托马斯·孟本人即英国的一个大商业资本家,是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之一,政府贸易委员会的成员,是英国贸易平衡论的创始人。托马斯·孟的重商主义理论极大地影响了英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在农业方面,托马斯·孟把农产品归入‘自然财富’一类,提出了扩大农产品出口的方针。他建议扩大耕地面积,充分利用荒地,以保证原来从外国购买的苧麻、亚麻、绳索、烟叶及其他商品的供应,制止这类外国商品的进口。孟希望把英国变成向外国输出农业产品和其他一切商品的货栈”。¹圈地运动成为议会批准的“合法”行为,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按资本主义的原则组织牧羊场,以便大量地生产羊毛,以供应制造毛纺织品的手工工场所需;成千上万的农民丧失了土地,形成“自由”劳动力。圈地运动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和广大的国内市场,为以毛纺织业为主的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晚期重商主义使英国农业实现了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农业生产直接面对市场。在工业方面,托马斯·孟把为出口而生产的工业品和在国外经营转运贸易得来的财富归入“人为财富”,为了增加他所说的“人为财富”,托马斯·孟主张扩大本国的工业和手工业,他认为英国对亚洲和其他国家原料的加工,会给英国带来很大的益处。在托马斯·孟看来,“人为财富”的增加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它可以无限地增多向外国出口的商品。托马斯·孟进一步提出了发展本国工业、手工业的具体措施。他强调国家干预的作用,主张国家实行保护关税的政策,他建议国家允许输往外国的商品免

¹ 转引自 李霞,《从重商主义的发展分析英帝国的崛起》,《济南大学学报》,2000年第17卷第5期,66页

税出口,对输入后准备再输出的商品给予照顾,不征收过重的关税;对国外进口的消费品课以重税,以使国家在贸易平衡上处于有利地位,从国外吸收大量货币。“托马斯·孟的‘人为财富’理论,使英国重商主义超越了‘金银’财富理论,使人们对工业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而更加重视发展工业”。¹托马斯·孟的另一重要贡献是主张货币输出,认为货币投入国内市场不能增加国家财富,只有把货币输出国外,发展对外贸易,特别是转口贸易,依靠贱买贵卖,使更多的货币流入本国,才能使国家富足,所以他认为,对外贸易是增加国家财富和现金的工具和手段。晚期重商主义阶段,英国政府推行保护本国工商业的政策,主要体现在积极引进专业技术人才,鼓励和禁止某些原料的进口和出口,鼓励工业制成品、特别是呢绒的出口,积极开拓欧洲市场,扶植本国商人,限制外商特权,发展航海事业,支持海外探险队和对殖民地的掠夺,等等。“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英国人开疆拓土,用战争构筑起庞大的殖民帝国,它以商业与贸易为目标,政府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兰德斯曾以针见血的指出:没有一个国家更能响应商人阶级的要求,没有一个国家更能警觉战争的商业含义。到18世纪,以英国为中心,辐射到整个殖民地的商业贸易圈基本形成”。²

(三) 经济自由主义对国家行为体的影响

由于经济的政策的有效调整,英国的农业、工业、商业协调发展,英国的实力迅速增长。“1688—1770年,按不变价格估算,国民年收入从5000万英镑提高到1.3亿英镑,对外贸易从1700年至1709年增长了一倍,政府关税在1688年至1755年间也增多了一倍。由于英国已经形成了资金、自由劳动力、商品量供应、国内外市场、企业家和技术工人队伍等工业革命所必须具备的要素,工业革命的历史走向终于成为定局”。³18世纪中期,以大机器生产为标志的工业革命在英国兴起。随着工业革命发展的是超越晚期重商主义的经济理论——经济自由理论。英国的自由经济理论可追溯到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的学说。与重商主义认为异国的财富取决于它的贵金属拥有量不同,经济自由主义认为一国的财富最终取决于一国可以用来和他国交换的产品。因此,国家的生产能力是一国取之不尽的财富源泉。要增加一国的财富总量,就必须发展本国的生产,增强本国的经济实力,在此基础上大力发展对外贸易。技术的进步和理论的发展使英国的工业革命成为欧洲的典范,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以及北美都涌入到工业发展的大潮中来。工业革命的发展使殖民地的重要性逐渐凸现出来:1、数量日益增多的工业制成品需要除欧洲和北美外广阔的消费市场;2、工业革命产生了剩余资本,资本在国内越积越多,利润降低,需要殖民地作为剩余资本的投资市场;3、机器生产需要大量的如黄麻、橡胶、石油、各种金属这些生产原料,而这些原料大都来自殖民地。19世纪期间开始工业化的几个欧洲国家和海外国家很快就在相互争夺市场,并在这一过程中,提高各自的关税,以抵制别国的产品。不久就有人主张,每个工业化国家都应该当拥有能够为其制造商提供“不受外国竞争影响的市场”的殖民地,整个世界进入了“自由贸易的殖民主义时代”。1870年以后,出现了营建帝国的巨大浪潮,被称为“新帝国主义”。随着在一系列帝国主义国家对殖民地的战争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在20世纪初,世界殖民地被瓜分完毕,世界殖民体系形成。

1 转引自 李霞,《从重商主义的发展分析英帝国的崛起》,《济南大学学报》,2000年第17卷第5期,66页

2 唐晋,《大国崛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第一版,150页

3 周有光,《从重商主义到工业主义》,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101页

四、结论

通过对欧洲历史连续性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欧洲的商业精神是随着古希腊开始的商业活动逐渐发展而来的，其间商业精神没落过，但是其顽强的生命力随着欧洲的商业复兴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经济制度并不是独立存在的，总是有着相应的制度、文化观念和价值体系证明其合理性，维护它的存在。同样，当一种新的经济力量开始超越旧有的经济制度时，所引发的社会变动也不仅仅是经济格局的变化，而是社会全方位的变动，其中作为维护和体现新经济制度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趋向也必然形成”。¹商业精神通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取得合法性后，在与民族国家的结合过程中理论化，引导国家行为体的政策和发展，从而影响国际格局。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商业精神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中的各个角落，处于“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仍然受到商业精神的影响。对于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的中国来说，融入国际社会已经势在必行，但是我们同西方国家之间的差异总是如影随形的阻碍中国的对外交往。如何构建中国的商业精神，如何使商业精神引导中国的在对外交往是急需在中国学者需要研究的。本文通过对西方国家发展过程中精神力量对于国家行为体的影响的研究，希望能够对于中国如何构建精神力量的研究有一定的帮助。

作者后记：

本文是我研一时期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对错与否欢迎大家批评指正。在我写作本文的过程中，强烈的感觉到中世纪的欧洲滋生着种种力量，等待爆发，而不是一般史书所描述的那种“黑暗”。希望有兴趣的同学能够共同探寻真正的中世纪。

 （上接第 38 页）

和鼓舞着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这些意识形态可以通过对历史事件的连贯的解释，以及利用可能的制度渠道，来实现对知识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俄罗斯的各种国际关系理论与概念——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建构主义和本质主义——都在学术界之外有自己的支持者，这些概念既有意识形态上的支持者，也有政治上的支持者。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得益于苏联制度的衰落；与此相似，现实主义的壮大，是由于俄罗斯整个国家出现了新的团结；建构主义者与本质主义者也必须了解如何利用现存的社会制度与资源，以便为自己寻求支持。

社会科学是对人类需要与欲望的反映，因此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意识形态基础是非常重要的。尽管从字面意义上来说，理论并不是随着政治而变化的，但当政治变化导致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呈现为一种新的形式的时候，社会科学的研究议程也相应会被修正，并且旧有的概念和理论都会让位于新的概念和理论，因为后者与新的意识形态议程更为协调。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已经越来越能更好地意识到其研究背后的意识形态假定，因此研究这些假定所发挥的不同作用也是很重要的。同样，在经验研究与政策建议的过程中，如何超越自我与他者的两分法，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问题。如果我们能够发展出一种真正的能够为全世界所理解的国际关系理论形式，那么对非美国与非西方意识形态假定的审视，将会变得与对美国 and 西方意识形态假定的审视一样重要。

（孟维瞻 译 陈安龙 校）

¹ 赵立行，《西欧文化变迁中的商业精神》，《学术研究》，2001年第10期，103页

国民意识形态与国际关系理论 ——“俄罗斯意识”的三种体现

安德烈·P·齐甘科夫、帕维尔·A·齐甘科夫*

【内容提要】本文旨在突出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以拓宽我们的国际关系理论视野。在最近的国际关系研究中，知识社会学得到了复兴，与这种传统相一致，我们需要将国际关系这门学问建立在社会的和意识形态的条件之上。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在政治、意识形态和认识论上存在偏见，一些学者已经对此进行研究。但要想对全世界的知识结构有一个更好的了解，探讨西方之外的事例也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们可以探讨一下俄罗斯国际关系的知识结构。并且我们认为，俄罗斯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体现了各种“俄罗斯意识”之间的争论的影响。从19世纪中叶开始，俄罗斯民族中就出现了三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传统，并形成了全民性的讨论。俄罗斯学者一直致力于发展国际体系、地区秩序和外交政策等方面的理论和概念。作为对这方面的关注，我们尝试论述一下，俄罗斯社会现实中的意识形态要素以及各种先于理论（pre-theoretical）的假定是如何影响俄罗斯学者对国际关系理论和概念的探索的。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 国民意识形态 俄罗斯 “俄罗斯意识” 自我和他者 知识社会学

引言

在最近的国际关系研究中，知识社会学得到了复兴，这种研究趋势使得学术界关注于这样一种事实：国际关系这门学问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基础之上的，并且国际关系学也是对意识形态与文化前提的反映。特别是，一些学者（Crawford and Jarvis, 2001; Hoffmann 1995 [1977]; Inayatullah and Blaney, 2004; Jones, 2006; Tsygankov and Tsygankov, 2007）越来越发现，国际关系学科的学术研究，常常表现为基于西方文化之上的偏见，尤其是基于美国文化之上的偏见，并且这种偏见体现在政治、意识形态和认识论方面。换句话说，意识形态，特别是国民意识形态对塑造社会科学的基础起着重要的作用。美国的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种美国自己的国民意识形态，但它却宣称自己具有普世性地位。美国的实证主义方法论致力于使知识符合于美国式的具体性的、地方性的标准，并且它还试图塑造全世界的政治。就像爱德华·卡尔（E.H. Carr）在1977年所指出的，“英语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只不过是根据其所处位置的优势来驾驭世界的最好方式”（Carr, 2001: xiii）。

如果我们想要分析知识的社会与意识形态基础，并继续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我们就需要超越那些已经探索过的美国的案例，这一点很重要。如果意识形态依然对世界上各国的知识

* 安德烈·P·齐甘科夫（Andrei P. Tsygankov），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政治科学与国际关系系教授，2000年在美国南加州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主要教授俄罗斯政治外交、比较政治、国际政治，著有《俄罗斯外交政策：国家认同的变化与延续》、《谁的世界秩序：冷战后俄罗斯对美国意识的感知》，主编《俄罗斯国际关系研究的新转向》；帕维尔·A·齐甘科夫（Pavel A. Tsygankov），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

具有强大作用，学者们应该去重点研究意识形态与非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关系。与上面引用的话意思相一致，卡尔还指出，“非洲和亚洲大学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如果还想继续的话，就将继续对强者剥削弱者这一现象进行研究”（Barkawi and Laffey, 2006: 349）。最近，全世界的学者已经开始尝试从各种外围国家的视角来理解国际关系，这意味着一种新兴的学科分支——比较国际关系理论——的出现（Callahan, 2004a）。这些学者分别从亚洲（Acharya and Buzan, 2007; Callahan, 2004b, 2008; Shani, 2008）、东欧（Guzzini, 2007）、拉丁美洲（Tickner, 2003, 2008）和俄罗斯（Tsygankov, 2008; Tsygankov and Tsygankov, 2007）的视角对国际关系进行了理解。

为了进一步拓宽我们的国际关系理论的视野，并且突出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本文将以俄罗斯为案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将意识形态定义为这样一个系统表述：自我（Self）、他者（Other），及这二者的关系。以此为依据，我们可以认为，俄罗斯的国际关系理论，是以三个主要的意识形态传统为基础的。我们可以将这三个传统称为：西方主义（Westernism）、强国主义（Statism）和文明主义（Civilizationism）。¹这三个传统分别强调一种范畴：1. 西方；2. 独立的国家；3. 俄罗斯自我渴望获得的身份，即独特的文明。尽管在苏联解体后，这些意识形态已经恢复了各自的传播，但它们更主要地还是根植于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史，以及19世纪关于“俄罗斯意识”的争论。有些学者相信研究本土知识的重要性，以避免知识霸权和种族中心主义，他们将从对这些现象潜在的“非西方”根源的分析中有所收获。为了更好地研究案例，我们首先假定国民意识形态与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关系。然后我们向读者介绍一下俄罗斯国民的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分歧，并讨论一下关于“俄罗斯意识”的争论。在文章后半部分，我们将会把西方主义、强国主义和文明主义这三种意识形态分别匹配到新的俄罗斯国际关系理论中，以便于我们能够关注那些与国际体系、地区秩序以及外交政策有关的更好的理论与概念，并且能够给以论证。作为对海沃德·阿尔克（Hayward Alker）以及其他学者的观点的继承（Alker, 1981; Alker and Biersteker, 1984; Alker et al., 1998），我们不准备在具有学术或社会特征的国际关系理论与对外交政策的讨论这二者之间做一个明确的区分。相反，我们采用了一种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广义定义，将其看作是一种关于世界的意象，而这种意象又是系统发展的，并且是基于文化的。此外，对于我们对国际关系理论所持的观点，本文的结论部分将会对其作用进行讨论。

国民意识形态与国际关系理论

冷战的结束导致了人们对新的理论的期望，即对能够解释日益明显的国家间经济与政治融合的理论的期望。全球化和民主和平论的概念做出如下预期：各国都能够重新定义它们的利益，以符合世界开放性的标准（而这种新兴的开放性又是由西方定义的）。自由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优势观念，都是基于现代化理论的主流传统，以及对西方道德与制度优越性的假设。这种观点假定了西方之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相对的同质性与一致性。它也暗示了西方之外的国家没有自己独特的社会与意识形态根基，因此它们无法对世界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在这个后历史的时代，留给非西方世界的，只不过是耐心地和被动地等待被由西方定义

¹ 冯玉军、徐向梅在翻译齐甘科夫的《当代俄罗斯国际关系学》一书时将其分别译为西方派、强国派和文明派，这三个术语在中国学术文献中有时还分别被译为：激进派/自由派、稳定派和文明派——译者注。

的全球化所同化。

很多学者都以合理的方式批评了这种极其不切实际的假定，并且他们建议应该超越目前的视野。他们反对当前的以主流西方文明的视角对国际关系所进行的理论化，特别是反对以美国的视角进行的理论化。他们指出了这种以西方为视角的理论化在经验上的缺陷，并将学术关注点转向其他领域，如新兴的地理区域化（Mansfield and Millner, 1997; Stalling, 1995）、社会与经济不平等（Murphy, 2001）、政治上的两极分化、暴力以及违法行为（Mansfield and Snyder, 2007）。同样重要的是，他们也强调以下研究的必要性：国家如何调整自身，以适应新的国际关系现实和寻求自我保护，而不是依旧依赖于以西方化为基础的同质性所带来的好处；这种调整和寻求自我保护的方式，首先体现为如下特征，各个国家以与自己的历史和本土环境相一致的方式来重新定义自己的利益（Crane, 1999; Helleiner and Pickel, 2005; Tsygankov, 2004）。此外，学者还展示了研究各国本土知识的重要性，以及这种研究对国际关系理论的作用（Callahan, 2004a, 2004b; Guzzini, 2007; Inayatulla and Blaney, 2004; Tickner, 2003; Tsygankov and Tsygankov, 2007; Waever, 1998）。

要弄清楚各国政策的不同，以及长久以来各国知识类型的不同，我们必须探索“国家”和“国家利益”的各种不同的含义，并对其进行不同方式的解释，而不是认为其仅仅取决于国际体系的结构。一些有影响力的思想学派认为自己已经构建了理论框架，以便于从不同的角度解释“国家”和“国家利益”。知识社会学（尤其可以参见 Berger and Luckmann, 1966; Harding, 1998; Mannheim 1968 [1936]）审视了导致民族意识兴起、发展和消退的社会条件，它认为民族意识只有在处于特定的社会条件之中，或者在作为特定社会条件的反应时，才会具有充分意义上的功能。亚里斯多德学派的“实践理性”（Alker, 1997; Haan et al., 1983）认为，就社会发展这个概念来说，理论家或知识的生产者都要从伦理上与社会发展相联系，而不可能是中立的。法兰克福学派（Habermas, 1973）则更加强调理论在社会和政治转型过程中的中心作用。后殖民理论（Said, 1993; Chakrabarty, 2000）认为，各种学术研究都反映了在文化上统治他者的欲望，并且后殖民理论将学术看作是各种已出现知识的并不独立的主体和消费者。一些国际关系学者（Barkawi and Laffey, 2006; Inayatulla and Blaney, 2004; Jones, 2006; Shani, 2008）借鉴了上面这些理论。最近他们还强调西方知识的霸权，指出西方知识在解决一些问题上常常无能为力，如各种与差异有关的问题以及对他人承认的问题。

为了更好地了解上述关于各国政策和知识模式的多样性，我们可以以如下方式研究社会科学，即将社会科学看作是一种社会行为，而这种社会行为又是由一个地区的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的争论所塑造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关于自我与他者之间关系的表述，可以以有意识或“无意识”（Weber, 2005: 5）的方式表现出来。有些意识形态不能体现出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互惠性的交往，只能体现出自我的主导性；而有些意识形态则体现了对待他者的认真与严肃态度，并且体现了双方以对话方式进行接触的重要性（Inayatulla and Blaney, 2004; Tsygankov, 2004）。意识形态是对各种历史发展的回应，无论是在时间维度还是空间维度，它都有一种内在的影响国民凝聚力的能力。从时间维度上说，意识形态可以把一个民族积聚了几代的记忆唤醒，使得已有的心灵层面上的传承得以重现。从空间维度上说，意识形态可以超越由社会性所界定的空间，使价值观得以成功地、充分地传播。意识形态可以借助于制度安排、重复性的历史实践以及各种知识分子的组织，使得一个散漫的地区变得统一起来，因此可以使

得居于不同地位的人忠实于一种排他性的价值。就像其他的文化存在一样，意识形态本身也是不稳定的。那些较为稳定的文化共同体，都体现了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特点，但没有一种意识形态是同质的或是完全居于霸权地位的，相反，意识形态常常是由霸权趋势与隐性趋势共同构成的（Alker et al., 1989; Wight, 1992）。例如，一些社会力量倾向于激进的文化变革，并且喜欢学习其他社会的文化；而另一些社会力量则提倡渐进的变化，更依赖于他们自己的社会经验。因此，精英的决策、政策制定者，以及知识分子对国民认同的塑造，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意识形态完整而连贯地展示了自我是如何与环境相适应的，并且形成了一系列清晰连贯而又隐晦的假定，并能够影响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一般来讲，抽象意义上的社会存在的性质，是由一些概念而非一些完善的理论或命题定义的，之后这种定义才会被学术研究所接受。这些概念的例子充斥于诸如“民主”和“市场经济”之类的西方学术之中，并以西方学术为背景。为了更好地阐释深藏于国际关系理论之中的意识形态偏见，我们可以简要讨论一下国际关系学科中关于“民主和平”的争论（当然，也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之外的类似例子）。民主和平的支持者认为，他们的观点就像是国际关系中的“定律”一样（Levy, 1994: 452），然而他们却对导致民主与和平的观念所产生的社会条件避而不谈。批评者认为，民主和平论是非历史的，而且反映的只是美国的“民主”价值，而且美国的“民主”价值其实是由美国对外部威胁的感知所塑造的（Oren, 1995, 2002）。批评者还认为，民族秩序所依赖的社会结构，在各国都是不同的。一些国家的社会结构还远远不能促进民主与稳定。例如，在后共产主义的条件下，民主化常常伴随着政权的软弱无力，因此会导致一度偃旗息鼓的种族民族主义再次变得严重起来。结果，不仅新建立的各个民主国家最后彼此会走向战争，而且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威权主义的被推翻所引起的（Mansfield and Snyder, 2007）。因此，那些关于社会存在可以直接导致民主和平的重要假定，都并未得到认真的检验。民主和平论强调自己的普世适用性，但根据一般经验来讲，它过多地带有西方文化的烙印。

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尝试理解国民意识形态因素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作用。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 1995 [1977]）认为，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些概念，如普世性的观念、权力和制度等，使得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具有霸权性质。其他一些学者也认为，国际关系这个学科中存在种族主义，以及美国式或西方式的意识与政治偏见。（Alker and Biersteker, 1984; Crawford and Jarvis, 2001; Holsti, 1985; Inayatullah and Blaney, 1996; Jones, 2006）。奥利·维夫（Ole Wæver, 1998）在对美国、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国际关系的社会学考察中，重点关注了其中的“意识形态”或政治思想传统的因素。

威廉·卡拉汉（William Callahan, 2004a, 2004b）讨论了国家对历史的感知以及对世界的意识形态规划是如何反映在一些重要观念之中的，这些观念有国际社会、民主和平，以及英国、美国和中国国际关系中的和谐思想。Tsygankov 和 Tsygankov（2004, 2006）以俄罗斯为案例进行讨论，他们认为，后苏维埃时期的俄罗斯国际关系中的多元性，是由这个国家在意识形态转型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导致的，而后者又是由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失去主导地位所导致的。

在国家的内部，意识形态的影响作用也是不同的，但又是可以观察到的。尽管一个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是激烈竞争导致的产物，但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争论又往往是由于不同的意识

形态假定所导致的，并且理论的争论又常常受制于意识形态上的争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些著名的分类方法，依然被广泛地应用，如现实主义、自由主义、批判理论或建构主义等，这种分类的依据是各个理论家的意识形态偏向(Nau, 2006; Viotti and Kauppi, 1998; Weber, 2005)。尽管上述几种理论分别强调权力制衡、国际制度、人的剥削与解放，但这些理论都反映了与“自我—他者”关系相关的更为广泛的意识形态关切。例如，现实主义倾向于将对手或他者的崛起看作是威胁，并且建议，自我应该为保障自己的安全而做准备。另一方面，很多西方的自由主义学者，在承认世界政治全球化不断加深的同时，强调自我所拥有的价值的进步性，但又常常忽视认同的力量，对自我与他者间交往方式的多样性视而不见。而一些批判理论学者对“自我—他者”关系的认识也过于简单(Shani, 2008)。

以霍夫曼(Hoffmann 1995 [1977])及其他学者的研究为基础，意识形态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方式，可以概括如下：意识形态是一种与国家相关的惯例，它对知识结构的影响，主要是通过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制度安排以及经济资金支持；每一种意识形态都是对“自我—他者”关系的系统呈现，每一种意识形态都有可能因各国自己的条件或外部世界的变化而导致强化或弱化。就社会假定或前历史假定的层面来讲，一种意识形态会影响国际关系理论家的观点，尤其是他们对国际规范及其影响的想法。例如，现实主义者提倡自主性与力量，而自由主义者提倡合作与民主。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将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作为政策制定(或国家利益)的指导，那么这个国家会进一步通过提倡或资助类似的学术研究，以强化带有这种意识形态烙印的国际关系知识结构。

“俄罗斯意识”：思考自我和他者的三个流派

尽管各种各样的国际环境影响了俄罗斯的思想与政策，但俄罗斯的思想与政策还是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历史连贯性。尽管俄罗斯跨越了君主时代、共产主义时代和自由主义时代，但俄罗斯与世界的交往方式始终具有一定的连贯性。作为一个处于边缘位置的国家，而且常常处于不确定的、不稳定的外部环境中，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常常面临相似的挑战。历史上，俄罗斯形成了三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或流派，即西方主义、强国主义和文明主义，三者对自我、他者有着不同的认识。这种分类，某种程度上与马丁·怀特(Martin Wight, 1992)所界定的三个概念有相似之处，怀特界定的三个概念分别是现实主义(强调国际无政府状态和国家的控制力)、理性主义(强调世界政治中的国家间交往与文明的力量)和革命主义(强调国际体系的各种变革)。这里我所说的三种意识形态，也有各自的特点，它们都产生于俄罗斯与外部世界交往的过程，并且体现了俄罗斯精英对世界机遇与世界挑战的感知。几个世纪以来，这三大意识形态传统都形成了各自的关于自我与他者的观点，并且都以各自的世界观为基础，力图呈现俄罗斯的国际战略选择。本文在这一部分将简要阐述三大意识形态及其各自的历史根基。之后，本文的余下部分将会详细阐述三大意识形态影响俄罗斯国际关系学的具体方式。

西方主义者认为，俄罗斯意识从本质上是属于西方的，并且这部分学者强调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相似性，认为西方文明是世界上最具有活力、最进步的文明。至少从彼得大帝(1672-1725)开始，在俄罗斯形成自己的价值体系并进行国际战略选择的过程中，西方起到了尤其突出的作用。早期的西方主义者努力将俄罗斯看作是西方君主国大家庭中的忠实成

员。例如，亚历山大一世（1777-1825）始终坚定地推行正统主义政策，并与德国、奥地利一同建立“神圣同盟”以镇压欧洲大陆上的革命行为。从19世纪中叶开始，以亚历山大二世为代表的西方主义者，开始认同西方的宪政自由主义，并接受政治平等的原则。苏维埃体制内的西方主义者，也试图拉近苏联与欧洲社会民主思想间的距离。例如，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思想中最著名的一点，就是认为，苏联应该“净化”自身，脱离斯大林主义的扭曲，建立一个民主的，或“人道”的社会主义（gumannyi sotsializm）。最后，在后苏联时代，自由派的西方主义者强调俄罗斯与西方的“天然”亲密关系，强调二者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如民主、人权、自由市场经济。一些自由派的西方主义者，具有很多西方式的偏见，安德烈·科济列夫、鲍里斯·叶利钦就是典型代表，他们对“非西方的他者”深感忧虑，并且对发展与前苏联的其他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关系非常消极。西方主义者认为，只要能够建立西方式的自由制度，并且与常说的“西方文明国家”共同体之间建立联盟关系，俄罗斯就可以应对威胁，并且能够摆脱经济和政治上的落后。

强国主义者持有这样一种意识，他们将俄罗斯看作是一个强大的独立国家，强调国家的统治能力以及维持社会和政治秩序的能力。强国主义者对他者持一种谨慎态度，认为要想维护国家安全，俄罗斯必须有能力应对外部威胁。具有威胁性的他者，既可能来自东方，也有可能来自西方，须依具体情况而定。俄罗斯曾经被蒙古人征服长达两个世纪，因此俄罗斯人的国家安全观在心理上有很大程度的复杂性。强国主义者坚信，为了国家的独立与主权，他们愿意牺牲一切。例如，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在决定是否需要进行工业化时，约瑟夫·斯大林发表了其论断，他强调应对外部强大威胁的必要性，“由于俄罗斯的落后，这个古老的国家在历史上长期不断地遭受欺负，忍受苦难”，“与先进国家相比，我们落后了50年到100年，我们必须在十年之内赶上它们，如果不这样做，我们肯定会被碾碎”（Stalin, 1947: 357-8）。

强国主义者并不天生地反对西方，他们只是强调要通过增强经济与军事能力来获得西方的认可。君主时代的强国主义者看重的是权力结构的专制与独裁的一面，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欧洲君主国共有的特征。社会主义时期的强国主义者强调共产党对社会进行牢固控制的重要性，以维护政治秩序并防止遭受外部的“资本主义”威胁。就外交政策而言，一些强国主义者倡导适当地调节与西方的关系，另一些人则推崇制衡战略。例如，马克西姆·李维诺夫是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支持者，其目的是阻止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尼基塔·赫鲁晓夫也想打破孤立主义的禁忌，以使苏联与欧洲的关系密切起来。另一方面，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条约的行为，以及勃列日涅夫的“武力相关性”战略，都反映了苏联对来自外部世界的威胁的感知。这种战略上的双重性，在苏联之后依然延续下来。例如，普里马科夫与普京都认为，俄罗斯外交政策的目标是实现其国家的强大，但前者想重建苏联式的联盟关系，并且希望与中国、印度建立战略联盟来抗衡美国，而后者强调俄罗斯与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希望与美国发展伙伴关系以打击恐怖主义。

最后要说的是文明主义者，他们以文化的差异和对立来定义“自我—他者”的关系。这种意识形态传统认为，俄罗斯及其价值与西方在根本上是不同的。许多文明主义者将俄罗斯文明看作是一种有着自己权利的文明，强调俄罗斯文明在世界上的使命，强调对外传播俄罗斯价值的重要性（Duncan, 2000）。作为一种政策哲学，文明主义可以追溯到“恐怖的伊凡”

——伊凡雷帝——在俄罗斯摆脱蒙古束缚后的领土扩张战略，以及他所倡导的著名口号“莫斯科是第三罗马”。文明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提倡对东正教价值的忠诚，还有一部分代表人物将俄罗斯文明看作是多种宗教的结合。在 19 世纪，文明主义者强调斯拉夫国家间联合的观念，他们的泛斯拉夫意识形态影响了沙皇的一些外交决策。苏联时代的文明主义者看到了欧洲在专制与自由之间的挣扎，他们认为苏联远远要比“颓废”而“腐朽”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更为优越。早期的社会主义者中的文明主义者以直接的方式挑战西方，他们依据的是世界革命的理论。当然，也有另外一些苏维埃的思想家提倡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和平共处与有限合作。然而，还有另外一种文明主义者，即所谓的欧亚主义者（又译欧亚派），他们将俄罗斯看作是一个有机联合体，既不同于欧洲文化，也不同于亚洲文化。欧亚主义者认为，世界本质上是陆权主义国家与海权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并且他们倡导地缘扩张的观念。

不是所有的文明主义者都认为俄罗斯与其他文化实体本质上处于对立地位。尽管对于俄罗斯思想家来说，不把文化交流看作相互排斥是很困难的，但其中还是有一些人试图将文化实体间的交往看作是一种对话，通过这种对话，彼此对立的观点可以相互学习（Tsygankov, 2008）。例如，戈尔巴乔夫的一些支持者，被看作是跨文化对话的支持者。他们以社会主义价值的联合体来定义俄罗斯的文明特性，认为在跨文化对话中，俄罗斯的文明特性可以得以保存和尊重，而不是被毁灭或压制。

表一1 概括了俄罗斯三大意识形态的内容

表 1 俄罗斯的三大意识形态

	西方主义	强国主义	文明主义
自我	作为西方的一部分	独立的主权国家	独立的文明
他者	非西方世界	威胁俄罗斯独立的国家	西方与非西方的文明
行为	与西方的融合	成为正常的大国	抵制来自西方的压力，或倡导文明间的对话

西方主义与俄罗斯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俄罗斯的国际关系理论，很大程度上与长时间以来这个国家的广阔的意识形态视野的发展相一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理论出现了多元化发展的趋势（Lebedeva, 2004a; Tsygankov and Tsygankov, 2004），或许这可以看作是对这个国家的几个世纪以来的深层次的意识形态差异的反映，并且这种多元化在苏联解体后获得了新的意义。

当前的国际关系理论三大流派，都对世界做出了各自的基本假设，也对国家应采取的外交政策有各自的基本假设，并且三大流派也都与现存的各种意识形态视野有某种联系。我们之所以将俄罗斯的理论流派区分为自由主义、现实主义、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们与西方理论的概念及论点之间存在联系。这种联系可以从俄罗斯的理论家偶尔引用过的西方国际关系思想这一点看出来，例如他们引用过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以及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的思想。为了阐述俄罗斯新兴的国际关系理论与现存的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的一致性关系，我们先要探讨国际体系、地区秩序以及外交政策等概念。这三个概念依然是俄罗斯国际关系学

科中最为完备的概念，并且代表了俄罗斯国际关系理论的整体情况。

俄罗斯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受到了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研究方法的影响，但它又是对西方意识形态偏好的背叛。俄罗斯的自由主义学派所定义的国际体系、地区秩序的概念，将自我等同于西方，体现了一种宗教信仰，认为自我终将获得胜利，还体现了对他者的恐惧，即对非西方的恐惧，并倾向于以霸权的方式来应对值得怀疑的他者。因此，很多俄罗斯学者将世界制度的发展看作是由西方主导的、以西方为中心的现象。例如，有人以“民主单极体系”的概念来描述即将到来的新的世界（Kulagin, 2002, 2008）。这个概念从本源上来讲是西方的，因为民主是一个以西方为中心的普世性现象，民主的发展并非是以俄罗斯自己的文化、历史和政治条件为基础的。“民主单极体系”的支持者们强调，“福山和罗伯特·海尔布龙纳（Robert Heilbroner）关于‘历史的终结’的论述基本上是正确的，他们找到了西方自由主义的替代性理论（Shevtsova, 2001）”。这种观点认为，俄罗斯必须接受西方式的多元民主的标准，唯有如此，它才能成为一个和平的、“文明的”国家，即使这意味着赋予俄罗斯对世界上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使用武力的权利。（Kremenyuk, 2004, 2006）。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世界中的非国家行为体、各种民间运动以及网络都可以塑造当代的世界秩序，至少发挥着与国家一样强的作用（Barabanov, 2002, 45-6, 49-50, 2008; Lebedeva, 2008）。他们认为，这些新兴的力量都改变着以大国为基础的国际体系的性质。在2004年到2005年期间，俄罗斯的领军国际关系杂志——《国际趋势》（Mezhdunarodnyye protsessy）——组织了一次讨论，其主题是澄清国际关系与世界政治这两个概念。一些与会者对世界政治这个概念持保留观点，他们意识到了各种非国家行为体的多样性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与一些西方中心论的世界观相一致，俄罗斯的自由主义者认为，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联系与互动，主要体现在西方的发达国家和民主国家范围之内，而在西方民主国家之外则并不明显。因此，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依然是全球公民社会的中心”（Baluyev, 2007）。

卡内基莫斯科中心的副主任迪米特里·特列宁（Dmitri Trenin）在其著作中，曾提出过欧亚主义已经终结的观点，这是俄罗斯的自由主义者所界定的关于地区秩序的概念中的一种。这一概念是俄罗斯自由主义者对保守的地缘观念的回应，后者一直倡导以莫斯科的视角来整合欧亚大陆。自由主义者的地区秩序概念，反映了“没有西方就没有安全”的观点，他们的代表人物，如叶戈尔·盖达尔（Yegor Gaidar）、安德烈·科济列夫，曾在苏联解体后的转型时期的初始阶段在政府中担任要职。他们认为，不应再将俄罗斯看作是前苏联范围内的中心国家，也不应再以沙皇时期和苏联时期的历史视角来看待当今的俄罗斯。特列宁还强调，由于广泛的外来影响，特别是来自西方世界的影响，以及受到源于西方的全球化的影响，以俄罗斯为中心的欧亚帝国已经不复存在。因此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说，俄罗斯必须将其势力从它以前的欧亚属地中缓慢撤出来。

自由主义的外交政策概念同样明显地反映了西方主义的意识形态。为论证这一观念，我们首先讨论一下如下两种外交政策概念：大西洋主义和自由帝国观念。安德烈·科济列夫和阿纳托利·丘拜斯（Anatoli Chubais）都是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二者分别在俄罗斯的衰落与复苏时期为我们介绍和阐释了自由主义的概念。科济列夫（Kozyrev, 1992, 1995）的大西洋主义以激进的方式重新定义了俄罗斯对欧美的外交政策，同时也包括推行激进的经济改革，即所谓的“休克疗法”，并与那些跨大西洋的经济与安全机构建立了全面关系，如欧

盟、北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七国集团等。因此新的俄罗斯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与前苏联的其他加盟共和国都脱离了关系。大西洋主义塑造了俄罗斯新的外交政策概念，1992年这个观点被提出，1993年它成为了法律。在前总统叶利钦时代，被称作“私有化沙皇”的丘拜斯(Chubais, 2003)提出了自由帝国的概念，这种观点也主张俄罗斯与西方融合，其主要方式是建立自由贸易和企业。与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和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的全球化主张一样，丘拜斯认为，只要俄罗斯能够成功实现全面的市场经济改革，俄罗斯在前苏联范围内的经济扩张就必定能够取得成功。

除了历史影响，一些制度性因素也帮助西方主义意识形态塑造了俄罗斯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学派。苏联刚刚解体之后，一些西方主义者获得了国家权力，他们向刚形成不久的国际关系共同体强调，应该多研究世界是如何被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所影响的。如同美国的一些杰出政治家(Bush, 2002; Clinton, 1994)一样，俄罗斯的领导人也在倡导相互依赖、民主和平等理论。他们对自己国家的经验感到失望，于是就渴望能够从经济、政治发达的国家那里借用上述知识。掌握权力的西方主义者希望通过实行激进的经济改革和亲西方的外交政策，使俄罗斯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融合在一起，同时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白宫的顾问们也建议当权者这样做。在前苏联时代，高度政治化的环境使国内的知识资本与政权联合起来，导致了知识资本的名声败坏，因此苏联解体后，美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开始填补这一时期的知识真空。很多俄罗斯的国际关系概念，如大西洋主义、相互依赖等，都是首先由政治家介绍到学界的。此外，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代，很多人从学术界走向了政界，因此这些较有影响力的政府人员依然保持着与“象牙塔”的关系。弗拉基米尔·鲁金(Vladimir Lukin)、谢尔盖·卡拉加诺夫(Sergei Karaganov)等著名的外交政策顾问，以前都曾与苏联科学院的各个专门机构有密切联系，如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欧洲研究所以及历史研究所。最后要说的是，如果我们不讨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所面临的财政状况，就很难了解西方主义意识形态对俄罗斯国际关系学界的影响。在那个极其痛苦的经济改革时代，后苏联时代的社会科学家们的家里的基本生活资源都是匮乏的，以前他们可以获得国家的支持，而现在必须要自己争取资金，当时很少有私人的基金会。因此很多人只好不再从事学术研究，还有一些学者必须同时兼任几份工作才能养家糊口。在这种条件下，美国的自由主义机构开始资助俄罗斯的社会科学研究，像福特、麦克阿瑟、索罗斯基金会这样的机构，在塑造俄罗斯新兴的国际关系学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符合美国人的期望，俄罗斯学界的活动反映的是美国式的而非俄罗斯式的理论研究议程(Tsygankov and Tsygankov, 2007)。

强国主义、国家主义(Derzhava)和俄罗斯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俄罗斯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由西方主义塑造的，与此对应，俄罗斯的现实主义理论与强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观点相一致。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一直关注来自于西方的威胁，特别是认为西方是潜在的霸权中心，这种观念始终在塑造俄罗斯的国家思想，也体现在俄罗斯国际关系的学术理论与概念中。与强国主义的意识形态相一致，现实主义的理论和概念主要是源于俄罗斯对外部威胁的认知，以及对保持国内稳定的必要性的感知。尽管俄罗斯的现实主义者也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国际关系学那里借用了许多概念工具(Konyshev, 2004, 2005)，但他们主要关注的是俄罗斯自己的问题，并且他们还创造性地使用了这些概念

工具。

俄罗斯的现实主义者在研究国际体系的结构和极的稳定性的问题时发现,单极、两极和多极体系等概念各自的内部,依然存在各种不同的类型(Shakleyina, 2003)。例如,阿列克谢·博加托夫(Aleksei Bogaturov, 1996, 1998, 2003)建议应该将冷战后的国际体系看作是“多元化的单极体系”,因为冷战后的单极中心是由一系列负责任的国家组成的,并非只由一个国家(美国)组成。博加托夫认为,俄罗斯是这个单极中心中的一员,强调位于全球中心的这些国家之间的团结,认为单极世界并不等于说只有一个国家位于中心。他对世界的研究内容,包括了规范和规则等内容,但又与英国学派的研究传统不同(Bogaturov, 2001)。他的研究,使得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意识形态对立的情形显得更为复杂,因为作为自我的俄罗斯,不但希望与作为他者的西方之间发展更为密切的关系,而且还反对西方国家中的美国单独主导国际体系。现实主义者对以普世民主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想持批判态度,他们认为,国家的内部特征与国家追求国际上的权力与安全并无太多联系。很多现实主义者认为,西方国家在全球扩展西方式的民主,实际上就是在谋求对世界的主导权(Gadziyev, 2008; Karaganov, 2008; Volodin, 2006)。现实主义建议,俄罗斯应加强区域国家之间的联系,并应平等地对待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只有这样才能提升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而不应通过仅仅发展民主来提升国际地位。

现实主义者在研究地区秩序时,也尝试为俄罗斯的独立与权力辩护。例如,他们把前苏联的范围看作是俄罗斯的后帝国空间(post-imperial space)。后帝国空间这个概念首先是在外交和防务政策委员会(1992, 1993, 1996)的一系列报告中出现的,外交和防务政策委员会是一个由谢尔盖·卡拉加诺夫在1990年代发起和领导的具有影响力的非政府组织。后帝国空间这个概念服务于一些社会组织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目标,如工厂、企业家、知识分子、舆论领袖,等等,他们都认为俄罗斯应该在保持自己影响力的基础上建立地区秩序和实现稳定。与“多元化的单极体系”的观念相似,后帝国空间这个概念既具有温和的影响,也带有激进的色彩,因为它主张在不复辟苏联帝国的前提下,恢复前苏联地区的各个国家间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凝聚力。与科济列夫的孤立主义不同,后帝国空间这个概念的倡导者不主张恢复苏联帝国,也不主张恢复侵略性的帝国民族主义。例如,外交和防务政策委员会1996年的报告就认为,那些试图恢复苏联的人,所持的都是“反动的乌托邦思想”。同时,该报告还认为,在苏联解体后,现在还很难找到一个能够代替一体化的合理方案,而且俄罗斯应该在一体化过程中担任领导作用。

现实主义者推崇全方位外交的理念,他们将俄罗斯看作一个相对独立的权力中心。俄罗斯第二任外交部长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Yevgeni Primakov, 1996, 1998)曾经是一位高级学者。他认为,如果俄罗斯想保持主权国家地位,以组织和保卫其在后苏联时代的地区空间,并能够抵御来自世界任何国家的霸权野心,俄罗斯就必须朝着各个地缘政治方向发挥作用。普里马科夫及其思想的支持者警告,俄罗斯不应一边倒地发展与欧美国家的关系,不应不顾与其他重要的国际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如中国、印度和伊斯兰国家。现实主义者强调,俄罗斯应该朝着各个地缘政治方向灵活地发展同盟关系(Gadziyev 2007),这种观点也得到了官方的响应。1997年的《国家安全构想》将俄罗斯定位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欧洲和亚洲力量”,并且建议俄罗斯保持与“欧亚经济政治行为体”的对等关系,并且提出了一个促进独联体在

安全领域实现一体化的积极方案 (Shakleyina, 2002: 51-90)。2000 年政府制定的《外交政策构想》将俄罗斯称作是“一个有责任维护全球与地区安全的强国”，并且强调，“由美国在经济和军事上所主导的单极世界”是对俄罗斯的新威胁 (Shakleyina, 2002: 110-11)。

在后苏联时代，俄罗斯的制度安排也使得强国主义意识形态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与西方主义者一样，许多著名的强国主义的政策制定者也与学界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都成为了有学者特点的政策制定者，如担任过总统顾问的谢尔盖·斯坦科维奇 (Sergei Stankevich)，以及担任过外交部长和总理的普里马科夫。在摆脱了苏联的思想束缚的情况下，俄罗斯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获得了生命力，而现实主义者的情况与此形成对比，他们明显是从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中来为其理论寻找支持的，他们强调秩序与安全的重要性，而非自由和民主的重要性。苏联的解体与叶利钦的西化改革都导致了日渐增长的失序、腐败和贫困，这使得现实主义的理论恢复了其影响力。俄罗斯周边国家出现的新的冲突，以及西方国家的北约东扩决定，阻止了俄罗斯的发展进程，这些挑战使得俄罗斯的国际关系理论更加强调地缘政治和安全平衡。因此现实主义的话语很快充满了各种学术会议与国家媒体。例如，在 1992 年的“新世界中转型的俄罗斯”会议上，曾经是学者的总统顾问斯坦科维奇 (Stankevich, 1992) 与当时的外交部长科济列夫进行了争论。斯坦科维奇认为，俄罗斯是一个大国，而且是连通欧亚的桥梁。由于政界与学界之间良好关系，强国主义者很快找到了利用国家资源的方式，并重新为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者提供资助。很多研究机构和思想库，如国防研究所、战略研究所，都加强了有关俄罗斯国家利益和安全挑战的研究。

文明主义——在文化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之间的选择

最后要说的是俄罗斯的文化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这两种国际关系理论，它们都得到了各种文明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持。这两种理论在对本土文化进行概念界定的时候，显示了极大的不同。自信的意识、专制的欧亚主义，以及东正教帝国的观念都鼓舞了文化本质主义者。而建构主义者则强调文化的合成以及跨文明交流。对于文化本质主义来说，文化是同质的，而且更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而建构主义者所说的文化则是易于变化的，而且各文化实体之间可以出现互动。从广义上来定义，在建构主义对世界政治提出假设以及选择合适研究工具的过程中，各种传统的和批判的理论纷纷产生 (Hopf, 1998)。尽管俄罗斯的建构主义者也像西方主义者那样，认为文化是一个社会建构的现象，但前者在知识优先性和研究工具方面有自己的特点。建构主义与本质主义都坚持俄罗斯文化或文明独特性的假定，因此对研究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感兴趣。但必须强调的是，尽管二者都对文化的作用感兴趣，但在其他方面却几乎没有共同性。就像塞缪尔·亨廷顿 (Samuel Huntington, 1996) 和那些对西方持批判态度的学者 (Said, 2001) 之间的关系一样，尽管他们都强调研究文明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但二者在方法论和本体论假定方面有着根本的不同。

本质主义者将世界体系看作是不同的文化之间的不可调和的争斗，或者是文明的冲突，这与亨廷顿所描述的一样 (Samuel Huntington, 1996)。与亨廷顿相似，一些本质主义者认为世界是多极文明的争斗 (Nartov, 1999; Zyuganov, 1999, 2002)，而另一些本质主义者则认为世界本质上是由两极构成的地缘文化冲突。亚历山大·杜金 (Alexander Dugin, 2002) 关于洲际大战 (a great war of continents) 的概念，就属于后者。杜金认为，两极体系是由两大竞争对手——以陆地与基础的欧亚国家与以海洋为目标的大西洋国家——为争夺价值观与权

力而导致的。最明显地表现出欧亚主义倾向的国家，有俄罗斯、德国和伊朗，日本在某种程度上也算这类国家；而表现出大西洋主义倾向的国家，则主要是美国和英国。与此相似，最近的一项著名的研究（Proyekt Rossiya, 2008: 42-5）界定了由两种文化构成的“极”，即追求物质利益的美国，和常被看作是最后一个基督教大本营的俄罗斯。

从建构主义的视角来看，一个文化上多元的世界，并不意味着文化之间注定是要冲突的。相反，不同的文化应该努力建立一个“在差异之上的联合”（unity in diversity）的机制，使得自我与他者之间保持密切的对话与合作，它们可以通过遵守全世界都承认的规则来实现这个目标，并且各自依然能够遵守自己从内部发展出来的规则。为了保持一个文化多元的体系，新的观念有必要挑战以美国为中心的经济和政治全球化的主导地位（Alekseyeva, 2007; Batalov, 2005; Voytolovski, 2007）。一些建构主义者建议增强联合国的作用，使其成为未来世界政府的样板，他们把联合国大会比作议会，把安理会比作执行机构，把秘书长比作世界国家的总统。例如，戈尔巴乔夫的前任顾问乔治·沙赫纳扎罗夫（Georgi Shakhnazarov, 2000）认为，上述这种结构是必要的，它可以解决紧急的全球问题，如日益增长的战争威胁、世界资源的消耗、人口负担以及环境恶化，而且可以缓解各种本土文明的自私冲动。在他看来，亨廷顿提出的依照文明的代表对安理会进行重构的建议，将意味着抛弃联合国所有的积极潜能，将会导致世界政治回到孤立的时代，并使那些粗鲁的武力原则得以恢复。相反，他建议，安理会可以逐渐吸收那些对世界有无可争议的影响力的国家，如德国、日本、印度、巴西，等等，以实现联合国的逐渐发展，这样就可以保持并发展世界的中心治理结构。

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之间的区别，还体现为二者对地区秩序分析的不同。杜金等欧亚主义者将地区秩序看作是一个没有大西洋主义影响的并且以俄罗斯为中心的帝国。类似地，俄罗斯的宗教民族主义者提出了俄罗斯东正教帝国这种观念。例如，最近的一项有影响力的研究（Russkaya doktrina, 2007），描绘了一个能够抵御西方并且能够恢复俄罗斯自信的地区秩序。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者认为，如果美国能够在2010年到2015年从俄罗斯的周边地区撤出，那么俄罗斯应该同中国、印度、伊朗以及其他非西方国家建立一个“像华沙条约那样的全面而成熟的政治经济与军事联盟”（Russkaya doktrina, 2007: 297, 313）。

而更多的倾向于建构主义的理论家们则提出了这样一些概念，可以超越亲西方主义与欧亚主义的两分法。亲西方的自由主义经常认为俄罗斯应该“回归”欧洲，与这种观点不同，一些学者认为俄罗斯早就属于欧洲或西方了。根据他们对历史的叙述，俄罗斯属于西方的时间，比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一些国家都要长。因此，俄罗斯应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自己已经是欧洲的合法一员这一事实，并且认识到自己与世界的特殊联系，这对于俄罗斯来说不应是什么挑战。换句话说，俄罗斯应该从知识上吸收世界和西方，而不是被吸收。这种思想的代表人物有格列勃·帕夫洛夫斯基（Gleb Pavlovski, 2004），他提出了“欧化的东方”（Euro-East）这一概念，即将俄罗斯看作是欧洲的一部分，并且有保持自己特性的权利。“欧化的东方”这一概念也带有欧洲式的价值观，这表现在市场经济、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等方面，但它更注重经济与社会现代化，并且认为俄罗斯特别需要维护政治稳定。

文化本质主义者与建构主义者看待外交政策的基本视角也大不相同。无论是欧亚主义者，还是俄罗斯东正教的民族主义者，都强调应该尽可能采取强硬的政策，以恢复俄罗斯在欧亚中心地带的地缘政治地位（Bassin and Aksenov, 2006）。而且，采取强硬政策还可以恢复

俄罗斯的帝国满足感，而且能够为世界提供较有影响力的意识形态（Kholmogorov, 2006; Matveychev, 2007; Russkaya doktrina, 2007: 11）。各种建构主义者对外交政策的观点也是不同的。很多以社会研究为导向的学者（Tolstykh, 2003）认为，文化对话是一个关键性的人道主义原则，它可以使全世界更好地解决上述提到的各种问题，例如战争、贫穷和环境恶化。很多受到东正教价值影响的建构主义者（Panarin, 2002）倡导基于西方的理性与东方的神秘之间的跨宗教结合。他们认为，俄罗斯就是一个实现这种结合的天然地区，因此可以为世界的发展提供一种模式。

与西方主义和强国主义相似，文明主义意识形态也具有历史影响力，并且得到了不同政治与社会力量的推崇。没有这些力量的支持，上面提到的这些研究很难产生。例如，戈尔巴乔夫和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一系列国际关系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讨论，提倡跨文化对话，并且对一些重要的建构主义学者进行了资助（Gorbachev, 2003）。俄罗斯官方也赞同这种观点。例如，2008年3月，普京总统向在塞内加尔召开的伊斯兰会议组织（OIC）会议致函，他说“加强与伊斯兰世界的友好与合作关系，是俄罗斯的战略之一”，他还说“宗教和文明分界线可能会导致世界的分裂，对于这种危险我们同样予以关注”（RFE/RL, 14 March 2008）。另一方面，本质主义者发展出来的概念，也常常得到俄罗斯东正教和民族主义政治组织的支持，例如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因此，很多东正教教士，如基里尔都主教（Metropolit Kirill,）等，都对俄罗斯教义（Russkaya doktrina）表示支持。共产党的领导人根纳季·久加诺夫（Gennadi Zyuganov）也常常对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问题发表评论。杜金也是一位欧亚主义者，而且是一位多产的地缘政治学者，他创立了“国际欧亚主义运动”，这个运动体现了政治与意识形态上的目的。

表 2 概括了上面讨论到的几种概念，也概括了它们与俄罗斯国际关系理论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

表 2 俄罗斯国际关系理论与概念：几个例子

意识形态	理论	概念		
		国际体系	地区秩序	外交政策目标
西方主义	自由主义	民主国家的单极秩序 (Kulagin)	欧亚主义的终结 (Trenin)	大西洋主义及与西方的融合 (Kozyrev), 建立自由主义的帝国 (Chubais)
强国主义	现实主义	多元主义的单极秩序 (Bogaturov)	后帝国空间 (Karaganov)	多方位的发展 (Primakov)
文明主义	文化本质主义	洲际大战 (Dugin)	新欧亚主义 (Dugin), 建立东正教帝国 (Russkaya doktrina)	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 (Dugin), 建立自信 (Russkaya doktrina)
	建构主义	文明的多元主义	欧化的东方	人道主义的全球化,

		(Shakhnazarov)	(Pavlovski)	文化间的对话 (Gorbachev), 以东 正教为基础, 实现西 方理性与东方迷思的 结合 (Panarin)
--	--	----------------	-------------	--

结论

就像一些旧有的理论一样, 意识形态既不是错误的意识 (Mannheim, 1968 [1936]; Marx and Engels, 1964 [1846]), 也不是对事实的真正的科学的表达 (Lenin, 1969 [1902]), 而是一个对事实进行假定的体系。这些假定的形成, 源于一个民族的历史经历, 而且先于理论的形成, 因此这些假定又是先于理论的。国际关系理论是一种社会科学, 它只有在特定国家范围内的意识形态背景之下, 才能有意义地发挥其功能。这说明, 认真审视意识形态的假定是非常重要的。自从霍夫曼 (Hoffmann, 1995 [1977]: 213) 论述了宏大意识形态对社会科学领域的“粗鲁侵入” (the rude intrusion of grand ideology) 之后, 这种情况从未根本改变。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国际关系理论, 的确显示出了某种新意, 但这仅仅体现为它是一种新的构造事实的方式。在新的概念的背后, 如在“民主国家的单极化”秩序、全方位外交政策等概念的背后, 人们仍然可以体会到早就存在的关于俄罗斯意识的争论。早在 19 世纪中期, 西方主义者与斯拉夫主义者之间就已经有了这种争论。俄罗斯意识从未在公众的讨论中消失, 相反, 由于国际关系各个学派之间的广泛争论, 俄罗斯意识在后苏联的时代背景下获得了重生。正如我们的分析所指出的, 俄罗斯的三种与众不同的意识形态, 即西方主义、强国主义和文明主义, 都通过对各种国际关系概念 (如国际体系、地区秩序、外交政策) 的影响而获得了新的意义。无论是在美国, 还是在俄罗斯, 国民意识形态都没有因理性精神和现代性的出现而从社会科学中消失。在某些方面, 俄罗斯的理论意识形态非常接近, 俄罗斯的理论很少以其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为耻, 很多理论都明确地表现出了意识形态假定。例如, 尽管一些学者宣称自己的理论是科学的, 但这并未阻止他们公开宣示自己的意识形态信念, 即俄罗斯位于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的这一信念。这还体现在他们宣称美国是一个敌国, 以及宣称一个自信的帝国才是俄罗斯政治秩序的自然状态。这样的学者有尼古拉·纳尔托夫 (Nikolai Nartov, 1999: 305)、根纳季·久加诺夫 (Zyuganov, 1999: 2, 9-10) 等, 这些信念都是先于理论的。就一个理论发挥其作用来说, 信念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没有信念, 理论就会失去意义。

我们还认为, 一个社会在意识形态上从来不是同质的。在某一个时刻, 会有多种意识形态传统存在, 并且它们会彼此重叠, 各种意识形态都试图扩展其对国民的影响力, 并且影响

(下转第 24 页)

Demarchy: 替代选举政治的制度?

吴途勇*

刚刚在中国东北角发生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日突然死亡事件顿时触动国际社会敏感神经，联系 2011 年发生在中东北非的阿拉伯之春的革命，不禁让我们掩卷沉思。阿拉伯之春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关注，这场影响深远的运动，实质是民主化在该地区进一步深入发展，也是政治转型的表现形式。金正日的突然死亡也提醒我们注意非民主体制国家政治的发展与转型问题。因此，政治转型过程中的民主与民主化问题再一次成为政治学者思考中心，以至于有人称第四波民主化浪潮来袭。在笔者的视野中，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教授对于政治民主有独特的思考，其名著《民主四讲》对西方现代民主制度的起源、演化、兴起的条件、运作机制和取得的成效进行了分析和反思，指出民主与选举的联姻使得民主实际上成了“选主”。自由竞争性选举政治，实质上使得政治不平等，然而政治平等是民主的根本逻辑起点，现代西方的选举制度实际上是阉割了民主，违背了民主的根本要义¹。引起笔者兴趣的是，王绍光认为用“抽签”代替“选举”更能实现政治平等，反映民主的实质。理由主要有两点。首先，抽签对在选举制度下可发生的各种不公正性因素进行消除。比如抽签消除了各种可能的资源不平等。其次，抽签给了所有人平等担任公职的机会，而不论其财富多少、学历高低、相貌美丑等。更有趣的是我们发现，一位澳大利亚哲学家约翰·勃赫穆（John Burnheim）为此写过一部名叫《民主是可能的吗？选举政治的出路》（*Is Democracy Possible? The Alternative to Electoral Politics*²）的专著，他提出了一种将抽签与代议制结合起来的新民主理论，称之为 demarchy，颇有新意。

一

勃赫穆在 2006 该书第二版序言值得我们注意，他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该书的理论能够吸引那些正在历经国家转型的政治家们。他们既希望引进市场经济，又希望保有社会主义在提供公共物品上的一些优势。由于苏联早已垮台，因此他说“我仍然对中国的改革者对我的理论产生兴趣抱有希望”。

书中导言的第一句话就指出，民主从未在现实中存在过。让我们热血沸腾的“民治、民有、民享”除了曾在极小的范围中出现过之外，几乎未实践过。作者通过分析民主与国家、官僚制、代议制和市场等这些现代社会制度，步步破除我们对西方现代民主政治的迷思，构建起自己的理论模型。作者驳斥一定需要国家及中央政府的论点，指出了国家制度的危险性和试图控制国家这些危险性措施的不足及不稳定性。他认为现代国家制度十分僵化，高度的官僚化又使得我们无法对国家机构实现有效控制。他因此而提出一个共同体形式 demarchy，既可以替代国家，又能够很好的执行国家的职能。与现代国家共生的是官僚体制，官僚制依据明确规则运行，在其理性的条文和规范下大型社会活动得以展开。但同时作者批评，官僚

* 吴途勇，华东师范大学 2011 级硕士研究生。

1 王绍光，《民主四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第 47 页。

2 John Burnheim, *Is Democracy Possible? The Alternative to Electoral Politics*, Sydney: Sydney University Press, 2006.

制长期发展会导致机构僵化，体制膨胀，大量部门利益充斥其中着，各自为战，资源配置低效。

在对现代国家及官僚体制进行了分析与批判之后。他转而对现代民主政治核心机制—代议制进行分析，直抵问题本质，这也是该书最为精彩部分。代议制是通过投票机制实现的。作者对投票制度进行了批判，指出一张选票代表的东西实在十分有限，大众集会中个体投票是相当无力的，在竞选选民不能得到关于候选人的完整信息。他同时详细分析了政党政治的缺陷和做出这种改革尝试的乏力，继而发展出了替代选举政治的一种新的政治制度概念，即“demarchy”，即以抽签为特征的代议制作为一种新的代替选举政治的形式。作者认为由于市场经济制度在提供公共物品上有很大缺陷，并不能让所有的人合理有效利用资源。因此应将 demarchy 作为一种政治制度设计应用到经济中。Burnheim 设想各种各样的生产资料都由不同的信托机构（trustee）进行管理，信托管理机构相互独立，互不隶属，联系不紧密，仅有合作，也不服从与任何一个中央政府机构。信托管理机构将生产资料租借给各个公司，租金代替税收，用来支付提供公共物品的费用，因此收取的租金要能够满足提供公共物品的费用，也由此来确定租金的价格，租金的价格不能够损害其他群体的利益和需要。他认为“demarchy”能够形成一个对产品和生产资料进行合理社会控制的市场经济，也能够为所有的人提供保障。

在全书结尾，作者对提出的“demarchy”制度的各种特征和目标进行了检视，并详细阐述了蕴涵在该制度设计中的合理愿望和期待。

那么 demarchy 到底是什么，如何运作的？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

勃赫穆认为，现行的社会政治制度中，各种政府机构和办事机关履行各自职责并有一定的独立性，但是都有一个中央机构作为其最终的权威来源，归中央政府管理和控制。在 demarchy 下，有各种各样的功能性机构（functional bodies），代替现行的官僚机构。这些成员由抽签产生。Demarchy 可以有多种组织构成形式，但勃赫穆认为各机构都必须有明确的管辖范围，比如教育、公共安全、公共运输、卫生等。这些功能性机构相互分离，联系松散，不存在一个中央政府机构来为之制定战略和政策，提供权威。

为了避免选举制度的诸多弊端，成员通过抽签随机产生。参加抽签的群体是由愿意承担这项职责和从事这项工作的志愿者（volunteers）组成。功能性机构的成员应该能够代表与该机构相关的所有人的利益，机构成员的组成也需要反映出真实社会状况和人群结构。他认为需要注意出现某一群体过多的占据机构成员位置，出现比例不平衡。勃赫穆提出，随机抽取应该考虑到性别、民主、年龄等因素，进行按比例合理抽取，即“statistical representation”。比如，有 100 个男人和 50 个女人同时志愿参加某委员会机构，但是该机构只需要 10 个人，那么男性就该按照 1:20 的比例选 5 人，女性就按 1:10 的比例选 5 人，以使机构里双方有相同比例的代表。成员应该都是志愿参加的，拥有热情和知识并能很好胜任工作。机构成员都是有任期的，这样就能够使更多的人参与到机构中来。

这些功能性机构在运行中会因为力行使范围重叠、意见不一致、资源分配等还是会出现各种问题，等问题。因此勃赫穆在书中提出了名为高层实体（higher-level bodies）的机构。它的主要任务就是听取各方意见或是申诉，划定各自合法权限，帮助他们调整机构结构以适应新环境的挑战和解决资源分配等问题。但是高层实体没有权力制定政策，更不能对功能性

机构发号施令、进行支配了。Burnheim 最重视的是 higher-level bodies 成员的构成及产生方式。他认为这些人不代表任何利益和观点，他们有大量的处理社会问题的亲身实践经验和在功能性机构的工作经验，有能力且值得信任。他们是通过提名产生的，由其在功能性机构工作时的同事们提名人选。然后由抽签决定最后人选。

功能性机构是通过公开程序来做出决定的。在决定之前，共同体成员可以自由的发表意见、进行陈述。人们如果对机构决定不满意，可以采取集会、上诉、游行等方式抗议，以促进自己的意见和想法的施行。按照布莱恩·马丁（Brian Martin）理解的看法，由于没有国家，自然也没有军队和官僚机构，共同体功能性机构的决定和政策是通过相互合作的形式实现的，如果某个机构出台了一项很难被接受的政策，那么其他机构和共同体成员就会采取不合作的方式，从而使其无效。

这看起来就有点像乌托邦，根本无法实现。勃赫穆自己在导言中叶说，demarchy 有些乌托邦色彩，并不存在，也不是基于现实社会发展趋势提出来的一种制度设计。他认为只有可能让大多数人都认为它应该实现，那么“demarchy”才能被我们所尝试。“很显然，这样的机会微乎其微”。

二

公共职位由抽签分配的制度在古希腊的雅典就已经实行过。在当时的雅典除了“十将军”需要选举外，其他职位都是抽签决定的或是雅典公民轮番任职。勃赫穆理论的独特性在于，它为我们反思选举民主做出了理论贡献，提出了新的思考方向。美国学者布莱恩·马丁认为勃赫穆提出了在政治经济方面的一套新的制度和机构来替代现有的国家和官僚制度，很有价值，但是同时也认为实现 demarchy 太难了，它会受到来自当前社会政治经济精英的强烈反对。原因显而易见，因为抽签制度可以让那些缺少自信、口才不佳、魅力不足的普通人与精英们有同等的机会进入政策制定机构。¹况且，现代社会主要的政治经济力量有官僚化和集权化的趋势，demarchy 也并不能遏制和根除。

读者诸君可能对 Demarchy 这个词是如何来的就很感兴趣，可惜的是作者本人书中并未作出说明。有位学者作出了分析，在题为 Demarchy: It's not Anarchy 的论文中，尼尔斯·康纳（Nils Connor）认为“demarchy”，是 democracy（词源是 demos）和 anarchy（词源是 archos）组合而成，Burnheim 想通过 demarchy 综合 democracy 和 anarchy 的优点（Burnheim 是赞同民主的，只是厌恶选举，而且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导言中明确声称了）。但是康纳认为这种综合是失败的，人们对“democracy”的一种普遍看法是“人民统治（rule by the people）”（康纳（Connor）认为 democracy 的正确含义是“power in the people”），但是 anarchy 蕴涵着“无统治（no rule）”，因为在康纳看来“无政府主义者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就是认为，任何蕴涵有允许一些人支配另些人含义的制度都是建立在道德的流沙上的”，因此从逻辑上二者肯定是不能够成功自洽的。²

1 Brian Martin. Is Democracy possible?The Alternative to Electoral Politics by John Burnheim[J]. A review published in *Social Anarchism*, Number 15, 1990, pp. 78-81.

2 Nils Connor, *Demarchy: It's not Anarchy*. <http://www.unow.edu.au/~bmartin/pubs/92kio/93Connor.pdf>.

另外一层关于 demarchy 的担忧在于它很可能不能够让最优秀的人有为公共事业服务的机会，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都没有办法拥有最佳领导，这样效率自然就低下了。康纳认为被 demarchy 排除在外的、被多数人都认为是最佳人选的人，可以通过集会、讨论、意愿表达来达到行使权力的目的，而且很容易获得多数支持，这将会迫使功能性机构以他的意愿行事。Demarchy 却没有一个好的机制来防止其出现。

康纳更为有力的批评是针对“统计性代表 (statistical representation)”的。统计性代表在书中主要是指在进行抽签时要注意到志愿者人数的多少、结构组成、比例等问题，同时要考虑社会的实际状况和相关人群结构，要注意到在抽签时的比例平衡。康纳认为如果发生志愿者群体在结构上参加抽签比例的不平衡，为什么不能表明是志愿者们以为一些工作更重要、更需要人去做，而那些参加抽签人数较少的机构其工作已经做得够好了呢？这样的话，那么就没有必要实行 statistical representation。因此他得出结论如果 demarchy 起作用，那么 statistical representation 就没有必要，如果 statistical representation 必要，demarchy 就不起作用。

最后，demarchy 会造成新的社会不公平。这是由 higher-level bodies 和抽签制度本身造成的。我们知道 higher-level bodies 的成员是从曾经在功能性机构中任过职的人当中抽签产生，候选人需要先经过其之前同事的提名。首先同事群体是不好确定的，一个人可能在多个机构任过职，也可能在一个机构多次任职，以哪个机构或是那个任期为标准，或者都算进去？第二，试想如果一个社会的其他机构都是随机产生的，比如教育、卫生、资源管理机构等等，为何这样一个重要机构要在固定的人群中产生，而且要经过提名，这与 demarchy 的随机性要求是不符合的。最后，higher-level bodies 的机构只能够有曾经担任过公职的人员才能够担任，那么意味着那些从来没有担任过公职的人将永远丧失在 higher-level bodies 中服务的机会，这非常不公平，而且对于年轻人尤其如此，他们工作经历和社会经验少，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因此社会依然形成了两个等级——担任过 higher-level bodies 公职的人和没有担任过职位的人。而且，我们可以设想任过公职的人由于长期垄断 higher-level bodies 的控制权，可能会互相勾结，同事之间互相推举，而非推人以贤。虽然该机构虽然没有政策制定和发布命令的权力，但是从该机构职责和成员构成来看，它的影响还是很广、很大的，因此等级的区分和职位的垄断极有可能会造成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和机会不公平。higher-level bodies 本来是解决问题的本身却产生更大、更严重的问题。

由抽签制度带来的问题是 demarchy 没有处理好运气均等问题。罗尔斯《正义论》中认为，为了平等的对待所有人，需要给那些天赋较低、出身不利的人提供补偿。¹我们认为运气在在 demarchy 的共同体中也应该是一种共同资产，个人应该从他的较差运气中获得补偿，否则就不是平等的对待。demarchy 没有为那些长期抽签不中的公民提供制度性机制进行补偿。因为在按照勃赫穆的理论，demarchy 的平等要求是很严格的。由于运气成为影响人们参与政治生活的最大偶然因素，因此需要设计制度来最大限度减少它的影响，使想参与政治的人能够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给所有人机会，或者是给予他们其他补偿（对于这些运气较差者而言最大的补偿莫过于参与政治了）。

1 参见约翰·罗尔斯，《正义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姑且不论由于 demarchy 强烈的乌托邦性质，其可行性大大的值得怀疑。就算 demarchy 足够好和优越，但是人们并不真的希望过这样一种生活，对于部分人来说它并不一定比其他社会生活方式更值得过。阿吉斯 赫勒 (Agnes Helle) 认为即便 demarchy 被证明是最为理性的民主形式，人们也并不会单单基于理性的理由就选择它或是放弃其他生活形式。¹先不说人们各自拥有独特的乌托邦传统，就是人们成长的文化和历史传统也是各不相同的。他们可能更加珍视某些价值。有些人会选择过 demarchy 的社会生活，有些则认为 demarchy 不好，他们会选择另外的社会制度。勃赫穆对于当代议民主与参与民主的内在冲突以及解决之道有自己的独特视角，或许有些乌托邦色彩，有着对民主的浪漫主义玫瑰色的期待，把很多复杂的问题大大简化了，同时也就简化了民主理想与政治现实之间的巨大冲突，但他能激发我们对民主与民主的制度模式的思考，打开了另一种思考可能。今天的中国正处于转型的十字路口，积极引进国外优秀民主理论和思想十分必要。大多数人都认为在较大区域政治生活中抽签制度的不可行，但其实很少认真思考在小范围区域内抽签制度的可行性。比如我们发现村一级自治机构或是社区自治机构中实行抽签就很可能是能够实践的，并且有助于发展出新的民主模式和政治文化传统，这样的话，在中国展开的政治生活很可能是另一种局面。中国学界长期为中国实现什么样的民主制度而争论和困扰，却对诸如勃赫穆等这样的思想家视而不见，殊为可悲。我们为何不跳出西方学界设定的既有思想资源圈子，寻找一些新的有益思想资源。

(责任编辑：孙超)

1 Heller.Reviews: John Burheim, *Is Democracy Possible?* (Cambridge: Polity Press,1985)[J]. Thesis Eleven,Jan 1986 ;14:129-132.

文苑拾菁

“读书好，好读书，读好书”，这是世纪老人冰心激励我们读书的良言。华东师范大学国关院的资料室恰恰是这样一个收藏天下好书，并向国关院师生推荐借阅好书的福地。她是我们的精神家园和学术宝库。她将以知识海洋般的胸怀陪伴守望着我们的精神成长。她也应该成为未来几年我们进行学术研究最好的良师益友。所以在这期的《闻道》杂志中，我们专门撰文介绍我们国关院的资料室，希望大家不要冷落这座思想宝库。

国关院图书资料室，位于理科大楼 A 座 410，是专门为国关院师生提供学习和研究之用的专业研究型图书资料室。她收藏了包含哲学类、经济类、历史类、文学类、法律类、政治类、外交与国际关系类等 3 万余册图书。整个资料室包含 7 列大书架，同时这 7 列大书架又是由 179 个藏书的小书阁组成。为了便于广大师生快捷搜索想要借阅的图书，我们对整个资料室的图书布局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分类和介绍。

我们把资料室的 7 列大书架由东向西分别命名为 A、B、C、D、E、F，每一列书架又分为几列纵向的书阁，每列纵向书阁又从上到下包含几个小书阁，如下图所示，以 A 列书架为例。

A8-1	A7-1	A6-1	A5-1	A4-1	A3-1	A2-1	A1-1
A8-2	A7-2	A6-2	A5-2	A4-2	A3-2	A2-2	A1-2
A8-3	A7-3	A6-3	A5-3	A4-3	A3-3	A2-3	A1-3
A8-4	A7-4	A6-4	A5-4	A4-4	A3-4	A2-4	A1-4
A8-5	A7-5	A6-5					A1-5
A8-6							

(空白的阁子是指没有书的小书阁)

具体的各类图书的分布如下：

A 架：

A1: 1、2、3、4、5: 马列思想，毛泽东思想，斯大林研究

A2: 1、2、3、4: 马列思想，毛邓思想、后现代研究，中国哲学

A3: 1、2、3、4: 国学

A4: 1、2、3、4: 西方哲学

A5: 1、2、3、4: 西方哲学

A6: 1、2、3、4: 中西方哲学

A7: 1、2、3、4: 中西方哲学

A8: 1、2、3、4、5: 宗教及伦理

B 架：

B1: 1、2、3、4: 基督教文化，中国文学

B2: 1、2、3、4: 社会学

B3: 1、2、3、4、5: 社会学，政治科学

B4: 1、2、3、4: 政治学理论

B5: 1、2、3: 政治学理论

B6: 1、2、3、4: 中西方政治哲学

C架:

- C1: 1、2、3、4: 国际政治概况
C2: 1、2、3、4: 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理论
C3: 1、2、3、4: 中国政治制度
C4: 1、2、3: 外国政治制度
C5: 1、2、3: 美苏欧近现代政治历史
C6: 1、2、3: 欧美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
C7: 1、2、3、4、5、6: 国际关系与全球化

D架:

- D1: 1、2、3、4、5、6 : 外交与国际关系
D2: 1、2 : 外交与国际关系 D2: 3、4 : 法律
D3: 1、2、3 : 法律 D3: 4 战争、军事、军备
D4: 1 战争、军事、军备 D4: 2、3、4、5 经济学
D5: 1、2、3、4、5 经济学
D6: 1、2、3、4、5 经济学 D6: 6 能源
D7: 1 国际市场与对外贸易 D7: 2 货币与金融 D7: 3、4 文化研究

E架:

- E1: 1、2、3、4 文明史、世界通史、帝国史
E2: 1、2、3、4、5、6 中国史
E3: 1、2、3、4、5 中国史
E4: 1 印度、阿拉伯、犹太史 E4: 2 欧洲文明史 E4: 3 苏联史 E4: 4、5 欧洲国别史
E5: 1 艺术 E5: 2 法国文明与历史 E5: 3 名人传 E5: 4 美国通史 E5: 5 拉美史
E6: 1、2、3、4、5 文学
E7: 1、2 文化研究 E7: 3 传媒、文化传播 E7: 4 教育、科技、管理 E7: 5 语言与文字

F架:

- F1: 1、2、3、4 名人传、名人评价与介绍、回忆录
F2: 1、2、3、4 名人传、名人评价与介绍、回忆录
F3: 1 民俗学 F3: 2、3 列国志
F4: 1、2、3 科学文明史 F4: 4 国学、中国东盟年鉴

(在我们院的资料室还有一个新书书架,学院每年会不定期购入新书,一般会在新书架上放置一段时间,方便大家借阅。)

资料室是为我国关院的教学科研提供支持的信息服务中心,它不仅拥有丰富多样的图书资源、安静优雅的环境,更有高晓川老师、吴途勇同学热情周到、耐心细致、具有专业精神的借阅服务。同时在此也感谢高老师和途勇为国关院师生所做的工作。最后希望每一个人在今后几年的研究生生活中充分地利用图书馆资源和服务,助益学业、完善自我。

为了激发大家对于资料室的热情与兴趣,我们在接下来的几期杂志中会搞一个为小书架命名的活动,希望国关院的师生都能参与进来。活动的具体内容就是欢迎有兴趣的同学走进资料室,在资料室中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书架并将其命名,同时从这个书架中推荐三本好书

给大家。这一期先由我们编辑部学术板块的几个人来做，算是抛砖引玉。

D1-2 书架命名为：折冲樽俎 陈安龙推荐：

《顾维钧回忆录》

这本回忆录是顾老在 1960 年应母校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之请，历时 17 年，完成了英文稿 11000 页的口述回忆，后中译本在中国出版，共十三册。他的这部回忆录是巨变频仍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历史特别是国际关系领域许多重大情节的权威记录，内容十分细致。认真读读这套书，对于我们真实而全面地了解那个时代，避免片面和偏狭的历史观点，会有很大的帮助。

A3 书架命名为：信而好古 周生升推荐：钱穆著：《论语新解》、《孔子传》

《论语》作为体现孔子思想的最重要文献，值得每个中国人细细品味。子曰：“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的《论语新解》，可谓此箴言的重现。如其书序所云：“本书取名新解，非谓能自创新义，掩盖前儒。实亦备采众说，折衷求是，而特以时代之语言观念加以申述而已。”同时，配合先生所著《孔子传》一并阅读，通过对孔子本人的了解能够更深层次地进入到《论语》的奥妙中去。

D4: 5 书架命名为：守一阁 吴途勇推荐：

《集体行动的逻辑》

《集体行动的逻辑》是曼瑟尔·奥尔森的代表作之一，另外一本是《国家兴衰探源》。诺斯认为公共选择理论起源于本书、布坎南与塔洛克的《同意的计算》、安东尼·唐斯《民主的经济理论》这三部公共选择文献的经典著作。该书 1993 年获得美国管理学会颁发的“最持久贡献著作奖”，1995 年获得美国政治学会颁发的“里昂·爱泼斯坦奖”。

《制度与行为经济学》

《制度与行为经济学》是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终身教授阿兰·斯密德（Allan A.Schmid）博士的最新力作。作者以非凡的勇气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众多观点提出了质疑，扩大了人们对现实经济运行的认识的视野，向读者展示了新颖的观点。

亲爱的学友们，资料室的丰富资源欢迎你们来查阅，来翻阅。这里的文献资料也需要大家发现、获益。这里的书架很多还没有名字，欢迎大家给每个书架找一个合适的主人吧！我们会每期登出来各位的书籍推荐信息，求得互动。

书架号：

命名人_____ 书架命名：

推荐书籍：

推荐理由：

（责任编辑：吴途勇）

开篇的话

李荟

亲爱的老师和同学们，当你们拿到这一期的《闻道》杂志时，我们的版块已悄然发生了改变。为配合《闻道》杂志改为院刊，也为更好地突出“百花齐放”版块“贴近同学生活、展示学子风采”的特点，从本期开始，我们将对“百花齐放”版块进行改版，并增设“社会透视”和“微视点”两个子版块。“社会透视”版块每期关注一个社会热点问题，向院内外老师同学征集评论文章，展现当代学子观察问题的敏锐视角和对社会勇于担当的热忱；“微视点”版块主要为近期各种媒体和学术讲座等的精彩评论和亮点语句汇总，为老师和同学观察和理解新闻事件提供参考。

“百花齐放”版块经过编辑们近一年的努力，已经成为《闻道》杂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刊登在杂志上的十余篇文章和摄影作品记录了国关院研究生一年来的学习生活，这其中的点点滴滴至今仍然是包括文章作者在内的全体同学共同的美好回忆。在《闻道》杂志改刊的形势下，我们既要保持“百花齐放”的特色，也要积极适应新的变化，在稿件来源、体裁和形式上进行整合与创新。这次改版，就是我们进行整合与创新的一次尝试，目的是使“百花齐放”更好地成为老师和同学记录生活、碰撞思想的平台。

“百花齐放”版块真诚地希望院内外老师、同学积极向两个新版块踊跃投稿，对当下热点评说是非，对各类言论品头论足。同时，我们也欢迎其他体裁、内容的文章在这片“花丛”中绽放。当然，改版之初的“百花齐放”一定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甚至缺陷。作为编辑，我们期待老师同学积极提出宝贵意见。我们深知，您的每一条建议甚至批评都将是我们的不竭动力。

让我们国关学子共同努力，关心支持“百花齐放”的成长，使它能够真正做到“百花齐放”，成为《闻道》的一颗耀眼的明星！

◆ 社会透视

本期透视热点：“小悦悦”事件

【小编有话】

这是一个或许早被谈烂的热门话题。因为连百度百科中，都已经出现了一个词条——“小悦悦”。事实上，已经没有人需要再去询问谁是小悦悦？因为 18 个路人早已将我们引入到最险峻的时刻——道德的、社会的、时代的，还有灵魂的。无论承认与否，我们都已经一同被推向了审判台。

是的，“大家”都在为此“言说”。18 个路人的沉默，给了众生再一次喧哗的机会。在这个语速永远比思维快的年代，善与恶都不过是一阵烟，来去匆匆。而在这个早已不那么纯粹的象牙塔内，我们是应该为这个社会增加更多的噪音，还是坚守理念而保持肃静沉默不语？是需要继续苦练内功，还是应当贸然发声？既然有那么多无用的真理与废话，我们是否有必要再画蛇添足多此一举？

然而，我们是应该做些什么。因为我们自以为还是在期许正义，哪怕是一种高尚的虚伪。我们时常沉默，却仍不习惯心中无根，仅仅听取别人的吵闹；我们时常沉默，却绝不会忽略自己心灵的感受，更放弃自己言谈的可能。我们焦躁、困惑，却仍有用稚幼来呼喊的勇气。

是的，我们当然能做点什么。我们相信，讨论必定会激发并坚定我们的思考，而思考最终会引领我们的行动；我们相信，自身点滴的行动也必将改变这个社会——因为人与人的关系，其实无外乎你与我的关系。我的改变，就是中国与天下改变的始端。

我们能做些什么？知耻近乎勇。理应以道德的态度检视自身。

我们能做些什么？好学近乎知。自当以学理的方式展开讨论。

我们能做些什么？力行近乎仁。终将以践行的努力改变中国。

围观即力量，思考或进步。请与我们一同在此思考。

（尹亮）

你所在的地方，就是你的中国

吴明玉*

曾几何时，当国人仍旧浸淫于天朝巨量的 GDP、成功举办奥运、亚运、世博、大运四大国际盛事时，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彭宇案及小悦悦事件却在肆无忌惮地挞伐和拷问着我们民族的良知和道德。当“老人倒地该不该扶起”、“孩童受危应不应施以援手”都成为问题时，我想我们的祖国真的病了。“不扶老不携幼”撕开了国人的遮羞布，我们猛然发现，滞后于经济发展步伐的除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萎靡不前外，还有我们的国民道德。

* 吴明玉，华南理工大学思想政治学院 2011 级硕士研究生。

在后小悦悦时代，这一事件留给我们的追问与思索远未停止。路人何以如此之冷漠？中国人的伦理底线在哪里？中国人怎么了？有的网友甚至发出“中华民族到了最缺德的时候，每个人必须发出最后的吼声”的嗟叹。该事件所引发的整个社会关于道德大滑坡的争议，我们可以视为一种国民情绪的累积性宣泄，从近几年的食品安全问题到新近的小悦悦事件，关于国民道德的争论一刻都没有停止过，更有一些法律界专业人士支持用立法的手段来加以净化社会道德风尚。对于用立法的方式来化解社会的道德危机，我并不同意，其可行性和操作性都存在着很多问题。如果每发生一件事，我们都要事无巨细地去立法的话，那我们的法律将停在何处？那将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一旦把这种道德范畴内的积极性权力法律化，即上升到法律上的义务，可能会造成一种更加专制与独裁的政治生态。

路人的冷漠让我想起了鲁迅笔下“麻木的中国人”，我不想用如此冰冷的字句去揣度国人的道德水准，但是现实又如此令人绝望。当小悦悦事件被国外媒体报道时，得到的更是一连串的“友邦惊诧”。当人的道德观念从人体中剥离之后，人与禽兽并无二致。人们所遵循的将完全是最原始的趋利避害的动物本能。彭宇案、许云鹤案使得人们会去计算行善的成本，当恐惧战胜了良知，其结果只能是更多类似小悦悦的悲剧事件发生。中国社会可能在改革开放这堂课中走得太快，以至于灵魂被遗落在了身后。我们可以把这起悲剧归咎于市场经济带来的价值虚无主义、功利化的教育体制、相关法律案例的负面示范作用、道德底线的失守以及体制内掌权者不守规则引发的整体性社会失范，这些都很有道理。但这些冰冷的社会学抑或政治学词藻无法温暖我们社会的道德良知，无法慰藉小悦悦亲人们的锥心伤痛。

任何社会良好道德规范的形成，都是由社会个体中的“我”建立的。记得前不久在新浪微博上读到一句话，深有感触，“不要抱怨中国怎样，你所站的地方就是中国的土地，就是你的中国，你怎样，中国便会怎样，你光明，中国就不会黑暗。”凤凰网友曾提到特雷莎修女的一句话，“你要去行善，即使别人说你处于何种自私的目的，但是你仍要把最美好的东西献给世界。”“道德的践行本就需要果敢，本就应该超越厉害得失之上，当我们要为做好事加上许多先决条件和理由的时候，本身问题就已经出现了。”（某网友语，不详）限于篇幅，言尽于此。一句话送给大家：“你的中国，从你做起”。

（责任编辑：武亚宁）

谁来捍卫中国的底线

韩笑*

佛山“小悦悦事件”已经过去一个多月，却仍然没有淡出人们的视线，一种“刮骨疗毒”般的沉痛令全社会陷入道德大反思中。无论是义愤填膺的指责，还是痛心疾首的失望，人们在怒斥肇事司机和路人冷漠、为拾荒阿姨的行为感动的同时，似乎又在同声发问：“谁才能捍卫中国的底线？”

助人为乐、扶危济困是道德约束下的个人行为，而惩恶扬善是良好制度环境的应有表现。随着“彭宇案”等救人反被诬告事件的发生，当恶行得不到惩治，善行得不到表彰，缺

* 韩笑，兰州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2011 级硕士研究生。

位的制度环境似乎让人们走向另一个极端。在危难时刻，人们趋利避害与自私的心理表现得愈发明显。所谓吸取“前车之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要惹麻烦上身”的想法更多地支配着人们的行为，最终表现为人情的冷漠，直到“小悦悦”事件的发生，也充分地暴露了这种冷漠。这种冷漠是可怕的，也是值得深思的。“美的反面不是丑，是冷漠；生命的反面不是死亡，是冷漠”。现在，这种比丑更丑，比死亡更可怕的冷漠犹如一把利剑已悬挂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头顶，我们都有可能受其伤害，也有可能用它来伤害别人。这其中不仅仅反映了社会道德的下滑，也凸显着中国制度约束的缺位。

中国是一个有着优良传统的国家，在发生了这么多令人心寒的事情后，许多人声称中国已滑落出道德的底线。其实在纵观近几年中国人在面对危难时表现出的扶危济困的良好凝聚力，与近期这些事情相比较，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中国，道德从未走远，只是缺位的制度环境让个体在可能产生的行为代价面前变得势单力薄。因此，真正考验中国的是如何将让个体变得强大，如何守好尽善的制度环境这一道社会公平的最后防线。

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胡适先生的这段话，虽有些偏颇，但也值得我们深思。惨剧发生了，我们除了严惩不负责任的肇事司机，谴责路人的道德没落，更重要的是去反思，去寻找解决的办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出现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类似问题不断地出现在这个国家。

（责任编辑：王志航）

莫让善良付秋风

宁厚欣*

轰动全国的“小悦悦”事件曾经带给国人深深的震撼，引发了我们对善良正义、见义勇为，以及相关机制、法律规范的深刻的反思。责备见死不救者、谴责当今社会的道德滑坡成为一种主流，更有一些人提出见死不救入刑的建议。可当我们冷静下来，仔细分析最近的见死不救案例后便会发现，缺乏对见义勇为的法律以及机制的保护或许是很重要的原因。

曾经的彭宇案已过去五年，我想当年审理这个案件的法官决不会想到这起普通的民事案件会有如此大而深远的社会影响，以至于一提到见义勇为被诬陷的案例，许多人仍会第一时间想到彭宇案。这个案件的判决不仅仅使当事人彭宇寒心，它带来的更多是国人对见义勇为的重新考量。如果见义勇为不但得不到褒扬，而且还会让你陷入麻烦的漩涡，你还会去做吗？社会上占绝大多数的还是普通人，如果他们的善心得不到法律或者机制的保护，他们首先想到的还是自保，毕竟在中国还没有法律规定惩罚“见义勇为”。所以我认为，缺乏对见义勇为的法律或机制的保护应该对当下见死不救的行为负主要的责任。

在西方法律体系中，有关的法律叫做“好撒玛利亚人法”，源自《圣经》中一位撒玛利亚人做好事的典故。美国各州规定：“除非‘照应提供关系’（譬如父母孩子或医生患者关系）

* 宁厚欣，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0 级硕士研究生。

在病症或伤害事前存在，否则任何一个人不被要求向受害者提供任何援助。只要援助者在同样训练的水平、在同样情况下作出合理的反应，法律上不需对受害者的伤残、死亡或毁行负责。”这首先即明确了“扶老人式”的做好事不是什么义务；其次即使你管了，在通常情况下，你也不必为受害者的伤残或死亡负责。显然，这种法律能够让人更愿意“见义勇为”。相比之下，我国关于这方面的规定就显得空白无力，才会出现诸如彭宇案之类的案例。

最近有些学者提出我国应把“见死不救”入刑，我认为我们没有权力去强制别人见义勇为，但是我们可以为见义勇为者提供一种保护至少使其不受伤害，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守护见义勇为者的这份善良。善良是人们最柔软的神经，伤不得。最后我想说，当我们不知道别人是好人还是坏人时，我们自己可以选择做个好人。

（责任编辑：李荟）

（上接第 57 页）

在校车经营方面，我认为，对于城市，一方面可以通过延伸公交的方法来缓解校车的需求。对于由于择校而产生的校车需求，由相关学校购买，费用由学生家长自理；对于那些城郊由于农民工而产生的校车需求，可以由政府购买成立校车专业公司经营这种模式。在广大农村，可以由政府购买校车（这类校车最好是通用性强的，这样公交公司平常还可以做其他用，进而回收成本），交给公交公司经营，同时可以通过调节学生放假时间，比如从周一到周日各个学校轮流放假，辽宁宽甸县就是如此。这样既可以缓解校车产生了成本压力，同时可以让校车得到最大利用。对于广大农村学前教育，由于幼儿不具备独立上学能力，一方面可以通过扩大公办幼儿园的数量，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民办幼儿园购买校车给予适当补贴等。

之所以目前我们校车事业步履蹒跚，我认为一方面这与我们国家在校车行业的相关政策不明有关，另一方面还是在于我们的地方领导人缺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可以说政府不缺钱，用缺钱作为校车发展的障碍，我认为这纯粹是个幌子。这方面可以通过我们每年的三公消费得出，也从各地贫困县出现的一个又一个“小白宫”政府建筑看出。拿正宁校车事件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去校车事发现场视察的领导座驾个个都非凡啊！这能说明我们政府缺钱吗，可以说与政府公车相比，校车消费简直是相当小啊！

希望我们的广大领导们能为我们未来的太阳多想想，希望我们的未来能够早日坐上舒心安全的校车！

（责任编辑：李荟）

新闻话题

“不仅仅是改校名”——中国军校大改革

时隔八年，第十六次全军院校会议于今年7月召开，以此拉开了新一轮军队院校全面改革的大幕，一些新的院校将被裁并，部分院校也将在调整后以新的名称出现。（比如原炮兵学院改名为陆军军官学院，西安陆军学院改名为边防学院，空军雷达学院改名为空军预警学院……）全军院校的整体布局、培训方式、课程设置等都在改革范围内。有专家预测，军院中的通用知识将逐步被剥离，没有显著特色和独特军事技术支撑的军事院校将在信息时代被淘汰。

《军校改革，“淬火”八年》，《南方周末》2011年11月17日，B10版

【点评】正如报道中所称，“军事改革，军校先行”。从军校名称的变化便可以一窥军事技术的进步，国防体系的变化等等。“兵者，国之大事也”，作为今日的国关学子，焉能不对军事体制的变革细揣摩一番？

温习“对不起”

10月28日，本埠媒体《新民晚报》头版头条登出《向被撞的同学说声“对不起”》，报道了大一学生小包骑车撞到了同学，心感愧疚的他在宿舍楼前张贴栏里贴出致歉信，并留下联系方式。小包说：“这些天学校里在讨论‘小悦悦’事件，我们也在思考大学生起码的责任。”

《向被撞同学说声“对不起”》，《新民晚报》2011年10月28日，第1版

【点评】在时下这么一个“礼仪之邦”，对不起或许是我们说的频率最高的一句话。不论对错，不管对象，甚至连穿过拥挤的人群我们都习惯说一句“对不起”。可我们说的却越来越有气无力，越来越有口无心。感谢小包同学，他的一句“对不起”比太多精英关于“小悦悦”事件的“学理诊断”高明得多，也感谢《新民晚报》，把这么一篇“无关紧要”的小事登上了头版头条。

言说空间

李泽厚再说“西体中用”

“自由、平等、人权、民主”都是普世的，这毫无疑问，但在制度的建构上，不必完全照搬。在制度的设计上可以添加中国元素。比方说中国传统比较讲人情，讲协调，讲不伤和

气，夫妻闹别扭、朋友闹纠纷不一定上法庭。我在文章中一再提到现在建立起来的协商、调解的机制，这就是中国传统，讲究情理融合。现在西方占主导的是“理”、“公共理性”，这仍然是中国目前极为缺乏而非常需要的方面、基础，必须具体落实到有操作性的法律层面上，但可以逐步加入中国“情”的元素。前不久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调解法》就说，首先建立在允许人家上法庭的基础上。愿意调解的可以调解，不愿意调解的，仍然可以上法庭。这个前提非常重要，这也就是我说的“西体中用”。

摘自《李泽厚再谈思想与学问》，2011年10月24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B02版

【点评】作为不可忽略的思想界大家，李泽厚一再强调的“西体中用”在当下的中国包含着什么意蕴，是值得深思的。

戴锦华谈电影《钢的琴》

中国社会的自救是亲友之间的相互救助，中国是一个重亲情血缘的国家，但是东北老工业区意味着，所有人都在一个工作系统中工作，可谓民生之忧。今天思考到“与其说是一个关于一个阶级的陨落，不如说是一个社会结构性重组后被放逐的人群。”导演重复“没落的阶级”，一方面说是对的，因为这个阶级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阶级没落成了底层；他说的也不对，是因为这个阶级没有没落，没有解体。MADE IN CHINA，作为中国最响亮的名字，中国成为全球加工厂，工业在迅速发展，众多农村年轻劳动力涌进城市成为齿轮与螺丝钉的时候，这个阶级是在极具扩张与膨胀。没落的是什么？是社会地位……他们曾经是工人阶级的老大哥，是国家的主人翁。

当我们今天讲50—70年代的时候，恐怕有个命题，不论是右翼的关于社会主义降低劳动力、毁坏生产、降低生产水平，把中国拉向倒退的叙述，还是左翼的历史辩护，说中国成功地在创造着中国的奇迹，完成了工业化，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工业化基础。无论哪种叙述都是经济学的叙述，今天发展主义逻辑所主导的叙述，所有这些叙述都不能呈现，在50—70年代人们尝试建立的社会主义文化，我们从《钢的琴》想起，社会主义文化的特征是，劳动者同时也是文化的创造者……“工人歌手”，一专多能、多才多艺是非常自豪的东西，可以使你在社群中受尊重。

电影结尾成了“摆脱劳动异化，摆脱劳动分工”，钢琴的生产者，也是钢琴的演奏者。这个段落确实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段落，理想的段落，大团圆的结局，向我们展示着一种“另类价值”和“另类可能性”，因为我们今天缺少的是梦想和想象，如果不能认同昔日革命的形态、昔日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那么我们需要想象，需要去建构，哪怕从乌托邦开始，从愿景中去。

原题《阶级，或因父之名》，2011年11月7日于北京大学讲座

摘自 <http://site.douban.com/widget/articles/5641675/article/15282666/>

【点评】看《钢的琴》，让人想起几年前的《三峡好人》，都是一种底层社会的现实描述，同时又都带有那么一点荒诞夸张的味道。比较而言，《钢的琴》更深触及了这个国家政制的现实与历史，无疑更加深沉与酷烈。戴锦华教授的解读，看到的是阶级的没落，更是阶级的抗争，还有对那未来愿景的深切期待。

先生之风

周其仁：旁听生纪念张培刚

二十六年前，也是秋冬时节，出差途经武汉看望先生。他病了，住在医院里，但见病床的一半堆得满是书。谭慧老师说张老要写《农业国工业化》的续篇，怎么也不肯放下。那张堆满书籍的病床，永远印刻在头脑里，教人懂得什么才叫做学问。

我们敬重先生的学问。他那 1949 年在哈佛大学得奖的论文，是发展经济学真正的奠基之作。不同于“乡村建设派”和“以农立国”论者的流行之见，培刚老师早在上世纪 40 年代就认定，中国农村——也是所有发展中经济的农村——无可避免地要沿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路线发生巨变。他的工作，就是系统地探索人类历史上这场伟大变革的规律与路径。

张培刚先生的学术思想——以节约纯商业费用协助经济发展、推进农业国工业化——在今天还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中国经济今天虽然总量位居全球第二，但农业国工业化、城市化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其中，国内市场的制度组织成本高于外销市场，依然还是转变发展方式的一个关键。离开了降低制度和组织成本这条主线，其他方方面面的课题怕不容易有根本的解决之道。

摘自《旁听生悼张培刚》，《经济观察报》2011 年 12 月 5 日，第 48 版

【点评】哈佛三剑客都走了。在发展经济学早已成为大众口中并不新鲜的名词之时，这位世界“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的声名，却依然仅仅停留在学术圈之内。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这或许正是学问之幸，学人之幸。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学界通人，毕竟只不过是一阵烟云，并不比有朽的万物腐烂地更慢。而唯有“双脚接地”的先生之风，才会泽被后世、山高水长。

附：张培刚小传

1913 年，张培刚出生在湖北省红安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里，从武汉大学文预科毕业后，于 1941 年以庚款留美考试全国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哈佛大学，期间师从熊彼特、张伯伦、布莱克、汉森、厄谢尔、哈伯勒等经济学家，于 1945 年 10 月写下了英文稿的《农业与工业化》。该文是世界范围内第一部以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为主题的专著。这本书使他斐声于西文经济学界，也使他成为世界上最早从历史上和理论上比较系统地探讨农业国工业化问题的经济学家，被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

1946 年，张培刚从哈佛大学毕业。一心想把理论付诸实践的张培刚回国，应武汉大学邀请担任武大经济系主任，和吴于廑、韩德培并称为“哈佛三剑客”。“文革”开始后沦为“反动专业权威”，常年与专业无缘，大好年华白白浪费。

“文革”结束后，张培刚才在华中理工大学成立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开设了经济学专业，用他自己的话说：“一直站了 30 多年，总算有一张凳子可以坐下歇歇脚了。”他先后担任华中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主任、教授，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随后，并与厉以宁合写了《宏观与微观经济学》，最早把西方经济学介绍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他通过著作和讲学，全面介绍了西方经济学、西方管理科学和世界经济的发展。

（责任编辑：尹亮）

落叶归根

刘长勋*

秋日的早街，冷静而萧瑟。时不时还吹来阵阵的冷风，仿佛要把这世间凄凉到底。

尽管如此，衣着单薄的劫，木然地坐在公园的长椅上，这冷清、这凄凉却赶不走他紧锁的眉头和眼中无尽的迷茫。

谁也不知道，这漫漫长夜他如何度过。只是长椅前，零乱堆积着的烟头，记录着他无眠之夜的分秒。

这时，四周响起了“沙沙”的扫地声，勤劳的环卫工人，已开始清扫从枝丫上飘落的枯萎的生命。

望着成堆的落叶，和清扫后干净的柏油路以及大树脚下的草地，劫一愣，这才发现，落叶不属于城市的大地。

这让他想起了故乡和故乡的那片小树林。那里有劫最温暖、最快乐、最幸福的记忆，而记忆中最美的要数秋日的小树林。

那高高的天，像水洗过般湛蓝清澈。蓝天下有最快乐的小伙伴，和小树林最美的妆颜。林间铺着厚厚的落叶，仿佛是为大地铺上的厚厚的地毯，走上去软软的。时而还会从林间飘来一阵清风，为这满溢的幸福加上动人的涟漪。

有时候，清风会卷起落叶，伴着透过林间的光晕，和着鸟鸣轻舞。落叶轻快而灵动地舞蹈着，仿佛枯黄与凋零不是逝去，而是新生的开始。在这一刻，劫每每仿佛看到了一张张笑脸和一双双自豪、幸福的眼睛。

是呀！落叶归根，何愁之有？这是大自然生生不息的循环，更是落叶用躯体和生命对给予自己一年生命的根和大地的回报，而后又会绽放更加绚丽的生命。这是对灵魂的洗礼，而这洗礼又是多么的神圣和幸福！

劫又想到了自己，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城市中流浪、漂泊。大学生的清高和不甘，几乎要把他与故乡隔绝。心中似乎早已没有了那种温馨、温暖的感觉。

每每碰壁，每每失败，总是会用彻夜的酒精和香烟麻醉自己，可醒来后却依然会有莫名的空虚。

想想连自己也记不起，有多久没有回到故乡的怀抱，回到那带给自己的小树林，回到那走在铺满落叶的林间的若有所思的时光。

一个、两个、三个……也已经数不清，自己究竟去过多少个城市。只是在每一座城市打拼、漂泊的他总会有一种无根的惶恐，仿佛自己是不属于城市的“存在者”。不断地寻找着工作，不断地变迁着生活地点，这让毕业之后的他，更加的迷茫和无所适从。

而心中的彷徨和惶恐，让漂泊的生活变得更加的虚幻和不真实。

城市中，有方便的交通、琳琅的商品，有完善的医保、社保，更有无数人心中的渴望的发财梦，这便是人们远离家乡，涌入城市的原因。

虽然，漂泊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可是城市是一个贪婪的物质者，它在带给人们无尽

* 刘长勋，郑州天星教育图书策划有限公司。

诱惑的同时，也让人们失去了太多。那些涌入城市的漂泊者，似乎像城市的落叶那样，失去了亲吻大地、回归大地的机会和念头。最起码，心已不会再回到根在的地方。

那落叶归根的传统和灵魂的洗礼，也许已被人们遗忘在物欲横流的人间。

漂泊、打拼，可依旧是失败，这冰凉的水泥怪物林立的森林，竟容不下一片飘荡着的树叶。而自己竟也忘掉了承载过自己这片树叶的根和大地，忘记了那神圣的灵魂洗礼！

劫，从长椅上站起身，拭去衣服上的清寒，抚平自己紧锁的眉头，走向眼前的那堆不知要运向何方的落叶。

庄重的捧起一捧落叶，轻轻地把他们埋在大树脚下的大地。仿佛是在进行一场庄严的仪式，且是关于生命的话题。

落叶归根，也许自己只能完成这些许落叶的夙愿。可也许就是这一些，却让自己找到了在城市中遗失的东西。

劫掏出手机，拨通了那个熟悉却又陌生的号码。

“喂，妈妈，我今天回家……”

也许，自己这片漂泊的树叶，是时候回归大地，去完成那一场神圣的灵魂洗礼！也许只有这样，自己才能得到最温暖的慰藉。也只有这样，才能找到真实的自己！

（责任编辑：崔攀）

校车事件反思

马新伟*

近日，围绕着“校车”这个话题，人们可以说是议论纷纷，特别是甘肃正宁县校车惨剧发生后，它带给了国人一片震惊与茫然。那么让我们先说下“校车”这个名词的产生背景。

在西方发达国家校车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作为西方的龙头，美国自从内战后工农业迅速发展，海边移民不断增多，但是由于美国地广人稀加上近年来的逆城市化，居民分布与学校的距离相对较远，这就为校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作为我国来说，首先由于近年来计划生育的施行，农村生源大幅度减少，进而产生了撤并兼校的情况，这样由于学生离学校距离较远，校车逐渐诞生了，并逐渐发展壮大；其次是在城市由于学校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公，造成很多家长择校的事件发生，这也是校车诞生的一个原因；再次是学前教育，由于大多数孩子都是幼儿不具备独立上学的能力，同时孩子的父母因为工作原因无暇接送孩子，这也为校车的发生奠定了基础；最后是由于近年来随着大量农民工进入城市，他们的子女也随之入城，然而城市的相关教育配套措施并不完善，导致了一些民工子弟学校的出现，而这些民工子弟学校往往与民工住处有很长距离，这也是校车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校车配置上，从上边可以看出，需求校车的人大都是些弱势阶层（除了城市择校的），因此这些人从本质上来说无法负起高昂的校车费，因此导致了目前在使用的校车绝大多数是中轻型客车和微型面包车主流品牌如金杯、昌河等而一些稍微大的客车大都是接近或者已经

* 马新伟，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0 级硕士研究生。

报废的公交车或客车等，在广大农村，农用三轮等简易车辆更是校车的主力军。按照最新国家标准统计 90% 的校车是不合格的（教育部 2011 年 11 月公布数据）。可以想象这样的校车配置会造成何种后果，正宁县校车惨剧就是明显的例子。

从校车管理上，一方面由于国家对于校车相关的法规不完善，造成了我们整个社会环境对于校车了解关心等等都不够，比如在美国校车优先的法律已经成为了人人所达成的共识，连总统也得礼让校车；在驾驶员素质上，我国的校车司机大都是私家车（持有 C 照，按规定得持有 A 照）有的更是无证驾驶，而在美国，校车驾驶员大都是素质较高的女性。另一方面由于需求校车的大都是未成人，更有一部分是幼儿，自治能力欠缺，而作为直接管理方，学校和幼儿园（大都是民办的）由于人多教师少，在管理上混乱，这就造成了很多人不能得到合理照顾，最近在湖北更是有幼儿拉进校车无人管的情况；另外这些教学机构为了省钱大都超载，其超载量甚至达到 5 倍，更有甚者导致一些幼儿因为超载、呼吸困难而死的事件发生。

在校车事故上，可以说近日正宁校车事件只是近年来发生校车最严重的一次，但并不是唯一或少有的一次，据统计近年来有关因校车而死亡的学生人数已经超过了煤矿的矿工人数，其数目之大可以想见。另一方面，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不断发展，已经跃居世界第二，而类似校车事故却是层出不穷，这两者让人难以想象。所以事件发生后，有些媒体甚至说没想到一直以来只有在印度发生的事情居然也会发生在我们的头上。唉！

在校车经营方面，目前大致有四种方式。第一，由政府出资购买校车，成立专门校车公司经营，政府每年进行补贴，收取学生少量费用。以浙江德清为例。但是这种方式由于政府负担过重，只有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才具备。第二，由公交公司购买并经营，政府不补贴或少补贴，费用以向学生收取为主，以青岛为例。由于费用高昂（每月 300 左右）只能在城市普及。第三，由政府购买，然后分配给各个学校由各自学校独立经营，以南京为例。这种方式由于各个学校在经营管理上困难，造成了大量资源废置。但是这也是目前比较合理的一个方式。第四，由各个学校自己购买自己经营，这大大加重了学校的负担，同时学校也会把相应的成本转移到学生身上，不利于普及。目前这种模式大都发生在贵族幼儿园或者一些培训学校等。第五，学生家长自己接送学生，这也是目前最普遍的方式。这种方式给学生及家长带来了很大不便。

对于目前这种困局，我认为我们必须加大步骤尽快给学生一个安全的绿色通道。具体如下：

在校园设备上，目前我国客车相关企业已经相继研发了多款优秀安全的校车，具备了给广大学生提供校车的能力，但是我认为广大客车界应该着眼于校车这个公益事业，尽量降低校车成本，压缩利润空间，为社会做出贡献。

在校车管理上，一方面我们要坚决打击、取缔那些黑校车或用报废车辆作校车的事情，同时我们还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做法，完善校车管理体制。比如校车优先，校车统一标识等。同时考虑到目前校车成本高昂，有一部分是由于我们的税收造成的，国家可以在这方面减免校车行业的税收或管理费用等。另一方面要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投入，众所周知目前我国学前教育有很多一部分是私人经营的，这也限制了他们在教育上的投入。同时作为国家公益事业如红会、慈善基金会私人等应该更多投入校车这一方面。（下转第 51 页）

欧债危机

2010年欧洲各国债务与GDP比值



【编者按】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欧元区主权债务问题日益凸显，从2009年末的希腊开始蔓延，越演越烈，在欧洲乃至世界引起震荡与恐慌。时至今日，虽有多方努力，欧债危机仍未得到解决。症结何在？是欧元制度设计，危机国本身经济奄奄一息，关键国的应对措施不够积极，欧盟集体行动力低效？

欧债危机如何解决？欧元区能否借机改善机制？欧盟未来何去何从？

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中的重要事件

2009年10月20日	希腊政府宣布当年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超过12%，远高于欧盟设定的3%上限。随后，全球三大评级公司相继下调希腊主权信用评级，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率先在希腊爆发。
2010年2月11日	鉴于希腊形势紧张，原计划讨论欧盟未来十年经济发展战略的欧盟特别峰会被迫转向讨论希腊债务危机。会上，欧元区国家领导人同意在应对希腊政府债务危机问题上采取协调行动维护整体金融稳定，但没有出台援助希腊的具体举措。
2010年3月25日	欧盟峰会达成由欧元区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必要情况下联手救助希腊的协议，并决定设立一个由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领导的专门小组，为完善欧盟经济治理、防止希腊式债务危机重演提出改革建议。
2010年4月11日	欧元区成员国财政部长商定希腊救助机制进一步细节，同意在

	<p>必要情况下第一年拿出 300 亿欧元资金支持希腊。</p>
2010 年 4 月 23 日	<p>希腊政府被迫向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要求启动救助机制。</p>
2010 年 4 月 27 日	<p>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把希腊信用评级从 BBB 下调为 BB+，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垃圾级。同日，同样存在严重债务问题的葡萄牙也遭降级。西班牙的信用评级第二天也被下调。</p>
2010 年 5 月 2 日	<p>欧元区成员国财政部长召开特别会议，决定启动希腊救助机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道在未来 3 年内为希腊提供总额 1100 亿欧元贷款，其中欧元区出资 800 亿欧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 300 亿欧元。希腊同日宣布了大规模财政紧缩计划。</p>
2010 年 5 月 5 日	<p>希腊暴发全国性大罢工，10 万人举行示威活动，抗议政府的财政紧缩政策。</p>
2010 年 5 月 10 日	<p>欧盟 27 国财长决定，联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设立一项总额高达 7500 亿欧元的稳定机制，帮助可能陷入债务危机的欧元区成员国，阻止希腊债务危机蔓延，其中 4400 亿欧元由欧元区国家以担保形式提供，另有 600 亿欧元将由欧盟委员会从金融市场上筹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 2500 亿欧元。</p>
2010 年 5 月 18 日	<p>欧元区成员国财政部长决定向希腊拨付首笔总额 200 亿欧元的救助资金。</p>
2010 年 5 月 25 日	<p>意大利政府出台 250 亿欧元财政紧缩计划。</p>
2010 年 5 月 27 日	<p>西班牙议会批准 150 亿欧元财政紧缩计划。</p>
2010 年 6 月 16 日	<p>法国政府宣布退休制度改革计划，将退休年龄逐步从 60 岁提高到 62 岁，以减轻财政负担，这在法国国内接连引发强烈抗议。</p>
2010 年 7 月 7 日	<p>德国政府出台 4 年期的财政紧缩计划，共开源节流 800 亿欧元。</p>
2010 年 7 月 13 日	<p>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把葡萄牙的信用评级降至 A1。</p>
2010 年 9 月 7 日	<p>欧元区成员国财政部长批准向希腊提供第二笔贷款，总额 65 亿欧元。同日，欧盟成员国财长同意，从明年起引入一套名为“欧洲学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届时，欧盟成员国的预算方案和改革计划需要提交欧盟委员会审议。</p>
2010 年 9 月 30 日	<p>爱尔兰宣布，由于救助本国五大银行最高可能耗资 500 亿欧元，预计今年的财政赤字会骤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32%，实属史上罕见。</p>
2010 年 10 月 28 日至 29 日	<p>欧盟领导人通过专门小组报告，决定从强化财政纪律、新建宏观经济风险监测机制、加强经济政策协调和建立永久性的危机应对机制这四个方面完善欧盟尤其是欧元区经济治理，堵住债务危机所暴露出的欧元体制性漏洞。由于建立永久性危机应对机制涉及修改《里斯本条约》，欧盟领导人决定到 12 月的峰会</p>

	上再具体商定。
2010年11月10日	爱尔兰国债收益率升至欧元 1999 年诞生以来的最高水平，债务形势急剧恶化。
2010年11月21日	爱尔兰政府正式请求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救助，沦为第二个希腊，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掀起第二波高潮
2010年11月24日	为满足获得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救助的条件，爱尔兰政府公布了一份四年期的财政紧缩计划，拟削减财政赤字 150 亿欧元。
2010年11月28日	欧盟成员国财政部长举行特别会议，通过爱尔兰救助方案，总额 850 亿欧元。与会的欧元区成员国财长们同时商定，欧元区未来建立的永久性危机应对机制将允许私人投资者为主权债务危机分担损失，但这不适用于目前已经出台的救助机制。
2010年12月2日，	欧洲中央银行召开货币政策月度决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 16 国主导利率维持在 1% 的历史最低水平，并继续向金融机构注入流动性。此外，为了遏制爱尔兰债务危机蔓延，欧洲央行加大了购买欧元区国家国债的力度，市场恐慌情绪暂时得以缓解。
2010年12月16日	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消息人士透露，就如何修改《里斯本条约》以建立欧元区永久性危机应对机制达成一致。欧盟领导人同意，在 2009 年 12 月 1 日刚生效的《里斯本条约》中加入两句话，即“以欧元为本国货币的成员国可以设立一套稳定机制，在迫不得已时，为维护欧元区整体稳定而启动。根据这套机制提供任何所要求的财政支持，都必须附加严格条件。”这两句话为欧元区国家建立永久性危机应对机制提供了法律依据。
2011年3月21日	欧盟成员国财政部长在布鲁塞尔召开特别会议，专门讨论欧元区永久性救助机制的细节并达成一致。根据会上达成的协议，名为“欧洲稳定机制”的欧元区永久性救助机制将是一个由欧元区国家依据国际法、通过缔结条约成立的政府间组织，总部设在卢森堡。欧盟领导人在 24 日召开的春季会议上通过了这套全面应对方案。这套内容庞杂的全面应对方案既包括了扩大现有救助机制的规模和用途、为希腊等国接受救助减负和开展新一轮银行压力测试等短期措施，也包括了深化经济治理改革、建立欧元区永久性救助机制和增强欧元区国家经济竞争力，促进经济趋同等长效举措。
2011年4月7日	欧洲中央银行宣布将欧元区主导利率由现行的 1% 提高 0.25 个百分点至 1.25%。这是欧洲央行自 2008 年 7 月以来首次加息，同时也是对在 2009 年 5 月降至历史最低点并维持至今的 1% 的

	主导利率首次向上调整。
2011年8月15日	欧洲央行宣布上周购买欧元区重债国国债，总额达220亿欧元（约合320亿美元）。欧洲央行2010年5月开始购买欧元区国债，以稳定债券市场稳定。截至目前，欧洲央行斥资购买欧元区重债国国债累计达960亿欧元（约合1396亿美元），其中包括希腊、葡萄牙、爱尔兰、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的国债。
2011年10月13日	斯洛伐克国民议会批准欧洲金融稳定机制扩容议案。至此，欧元区所有国家均已经批准欧洲金融稳定机制扩容计划。增加欧洲金融稳定机制（EFSF）有效放贷水平及其弹性是欧盟阻止债务危机蔓延的主要“武器”。根据欧盟规则，欧洲金融稳定机制扩容议案需要欧元区每个国家的批准方能生效。
2011年10月19日	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宣布，欧盟将推出总额500亿欧元的大规模投资计划，用于发展交通、能源和数字网络，以确保欧盟的未来发展和就业增长。
2011年10月27日	欧元区首脑就解决债务危机达成一揽子协议。根据协议，现有救助机制即欧洲金融稳定工具（EFSF）规模将扩大（法国总统萨科齐宣布扩大到1万亿欧元）；在2012年6月底前将欧洲主要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提高到9%；银行业同意对希腊国债进行50%的减记。

欧洲每一次从困难中走出，都将变得更加强大。而欧洲从这次危机中得到的教训是政府失职以及制度缺陷。PIIGS 五国政府在应对危机时的失职行为导致危机不断升级。而欧元区本身的制度缺陷，导致危机中各国无法通过本币贬值的方法缓解危机。相信在危机之后，欧元区必定会在制度建设、政策实施方面进一步完善。

——崔攀

在这个“大债时代”，最吸引人眼球的莫过于当前的欧债危机。它从2008年的星星之火发展成如今的火烧连营，冰岛、希腊应声而倒，意大利、西班牙岌岌可危，就连一向不可一世的法国都发出“破产”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的悲叹。欧元区各国在相互谩骂之后，迅即投入“防火墙”的构建加固之中，以防下一块多米诺骨牌的倾倒，造成连锁式的风险传递。但是欧元设计制度上的先天不足即只有统一的货币政策而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却使诸多灭火行动往往只能起到暂时性强心剂的作用，并不能根本解决这一系统性问题。欧元的命运让我们拭目以待！

——陈安龙

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法德是主导者，这次欧债危机法德想缔结新的条约，而英国则一直是欧洲一体化的捣蛋鬼，反对让渡主权给欧盟，反对声浪又起，鉴于英国的这种态度，卡

梅伦政府是否会做出让步，如何与欧盟妥协，关系欧盟的未来，也关系英国的未来。

——陈洁琼

持续观望中。引巴菲特老人家一言，欧洲债务危机是因为欧洲货币联盟本身存在着弊端，要不各国更紧密合作，要不欧元消失。

——胡彦

资本主义病了，这次还病得不轻，欧洲为这场病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对于还处在起步阶段的欧洲一体化无疑是个巨大的考验。但在这场考验中，法德两国的声音让人们感到，“欧洲一体化”这一概念不过是个理想化的产物。

——李荟

“欧债危机”考验着欧盟进程能否进行下去，也反映了欧盟需要进一步加强对经济方面的管理。也许一个强有力的欧洲中央银行是必须的。

——李沛

从 2010 年 6 月开始，10 国政府在不到 18 个月的时间里垮台，默克尔所领导的基民盟在其所在州输掉了选举，萨科齐也不得不将痛苦地面对 2012 年大选。为什么是欧洲？为什么欧债危机此起彼伏、愈演愈烈？简单说来，本文的回答是：因为欧盟同时面对的是三场危机——次贷危机、债务危机和欧元危机。

罗斯福新政以后，经济危机的内在逻辑决定了金融危机—国家主权债务危机—金融危机—实体经济危机（过剩）的这么一条链式反应，当前的经济危机会在这一链条的哪一个环节烟消云散，又或是翻云覆雨当前还无法预料。金融机构的纾困必然伴随着国家主权债务问题的凸显。

现今所有的国家都或多或少的存在主权债务问题。但问题是，为什么这次大危机集中爆发在欧洲？事实上，由于新兴国家低福利低人权的快速崛起，加上发达国家高福利高消费的制度因素构成了新兴国家高储蓄—发达国家高债务的普遍背景，这在全球促成了“中美国”的大循环，在欧洲则表现为以德国为代表的勤奋的新欧洲与“懒惰的不劳而获的”地中海国家为代表的老欧洲的循环。这一循环的产生与发展有其独特的机理。如果说二战后的历史环境塑造了欧洲一体化的独特轨迹，那么，苏联的解体则使欧洲变成了没有敌人的一帮家伙。欧盟迅速地成立，欧元区成立，欧盟东扩，甚至差点通过了一个欧洲宪法条约。事实上，从总体上来讲，欧洲国家的主权债务水平相比其他国家，并不是到了多么糟糕的地步，其综合经济实力和财税收入等偿债能力在世界上也无疑是数一数二的。可以说，欧洲的确存在着债务问题，但整体上却不存在出现债务危机的条件。

然而，欧元危机的发生从经济上来讲却无疑是早晚的事。因为政治原因，欧元的设计在制度上有先天的不足，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各自为政的财政政策必然是不可持续的。欧元区实际汇率的错配最终诱使南欧国家（老欧洲）大规模财政扩张。而金融危机的到来，欧元作为国际主要货币也首次遭受着危机的洗礼。

把次贷危机、债务危机和欧元危机拆开来分析，是为了便于理清看透。但事实上今天展现在众人面前的欧债危机，却是截然不分的。这是一场由次贷危机诱发的，由欧元机制固有缺陷所决定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这场危机并不是一场还不上钱的危机，这场危机的核心是信用危机。危机的展开也就是欧洲信用体系的逐渐崩溃，而欧元区在危机管理和应对方面固有的机制缺陷和经验不足使得危机此起彼伏、愈演愈烈。

——李洋

继 2008 年金融危机后，欧洲债务危机凸显，先是希腊，然后是其他欧洲国家，甚至包括实力较强的西班牙。如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相继出现危机。原因是复杂的，我认为是在既有体制内长期积累的结果，欧洲国家的刚性高福利是重要原因之一。要解决此问题、避免演化成全球危机，需要集体努力，但最根本的是欧洲国家自身应该更加重视实体经济的积累，比以往更加辛勤地工作。

——秦珊珊

欧债危机，不仅仅是场危机，更是个世界发展的问题。2012 年世界经济衰退的局面已经形成，债务问题和革命问题一道弥漫到整个世界，促使无序化的世界混象加速出现。

——孙超

欧债危机的背后是更深层的较量，就是美国和欧洲正在展开一场货币主导权和债务资源争夺的大战，是美国维护其全球金融霸主地位、打击敌人必要的杀手锏！

——王心志

我认为，欧洲债务危机很大程度上因为欧洲一体化进程过快，对于风险的评估明显不足。自煤钢联营开始，欧洲一体化一直平稳进行，成绩斐然，导致欧洲各国对一体化进程过于乐观，泛欧洲主义过程中理性思考成分逐渐下降。货币一体化为代表的金融一体化趋势既缺乏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也难以克服各国经济差异所带来的种种矛盾。

——王志航

本次欧债危机体现了欧元的先天缺陷，统一的货币政策伴随不一致的财政政策，使得欧元这个“怪胎”步履维艰。像希腊这样的福利国家受金融危机影响，财政收入明显减少，但福利开支减少的民主压力很大，导致了欧洲国家的福利赤字。

——维一

由于不太懂经济学所以不知道欧债危机的内在机理是什么，但通过欧盟各国对希腊的积极救助可以看出，欧盟作为一个整体的作用显现了出来，只要希腊政府和欧盟积极应对，拿出对策，相信在欧盟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不仅在于问题本身，还在于欧盟在国际政治中地位的上升，国际形象的提升，因为这预示着欧盟终于可以在不严重依赖美国的情况下解决重大问题！

——吴庆隆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引发了全球各界对欧洲一体化、全球化和未来世界格局的广泛与深入思考，作为继 08 金融危机后全球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欧洲能否度过这次严重的危机，以及如何度过这次危机，将相当大程度的影响未来十年国际格局的发展。在全球大变局的前夜，我想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反思：首先是对一体化理论与模式的检视和再反思；其次从世界史角度看此次危机如何对转型中的国际体系产生影响；第三，非西方如何认识和分析西方内部危机，如何再认识西方文明；最后，欧债危机的外溢效果如何影响到欧洲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尤其是新兴国家，新兴国家如何应对这些外溢效果。

——吴途勇

国人对欧债危机的反映，又一次陷入了惯有的夸大他国危机、唱衰欧美的怪圈，沉醉在“只有中国才能拯救欧洲”的一厢情愿的幻觉中。其实，欧债危机并不见得如主流媒体所报道得那样恐惧与严峻，它只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发展大周期中的正常小事件而已，以欧美智囊的力量与协作，欧债危机一定会迎来一个圆满且具有跨时代意义的解决，此后的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将开启另一个时代。

——武亚宁

12 月 9 日举行的欧盟峰会将再次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欧洲又到“成败在此一举”的关头。有专家表示：此次峰会有望达成某种程度的新“财政条约”推进欧元区的财政一体化——以法律的、可操作的方式约束各国财政预算纪律，加强各国经济政策方面的一致性。在欧债危机日益加剧的背景下，相信欧洲有所担当！

——杨茗

欧盟作为一个整体，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所以欧洲的经济混乱必然会带来全球性的后果，甚至会导致贸易萎缩，威胁到全球金融体系。此次，欧洲遭受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主权债务违约和欧洲单一货币崩盘的威胁不断加大——随之加剧的，还有银行破产、普遍恐慌、深度衰退以及大规模失业的威胁，就像现代版的大萧条。

——尤睿娟

欧债危机不断升级，其对我国的影响也日益受到关注。虽然欧债危机对国内银行业造成的直接损失微乎其微，但因危机引发的外需压力则出现了上升趋势。鉴于希腊债务违约风险不断上升，未来不能排除破产甚至退出欧元区的可能性。对此，我国应充分做好应急预案，并重新审视宏观政策，主动应对未来欧洲经济增速放缓影响。

——张莹

2007—2009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欧债危机有直接影响，它是全球凯恩斯主义在全球化时代遭遇的必然结果。其实，欧洲人民对福利要求低一点，工作卖力一点，国家社会保障上少投入点，啥事都没有了。

——张元

此次蔓延全欧的债务危机，再次让西欧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当然，自人类历史拉开帷幕起，西欧从未离开过人们的眼光。欧洲联盟，作为迄今为止地区一体化实践最成功的案例，是西欧人民智慧的结晶，已是前无古人的一项创举。它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难免遇到坎坷甚至被绊倒，但它一定会再站起来，带着更稳健的步伐继续前进。危机只会使欧盟更加成熟更加完善，它克服危机的每一种尝试都将成为宝贵的历史经验。我认为，此次危机不仅是欧洲的危机，也是全人类的危机，我们应当不分彼此，共同为危机的消除贡献自己的力量和智慧。

——曾乔圆

对于此次欧债危机，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资本主义本身矛盾固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但本人想从一个长时段的因素看待此次危机，即西方社会的福利政策。诚然，从人道主义角度来说，福利政策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但不得不承认，这一政策造成了社会整体的享乐主义，从而降低了经济增长。

——周生升

当下欧洲主权债务问题无疑牵动着全球智囊的神经，由于长期高福利加低生产率的不平衡配置，老迈的欧洲在金融海啸退潮后疲态尽显。从里斯本到都柏林，由公众的政治不满所引发的工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再一次印证了中国的古老箴言——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如何舒缓欧洲大陆天堂一般的生活传统与当下寅吃卯粮的虚假富足之间的巨大社会张力成为了每一个“殖民帝国”政治家们需要共同承担的时代责任。也许埃德加·莫兰的洞见能给陷入重重迷雾中的局外人指引一条观察欧洲，理解欧洲的捷径：“欧洲的基础就是基础的不断丧失……欧洲的秩序，就是喧嚣混乱的非秩序……保存自我对欧洲来说命运攸关，这使它必须迎接一次新的变异。”

——朱承璋

这场欧债危机的不断蔓延表明当前欧元区的制度体系注定只是个过渡形态，要建构一个可持续的稳定的欧元区恐怕需要更切实际、更为有效的制度设计。有人认为，这次欧债危机是美国次贷危机在欧洲的延续，但须知，由于制度上的缺陷，危机出现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最重要的任务是实现欧元区统一的财政政策和建立完善的成员国退出机制，但动员各成员国在这些问题上达成共识实非易事，尤其是那些南欧福利国家。而此次危机或许是一个很好的契机，至少可以让成员国认清制度缺陷并设法加以弥补，目前看来，应对此次欧债危机仍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朱永福

（责任编辑：李荟、李秋悦、张元、章航翔、朱永福）

国关院 2011 年 11 月—12 月集体活动大事记

国关院男女篮参加第四届 ENBA 篮球赛

2011年11月，作为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科技文化节的一部分，第四届 ENBA 篮球赛在中北校区拉开帷幕。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增设了女子篮球比赛。这令赛事增色不少。我院学生积极参与此项赛事，表现不俗，场场精彩。运动员在场上奋力拼搏，啦啦队在场下呐喊助威。在此，参与这一活动的各位同学书写下自己这段美好的回忆。令人高兴的是，我院男篮获得中北校区第三名，女篮更是巾帼不让须眉，勇夺中北校区亚军。闻道编辑部特别邀请到参与男女篮比赛的几位同学，请他们畅谈参赛的感谢。



刘佳琪：研一看男篮比赛的时候，曾经开玩笑的说，咱们院要是打女篮比赛，成绩肯定比男篮好。没成想，第二年就真的有了女篮比赛，本着重在参与的精神，七八个会打不会打的姑娘拼拼凑凑组出了一支队伍。从女篮组建到三场比赛的进行，一直被姑娘们的坚强、勇敢、团结感动着。大家互相鼓励，众志成城，哪怕训练比赛累到精疲力尽、身体不适、受伤，每个人都无怨无悔，尽全力克服所有困难。在赛场上，听着场边同学们的加油声，更是热血沸腾，拼劲十足。我衷心感谢每位参与篮球赛的姑娘们，每位支持女篮比赛的同学们，集体的力量很强大，集体的温暖很幸福。我想，年轻时总要做些充满激情的事情，给自己留下些青春的回忆，而这段与姐妹们齐心协力共同拼搏的日子，单纯而美好，我必将铭记。

程艳阳：本届女篮比赛我们一共打了3场，但比赛前姑娘们只集训过一次，所以上场前我很紧张，心里完全没底！加上第1场比赛就遇上实力最强的球队，不免压力很大！但越是困难反而越能激起大家的斗志，虽然当天比赛输了，我们还是坚持继续打下去！

后来的赛事变得愈发顺利，姑娘们的配合也逐渐默契了！抢篮板、上篮、争抢、快攻，大家都拼尽全力，并以两赢一输的成绩收获了第二名。

由于平日缺乏锻炼，高强度的比赛让我频频体力不支；双方争抢中的肢体碰撞和对方的小动作也曾令我气愤难平！然而，当身体的疲惫与内心的怒气都平缓之后，我内心所剩的满是胜利的喜悦！

现在回想起当时一群满身冲劲的姑娘在篮球场上挥汗如雨的情景，我只想大声说：“姑

娘们，我们 hold 的住！” ^^

此次比赛的胜利离不开姑娘们的“奋力厮杀”，但也少不了女篮教练董成龙童鞋的倾力执导，木有你的指点江山就木有我们的今天。教练，你辛苦啦！ ^^

神合雪： 不去管结果如何，也不考虑水平高低，与大伙儿一起打篮球的日子很放松，很开心，感觉回到了大学时代。

何文婕： 快乐——篮球场上奋力的奔跑，激烈的抢球，艰难的投篮甚至抢球时诡异的表情，都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欢乐，输赢真的不重要，过程有趣才是王道！

团结——几个不懂规则的菜鸟和一个着急冒火的教练构成了我们这支篮球队的“强大阵容”，不太熟练的配合阻挡不了我们进球的决心，哈哈，众人团结的感觉真好！

感谢——场上的同学受伤了，站起来接着跑。场下的老师同学不休息，来为我们呐喊加油甚至与对方口水战，更要感谢我们无私的教练的悉心指导。谢谢各位，我也相信这段经历将成为大家美好的回忆！

李婷： 研一小学妹杨茗在微博上私信我，请我对篮球赛写点小感想，虽然是作为一名替补的替补队员，但三场比赛，我都有份参加，感触还是蛮深的。在比赛之前，佳琪组队之时，来我们寝室问过我要不要参加，本着不迫害集体的原则，我没有加入。当然，作为拉拉队员，我还是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啦。三场比赛下来，我作为队员发力不大，但是作为拉拉队员，呼喊声还是竭尽心力的。在场边为我们的女篮加油，是一件乐并骄傲的事情；在场上为我们的女篮奔跑，也是一件累并快乐的事情。在此可以自豪地说一句：姑娘们，你们在场上是纯爷们！当然，我认为比赛还是要有一种精神的，就比如我们最后一场比赛的对手，是欠缺这种精神的，最后，用纪小楠同志的一句话结尾：打球还是要看素质滴！

孙婧： 篮球赛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过程！

集训时我们痛并快乐着，身体上的腰酸背痛掩盖不了大家一起练习的愉快心情。比赛场上大家完全忘我，彻底投入，仿佛自己成为篮球高手，虽然球技烂的可以，但我们的热情无人能敌。从训练到比赛，我们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团队，什么是集体。大家为了球赛，摔破了腿磕破了头，但是拍拍灰又站起来，依然奔跑在篮球场上。

我想，在这里我们应该记这样几个词：战略、合作、团结、拼搏！



王心志： 在11月和12月，我们学校举办了研究生篮球比赛，我们院队先后和心理学院，光谱学院，河口研究院打了比赛，我班的生升，承璋还有我都上场参与了比赛。我们大胜光谱学院，最后以2分的差距惜败河口研究院。经过这次的篮球比赛，不仅提高了我们的身体素质，并且培养了我们的团队精神和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作风，磨练了我们的意志，增强了我们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更让我们懂得了，不管是胜利还是失败，其实都是件好事。胜利是好事，但也许会让你骄傲，反而起到相反的效果。而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今天的失败预示着下次一定会成功，因为我会化伤心为力量，化压力为动力，我们会总结其失败的原因，吸取这次不成功的教训，取长补短，争取下一次成功！我们的口号是：我运动，我阳光，我开心，我健康！加油！国关国关叱咤云端！

朱承璋： 11月23日，研究生篮球赛举行了淘汰赛阶段的第一场比赛，由国关院对阵教科院。两队从实力上来说差距较大，教科院兵强马壮，拿出了2个足球队阵的阵势企图一举打败持个体户身份的国关队。

比赛刚开始，大家打的都很紧，手上感觉比较冷。相对来说，国关院的外线实力比较强而教科院中锋的能力高人一等，所以双方在进攻上针对性很强，各打各的优势。这就意味着谁防守出色，谁就更有可能拿下比赛。上半场比赛非常胶着，双方的上分速度很慢。到了下半场，国关院缺兵少将的弱势在体能这个环节暴露了出来，比分一度被拉开到了7分，教科院中锋手感火烫，连续拿下了关键比分。这时，国关院及时叫了暂停，改变了战术，上场后又一度将比分拉近至2分。可惜时间已经所剩无几，最终国关院以2分之差输给了教科院。遗憾的告别了冠亚军的角逐。



周生升： 作为刚入学院的新生，有幸代表我院参加本次研究生篮球比赛，我感到非常兴奋。国关院篮球队人虽然少，但是大家对篮球的热情一点也不输给其他学院。在小组赛中，我们充分发挥了敢打敢拼、团结一致的作风，闯入了4强赛，创造了近些年来学院的最好成绩。希望明年的国关院能再创佳绩，也希望更多的同学喜欢上篮球这项运动。

维一：【最美丽的姑娘】 首先声明一下，我只是看了两场比赛，木有很多感想，无奈“为赋新词强说愁”。在传统的眼光中，女孩子文静端庄才是美丽，但在女篮比赛中，我见到了另一种美丽，而且更加真实，更加绽

放。为了梦想，为了同伴，为了一种荣誉感和使命感，无论在多么困难的情况下，无论多么绝望和急躁，都勇敢地战斗下去，拼搏、摔倒、再拼搏。为了什么呢？我难以名状，或许是人性中的另一种美丽。印象最深的还是最后一场比赛的下半场，我们只投进了一个球，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时是快攻反击，何晴倩持球快攻，同时下快攻的还有神合雪，对方在后面猛追，之前双方都投失了好几次进攻机会，而且动作越来越大，情绪都有些许失控。作为记分员，我清晰地知道我们还落后一分，我以为何晴倩会传给神合雪，来完成这次至关重要的进攻，没想到，她直接杀到篮下，挑篮打板球进，这是唯一的进球，也是制胜球。重要的是，我们赢了。她们展现了另一种珍贵的美丽，胜利为这一切画上了完满的句号。

杨茗：感觉有比赛的日子好像已经过去很久了，可是当看到大家写的这些文字的时候，眼前仿佛又浮现出当时的场景：场上奔跑着的我们，场下神情紧张的我们，进球时欢呼雀跃的我们……不经意间流走的都成了美好的回忆。我想我敢说，这是没有遗憾的比赛。

国关院参加第四届“宏辞论道”研究生辩论赛

2011年11月18日，由我校研究生会主办的第四届“宏辞论道”研究生辩论赛在文附楼丽娃讲堂拉开帷幕。本届“宏辞论道”辩论赛以“小研探寻多元文化之旅”为主题，鼓励研究生关注高等教育、新媒体发展、学校文化建设等方面的话题，以期学子们在与各院系所的交流中求学，在思想交锋之中求知，在唇枪舌剑之尖求索。由我院王志航、尹亮、周生升、朱玉冰同学组成的辩论队分别与对外汉语学院、公共管理学院进行了两场精彩的比赛。



初赛的论题为“是否应该允许名人免试入学”，我院选手为正方，认为应该允许名人免试入学；反方的外汉语学院则坚持不应该允许名人免试入学。双方在陈词、攻辩、自由辩、总结四个环节表现出了研究生水准的精彩辩论，观点明晰、逻辑缜密、论证到位，又不缺乏

生动的例子。现场气氛热烈，喝彩声此起彼伏。赛后，评委给予了双方较高评价，并进行了辩论技巧的指导，选手们表示受益良多。我院胜出。

12月2日，中北赛区决赛依旧在丽娃讲堂展开。这次的论题为“微博使生活更自由还是更拘束”。我院此番为反方，认为“微博使生活更拘束”，正方公共管理学院认为“微博使生活更自由”。正方指出微博带来了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和行动自由，“微力量”可以凝聚人心，形成有意义的社会行动。反方则引经据典，呼吁观众们对微博作为技术枷锁的反思，认为微博会引发不合理占用时间、缺乏行动能力、群体盲思等可能性。最终，正方公共管理学院以微弱优势胜出，我院王志航获得了优秀辩手称号。

此次辩论赛，四位选手充分展示了国关院学生知识面广、思辨能力强、表达能力优、团队协作好的风采，受到评委、观众的一致好评。

2011级研究生冬季晨跑活动

2011年12月9日上午，为纪念“一·二九”运动，培养同学们的毅力与奋斗精神，同时提高同学们的身体素质，并且展现我院学子的阳光与青春活力，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11级研究生开展冬季晨跑活动。阳光却也只是娇媚，实则“笑里藏刀”——寒风刺骨，大家都有点“冷”不可待，整装待发。

浩浩荡荡的队伍从华师大后门出发，在蜿蜒优美的长风公园中穿梭，活似一条充满活力的小长龙，煞是吸引眼球。大家一边放开怀吮吸着初冬之晨的清新空气，一边开始饶有兴致地笑谈风“声”、畅谈奇人异事，天气的冰冷严酷也很快被这支年轻队伍的似火热情所征服，令人不禁要吟起“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这般的豪言壮语！

本次活动既锻炼了大家的身体，又考验了大家吃苦的毅力，活动在大家的意犹未尽中圆满结束。

2011级团支部开展秋季健身友谊赛

2011年10月24日下午，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11级团支部在华东师范大学大学生活动中心开展了羽毛球赛、桌球赛体育健身活动，并取得了圆满成功。

“活动活动筋骨，抖擞抖擞精神，交流交流感情”——秋高气爽，秋季可谓锻炼的好时节，“春困秋乏”，运动是增强免疫力的好途径，“劳逸结合”，运动也是学习、生活的调节剂。因此，国关院2011级新生开展了第一次团日活动，本次活动的主题是羽毛球、桌球友谊赛，目的在于增进本团支部同学间的友谊，因此形式轻松，同学们自由组合上场打球，准备工作做好后，大家便迫不及待地要一展身手。大家的积极性很高，玩得大汗淋漓，男女搭配也相当默契，活动氛围其乐融融，而且高手如云，彼此角逐令人称好！最后，活动在同学们的一片欢笑声中圆满地落下帷幕。



切磋球艺，娱乐休闲，放松身心！本次秋季健身活动，不仅拉近了同学们的距离，增进了感情，更锻炼了同学们的身体，让同学们以更饱满的精神和健康的体魄投入到秋季的学习、生活中来！

新闻整理：杨茗、周生升、许子兰

（责任编辑：刘佳琪）

国关院 2011 年 11 月—12 月学术活动大事记

“闻道书社”读书会系列活动



10 月 28 日晚 6:30, 本学期由我院院刊《闻道》编辑部成员自发主办的读书会拉开了帷幕, 此次所读书目为前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所著《大外交》前十六章。读书会流程如下: 先由到场学生各自介绍近期所读任意读物及从中所引发的体会思考, 或者介绍自己所用的读书方法; 然后在主持人的带领下大家一起详细分析《大外交》各章节内容及从中所蕴含的作者的思想和认识并学习作者的论证方法; 最后每个人对此次所读书目做自己的概括解读, 并可延伸到其他相关作品或联系分析时事。

此后连续每周周五分别举办一场读书会, 目前已举办了 6 期, 所读书目涵盖了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罗伯特·基欧汉与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和萨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书社社长为我院研二学生孙超同学。《闻道》书社创办目的在于为学生提供相互学习交流思想和方法的平台, 既加深对经典作家经典作品的解读和理解, 又能很好地启发每个人的思考并锻炼我们的思维和表达能力。

“复性书社共同体”系列读书活动

日前, 随着豆瓣网“复性书社共同体小组”的成功设立, 由我院邱立波老师和李永晶老师发起、我院十多名硕博研究生共同参与的读书小组终于有了一个正式名称。而豆瓣小组的创立也为扩大读书会的影响力、巩固读书会的成果提供了新的平台。

“复性书社共同体”系列读书会活动开始于本学期开学后的第一个周一的晚上, 从此固定于每周一晚 6 点准时开始。本学期读书书目是宋代朱熹所撰《四书章句集注》, 每期一篇, 由一位成员担任主讲, 目前已完成“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和“论语集注”的前八篇的研读和讨论。

此读书会宗旨在于通过重读圣贤经典, 探讨人的本质, 追求善道, 既能使我们学习理解古之圣贤之大志, 又能对我们的修身治学行事大有裨益。通过志道, 据德, 依仁, 游艺, 本末兼治, 不可偏废, 发愤忘食, 达到乐以忘忧之境。

博士研究生专题讨论会系列活动

2011年10月28日, 本学期第一场研究生专题讨论会在我院404报告厅举行。此次讨论会由我院阎德学博士主持, 我院姚远梅博士主讲, 主题为“困境与反应——英国与印巴克什米尔争端(1947—48)”。我院各年级硕士、博士研究生共16人参加。

该主题是姚博士所做的博士毕业论文, 她先为大家叙述了她的选题原因、写作思路及资料搜索, 给了与会者很大的启示。随后, 她简要介绍了该论文的行文结构。首先交待克什米尔争端的缘起以及当时英国政府所面临的两难困境, 然后指出英国在把克什米尔问题提交联合国前后两个不同阶段对1947年-1948年的



印巴克什米尔争端所做的不同反应, 但英国始终坚持优先维护英联邦战略利益避免印巴战争的立场, 从而导致实际结果与英国愿望背道而驰; 最后用博弈论的方法分析了英国政策失败的原因, 即伦敦不惜牺牲印度人民利益以维护其英联邦战略利益, 是英帝国没落时英国不甘心回归它的岛国位置的一个缩影。

随后, 针对该文内容及写作方法, 现场进行了热烈的互动和思想交流。此次讨论会进行了两个小时, 是由学生自发组织的一次成功讨论会。

接下来的连续两周, 先后举办了由阎德学博士的以“漫谈中国人的学问之道”为题和陆建松博士以“洛克的财产权理论——解读《政府论两篇》的一个视角”为题的讨论会, 都大受欢迎。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会议召开

2011年10月30日至31日上午, 由我院及我校两岸交流与区域发展研究院、上海海峡两岸法学研究中心合作主办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学术研讨会在我校逸夫楼报告厅隆重举行。

来自两岸三地的80多位专家、学者参与了研讨会, 我院教师及各年级硕士、博士研究生认真听取了报告。海峡两岸交流协会副会长王在希、台湾亚太和平基金会董事长赵春山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本次为期一天半的研讨会主要探讨了和平发展时期两岸法律发展、“十二五”时期两岸经贸合作、两岸政治互信关系、两岸教育文化交流等方面的机遇与挑战，谋求两岸在更广泛领域交流与合作。先后有下列人士做了学术报告：台湾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副执行长陈一新，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罗援，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刘红，中国文化大学教授蔡玮，上海台湾研究所副所长倪永杰，海基会顾问、中国文化大学副教授庞建国，台湾永然联合法律事务所所长李永然，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郭震远等。

31日上午11时左右，我校两岸交流与区域发展研究所包承柯副所长主持了闭幕式，台湾亚太和平基金会董事长赵春山与我校两岸交流与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曹景行致辞。

德国汉堡大学 Michael Brzoska 教授学术讲座



2011年11月21日下午2点至4点在理科楼404报告厅，来自德国汉堡大学和平研究与安全政策研究所的Michael Brzoska教授为我院师生作了一场以“欧洲安全秩序”为主题的学术报告。

此次报告由我院余南平教授主持。Brzoska教授首先指出了当今欧洲安全秩序形成的主要历史背景，从19世纪欧洲各国间的战争不断到21世纪全球秩序的变更。然后指出欧洲区域安全秩序的三个方面，即军事联盟、经济一体化和共同安全。随后，Brzoska教授详细介绍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西欧联盟、欧洲防御共同体、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及欧洲联盟的产生、发展历程及现状。继而指出了“集体安全组织”与“欧洲安全共同体”两个未实现的组织并简要分析了二者的原因。最后，Brzoska教授提出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联盟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三者之间分工不清及职责交叉问题。

22日上午9点，Brzoska教授在404继续进行了一次小型讨论会，我院潘兴明、臧术美两位老师和几位硕士生、博士生与会。首先由Brzoska教授作了主题为“作为和平与安全

维护者的欧盟”的演讲，随后与会师生进行了相关问题的探讨，现场充满浓厚的学术气氛。

日本东洋学园大学教授朱建荣讲座



11月28日上午9点半，在我院404报告厅，来自日本东洋学园大学的朱建荣教授为我院研一学生带来一场以“野田新内阁的内政外交”为主题的专题讲座。

在讲座中，朱教授首先回顾了今年8月底野田佳彦当选前日本民主党内部的选举情况：当时党内存在前原诚司、海江田两个强劲的竞选者，但考虑到野田佳彦的低调，选民们认为其有可能比前两者

更有经济建树，从而最终使野田胜出。

朱教授接着细致说明了今年年初的日本大地震对其国内社会造成的三大直接影响，及其今后的内政外交可能产生的深刻影响。其中，福岛核电站事故的发生对日本经济、社会造成了诸多重大危机。随后分析了震后日本政府所进行的经济调整和在财政政策方面的变化。

然后回到主题详细述说了野田首相的三大国内政治资本以及其上台至今已作出的政治行动，但关于日美普天间基地搬迁和增加消费税法这两个棘手问题仍存在多方面的考量和博弈，但朱教授根据其多年的从政经验分别给出了他认为的可行方法。此外，针对日俄“北方四岛”的争端，朱教授也拿出了两种具有可行性的形式上的解决方法。

最后，针对近期的热点问题，即日本加入 TPP，朱教授分析了日本此举的动因：与美交好，制衡中国，从中获得更多经济利益。对此，朱教授认为，中国应当沉重冷静，以一副大国姿态继续对日本持开放态度，坚持中日友好的基本原则。

Stefan Hedlund 访问俄中心

2011年12月1日，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教授斯蒂芬·赫德兰教授访问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并于下午2点在理科楼404举办关于“如何理解系统失灵——以俄罗斯转型、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为视角”的讲座。讲座由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成副主任主持，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和俄罗斯研究中心组织部分师生参加。

此次讲座内容丰富，观点新颖、精彩。赫德兰教授从“系统失灵”角度分析西方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科学角度在面对欧洲债务危机和俄罗斯经济转型的解释乏力问题，深入探讨了为什么成熟的西方社会科学不能提供这些剧变的解释。在面对这些经济危机和困难，赫德兰教授认为不能仅仅从西方的视野去看待这些“新现象”，而应该站在更高的立场，即“文明”的立场去理解不同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状况。在分析完“社会科学所面临的危机”之后，

赫德兰教授提及“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作为资本主义发展不可避免的矛盾和周期性的波动如何能够被经济学家以一种更为广泛的框架去理解。他提到需要关注“系统之外变量”和“转型之后的转型”，从历史的角度阐述了老欧洲和新欧洲的近二十年的经济发展史，并高度评价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并提出了“中华文明”作为新的发展道路的模式，呼吁学人将更多的视野转向“现实”，而非“斯密的无形之手的范式”。



这次会议反响热烈，俄罗斯研究中心的师生就“如何理解转型后的俄罗斯”、“俄国的治国方略”，“中国的发展道路”，“欧洲经济的未来”等方面与教授做了探讨。

“瓦尔代”国际辩论部中俄分组会成功举办



2011年12月3日至4日，由俄罗斯新闻通讯社和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瓦尔代”国际辩论部中俄分组会在上海美丽佘山之旁的艾美酒店成功举行。来自北京的领导、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社科院、复旦大学、吉林大学的国内一流学者，与俄罗斯著名智囊机构国防与外交政策事务委员会主席卡拉加诺夫、科学院远东研

究所副所长卢贾宁，以及来自印度、日本、新加坡的著名学者共 40 余人与会。

中俄双方均认为亚洲在美欧相继陷入危机之后仍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国际权力的格局正在发生变化——权力竞争的中心正在向亚洲加速转移。在这种大背景下，俄罗斯意识到积极融入亚太经济发展，推动远东西伯利亚地区开发，对于俄罗斯的重新崛起是非常关键的。2012 年将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举行的 APEC 峰会将是俄“东进”战略实行的契机。中方学者认为俄罗斯拥有未开发的广袤领土、丰富资源，并且参与了东亚地区的大部分地区机制，已经具备了融入亚太经济的基础，中国欢迎并且愿意帮助俄罗斯在亚太地区发挥积极、建设性的作用。中俄学者针对远东西伯利亚地区的开发进行了讨论，提出了许多中肯的建议。此外，双方就美国重返东亚、中亚地区安全形势、欧亚联盟与上合组织的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坦率而真诚的对话。与会代表均认为会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圆满成功。

“冷战终结，苏联解体及其对国际关系影响再认知”国际研讨会召开



12 月 5 日和 6 日，以“冷战终结，苏联解体及其对国际关系影响的再认知”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在我院的主办下，在校办公楼小礼堂隆重召开，来自欧洲多国、美国、韩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及我校历史系的 20 多位学者专家出席了此次研讨会，我院大部分师生参加了会议。

此次研讨会一共有三场，每场分别有四至六名学者进行了 25 分钟的精彩发言，随后有四位学者进行了 5 分钟左右的评论。持续一天半的紧凑研讨会上，学者们就冷战终结及苏联解体的原因及背景、作为历史过程的冷战的终结、冷战终结的国际影响等重大学术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并热烈讨论了“冷战”的定义、“新冷战”、制度的合法性、意识形态、价值观、集权体制等问题。

6 日上午 12 点左右，我校副校长林在勇到会为此次研讨会做了闭幕致辞，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著名学者叶小文进行了一段简短精辟的学术报告；随后，美国弗吉尼亚大

学教授艾伦·林奇闭幕致辞并向林在勇校长和叶小文书记赠送了特别的礼物。最后，我院冯绍雷院长宣布此次研讨会圆满结束。

我院研一学生参加叶小文书记“中国文化与文化中国”的报告

12月6日下午三点，在我校逸夫楼报告厅，全校研一学生参加了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曾任我国国家宗教局局长的叶小文同志的专题报告：中国文化与文化中国——学习第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讲座由我院冯绍雷院长主持。



报告内容包括“文化焦虑与三君子问”“文明古国与文化强国”“文化中国与文艺复兴”“文化中国与发展支撑”“文化中国与祖国统一”等多方面议题。叶书记不仅回顾了中国历史上重要人物的思想，而且对时事进行了独到的分析解读和展望，其对为反对

陈水扁的阴谋搞“台独”进行的政治实践经历的生动讲述尤其引人入胜，让我们看到一位政治家如何运用自己的经验智慧圆满完成预期政治任务。在座师生如临其境。此外，叶书记惟妙惟肖的PPT展示及精心准备的视频播放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

讲座结束时，全场对叶书记报以热烈的长久的掌声，叶书记以三次深鞠躬回应了大家。

白俄罗斯驻华大使率团访问我院

副校长范军日前会见了来我院访问的白俄罗斯新任驻华大使B·布里亚和白俄罗斯驻沪总领事B·沃洛别伊一行。

范军向客人介绍了华东师范大学的历史和近年来在创新、跨学科教研以及国际化合作等领域所开展的工作和取得的成果。布里亚大使对于我校与白高校进行积极务实合作、开展对白研究的努力给予高度评价，感谢我校对白俄罗斯留学生的培养。双方一致认为，人文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是中白全面合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增进两国人民的了解、夯实民间友好的基础具有重要的意义。双方商定，将在人才培养、教材编写和合作研究方面继续深入合作。

布里亚大使还与在我校求学的白俄罗斯留学生代表进行了座谈。校国际交流处处长丁树哲、国际教育中心主任黄美旭以及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的师生代表参加了相关活动。



目前，我校与白俄罗斯国立大学、白俄罗斯国立技术大学、明斯克国立语言大学建立了学生互换等形式的交流合作关系。今年上半年，学校决定建立白俄罗斯研究中心。

俄中心举办“教育部重点文科基地重大项目开题报告会”

2011年12月20日由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在新发展亚太万豪酒店成功举办“教育部重点文科基地重大项目开题报告会”。

三十余位专门从事俄罗斯相关领域研究的专家学者济济一堂，与会学者分别来自北京大学、山东大学、辽宁大学、黑龙江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等以及上海地区的兄弟院校。俄罗斯研究中心特别邀请到了伍贻康、潘大渭、徐凤林等国内知名学者担任本次项目开题报告会的评审专家。社科处处长许红珍莅临指导。

本次“基地重大项目开题报告会”是华东师范大学社科处推进教育部重点文科基地立项改革试点的系列活动之一。此次试点改革有两个组成部分，其一，今年全校六个教育部重点人文社科基地一次性共立项61项，打破过去每个基地一年只有两个立项的惯例；其二，试行两次立项开题制度。今年俄罗斯研究中心共立项12项，本次开题报告会是在所有项目已经立项的基础上召开的第二次工作会议，此次会议的目的是对项目研究进展、材料和方法进行具体讨论，并听取评审专家的意见。



俄罗斯研究中心 12 个项目的负责人或代表先后汇报了立项之后项目进展情况，以及材料准备、方法选取等涉及项目开展的具体问题，并对项目未来结项做出计划。之后，评审专家结合项目负责人陈述提出自己的意见，同时指出未来努力的方向。学者交流坦诚而热烈。与会学者表示，开展类似的研讨会议，对于完成好基地重大项目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通过与评审专家的交流，进一步明确了问题所在，拓展了思维空间，有利于高标准、严要求地完成项目科研任务。

美国里德学院政治学系助理教授张昕博士学术报告会

2011 年 12 月 30 日美国里德学院（ReedCollege）政治学系助理教授张昕博士访问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及俄罗斯研究中心，并于下午 2 点 30 分在理科楼 404 为全院师生作了题为“国家资本主义的治理模式与海外扩张：以中印俄三国国家石油公司为例”的学术报告。

张昕博士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对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新兴经济体中复兴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结构特征加以概括总结。报告以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的九家主要的国家石油公司为例，研究国家性质、国家公司内部治理的不同特征，以及上述两个因素对于国家石油公司海外扩张方式的影响。

在讲座中张昕博士运用国家特征、国家石油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国家石油公司的全球扩张三组因素对中国、俄罗斯和印度三个案例进行了详细对比。认为中国对国家石油公司管理的性质是碎片化的威权主义，不同官僚体系对国有公司的竞争性管制。在公司治理上形成了国内和海外的寡政竞争和制度化的人事管理。在全球扩张上是国有石油公司是“自下而上”的快速扩张，但是主要的公司之间缺乏合作。就俄罗斯而言，其天然气企业一家独占，而石油企业是寡头形态。俄能源企业的扩张与国家打造帝国的雄心有关，具有地缘政治的考虑。在公司治理模式上，其人事任命政治/经济精英高度重叠。在海外扩张上，天然气企业比石油企业在海外的扩张更加有效，在地缘上更加集中。印度的石油企业在市场分化上有限。国

企之间关系较为对立，国家作为一个“赋能者”(enabler)，较少的对企业进行直接的财政支持。印度企业受商业利益的驱使较大，全球的扩张速度较慢。最后，张昕博士还对研究有待进一步发展的方面做了介绍。



国关院师生就张昕博士报告的比较尺度的选择、研究方法问题，企业对外行为是否是受国家利益驱使，如何界定国家资本主义，如何看待全球市场对国有石油公司的影响等等问题与张昕博士交换了看法。同时，也有师生就通过案例研究进行对比分析发现规律、把握重大过程分析问题等谈了自身的感受。

新闻整理：曾乔圆、刘佳琪

(责任编辑：刘佳琪)



华东师范大学
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研究生

征稿启事

亲爱的同学们!

世界每天都在变化，世界风云总是变化多端！赶快拿起笔来，用你独特的视角解读当今时事、评说热点话题吧！

读一本书，也许会有百般感触；看一部电影，也许会有久久回味；听一首音乐，也许会有无限共鸣。还等什么呢？写出你的感受，让我们心得齐分享！

如果你爱生活，爱写作，爱记录生命中的点点滴滴，这里将是你书写自我的天地！诗歌、散文、小说、游记……尽情挥洒你的文采吧！

因为，我们不仅欢迎同学们把学术论文贡献出来，一同品味；而且也欢迎同学们把你们点滴的感受，拿手的特长一起拿出来共同分享！

这是一个多元的舞台，这是一个交流的平台，这是一个展示自我的空间！

让我们在这青春年华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一起撞击思想的火花！

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班刊，我们自己就是主办方！

投稿请发送至：ggwendao@gmail.com。

《闻道》编辑部

2012年1月

非 道
道 不
也 遠
。 人
人 遠
人

姜洪
二〇一二年六月

编辑部成员





S A I A S

